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SUNZHONGSHAN DE QINGSHAONIAN SHI DAI

陈漱渝 梁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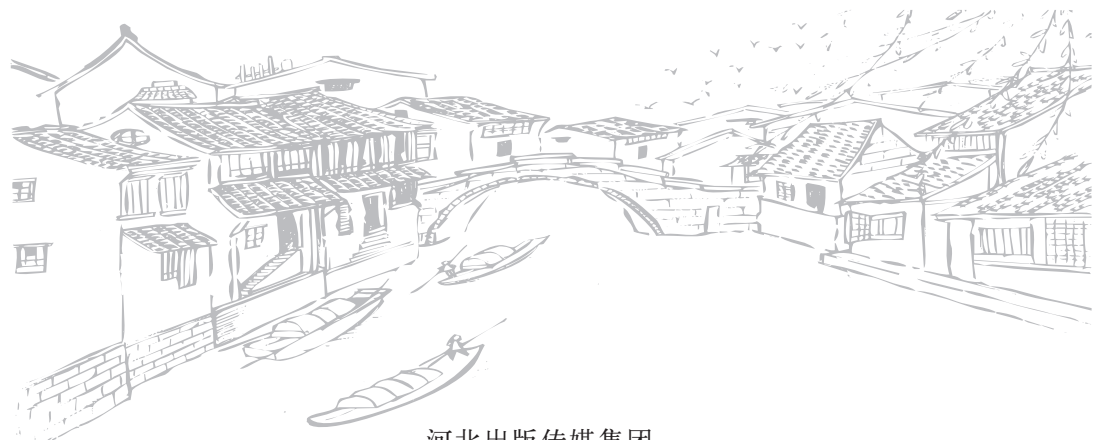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SUNZHONGSHAN DE QINGSHAONIAN SHI DAI

陈漱渝 梁雁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 | | |
|-----|----------------------|
| 001 | 一 白雪公主 |
| 016 | 二 韩家故里 |
| 035 | 三 查尔斯·宋 |
| 059 | 四 虔诚贤淑的母亲 |
| 069 | 五 留学亚美利加 |
| 095 | 六 接近革命运动的中心 |
| 109 | 七 我愿这样献身于革命 |
| 128 | 八 有情人终成眷属 |
| 146 | 九 “当学徒的日子” |
| 160 | 十 不同凡俗的“蜜月旅行” |
| 170 | 十一 前仆后继，两次“护法” |
| 189 | 十二 桂林扎营，准备北伐 |
| 198 | 十三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
| 221 | 十四 拥护实行三大政策，支持建立革命武装 |
| 256 | 十五 伉俪联袂北上，谋求和平统一 |
| 277 | 十六 哲人萎谢，劳燕分飞 |
| 297 | 尾 声 |

— 白雪公主

1893^①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纷纷扬扬的雪花不停地飘落，上海全城银装素裹。就在这一天，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上海虹口美租界有恒路628号C（今东余杭路530号）^②，跟纷乱的雪花一起，在纷乱的世界坠地。这个跟雪花一样纯洁而柔嫩的孩子，给风雪呼啸的人间带来了新的希冀。父亲宋嘉树（1861~1918）迎来

①这是宋庆龄1907年在访美护照上填写的日期。据知情者说，宋庆龄实际上出生于1890年，属虎。当时是为了照顾年仅9岁的宋美龄，根据家长的安排，将自己的年龄少报了3岁，以陪同美龄在中学共度一段时间，适应美国校园生活。此后，她也不愿意纠正自己的出生年份。

②关于宋庆龄的出生地，另有人说是上海川沙县城厢镇南市街。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02



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孩的降生，他激动地用英语夸奖说：“这是个雪孩子，白雪公主！”这个女孩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国母”、“国之瑰宝”的宋庆龄（1893~1981）。宋嘉树还为她起了个英文名字——Rosamonde^①，是为了纪念恩人里考德牧师的女儿，自己的知己好友罗莎蒙德·里考德。

在宋庆龄诞生前两年，宋家的长女蔼龄（1889~1973）出世。这是一个顽皮的姑娘，像男孩般精力旺盛，感情奔放。庆龄诞生后，她的大弟弟子文（1894~1971）出世。之后，她有了一个胖墩墩的、外号叫“小灯笼”的妹妹——美龄（1897~2003）。后来又添了两个小弟弟，子良（1899~1987）和子安（1906~1969）。

宋庆龄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压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势力和封建专制压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宋庆龄的出生地上海，地

^①观音译为罗莎蒙德，旧译为洛士文。

处长江口，踞东南水陆运输要冲，又是东西交通的枢纽。1843年，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正式开埠，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宋庆龄，原名庆林，也曾写作庆琳；教名Rosamonde，昵称Rosa（罗莎），追随孙中山^①革命后，曾化名中山琼英、孙琼英、宋琼英、安娜、马丹，后来也常以林泰署名。宋庆龄的朋友们更喜欢用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Suzi（苏西）来称呼她。宋庆龄也常在英文信件中用Suzi这个名字署名。

宋庆龄出生在一个既是传教士，又是教师和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党人的家庭，祖籍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

父亲宋嘉树相信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仁慈的上帝赐给他的宝贝，所以对他们都极为钟爱。他

^①孙中山（1866~1925），谱名“德明”，在家乡上学时名“文”，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后来将“孙”的本姓与化名中的日本姓“中山”连用，成为孙中山的惯称。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04



对孩子们比较娇纵。这虽然使孩子们有些任性，但同时也使他们深信世上无难事，似乎大千世界的一切都可以听从他们的安排。他还喜欢唱歌，是个很好的男中音，这对培养孩子们的音乐爱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家里，宋嘉树晚间会给孩子们唱歌，有宗教歌曲，也有民歌和通俗歌曲，都是他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时学来的。宋庆龄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作为休息，还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一面哼着小时候父亲唱的一些歌曲。现在，在上海和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中，就有她父亲留下来的歌曲书，比如《纳什维尔第一卫理公会^①圣公会教堂青年赞美诗集》^②、《合唱及独唱歌曲集》^③。

宋嘉树常常向孩子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讲述异域风情和奇闻异事。父亲与命运

①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在1939年合并而成的基督教教会。上述在华三会在1941年合并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②1907年印制，上有“C. J. Soong, Shanghai”（宋查理，上海）的签名。

③福音传教士埃拉·桑基作。

抗争、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不卑不亢、谦虚自尊的精神，坚韧耐劳、勇敢开拓的精神，使孩子们肃然起敬，也使他们对那个陌生的国度充满神往。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对子女大胆和有远见的培养，都对宋庆龄思想和品格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宋庆龄从小就深信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正义性。在这个意义上，宋嘉树是宋庆龄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宋嘉树把接受美国现代文明的教育和中国的自由看得一样重要，并认为外国教育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牢牢记得自己当年偷偷从波士顿的那个小店逃出来的情景。当大女儿蔼龄出生的时候，他就决定自己的孩子不要遇到像他一样的困阻，要将男孩女孩一律看待，让他们接受教育，并送去留学。

母亲倪珪贞（1869~1931）是中国早期新式妇女的样板。她在较为开明、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幼年时就开始跟老师练习写字，尔后进私塾，8岁念小学，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06



升入上海西门的裨文女塾（Bridgman School for Girls）^①，17岁毕业。由于成绩优异，还曾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她是个极有主见的女人。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教导孩子们学习自我独立。对于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女孩子的教育，倪珪贞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甚至是和传统观念背道而驰的。她不赞同封建礼教所讲的孔孟之道，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可以成为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作贡献。所以她像对待男孩那样对待女孩，很重视她们的教育。当女子教育问题在中国刚刚被提出的时候，她便与丈夫共同决定，把女儿都送进学堂，并决定让她们将来都去留学。那时在中国，把孩子送出去留学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只有真正有钱的人家才梦想着把孩子送出国接受教育，而这样做更成为显示自己的财力和表明自己新姿态的广告。即使是这样，也只有男孩子才被送出去，把女孩子送到国外去的事还没听说过。

①裨文女塾是上海开埠后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夫人艾丽莎·格兰德（Eliza Gillette）于1850年4月15日创设。校址在上海西门外白云观隔壁（今方斜路西林后路102号）。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埃尔默·特·克拉克的《中国的蒋家》一书说：倪珪贞“与丈夫志同道合，把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义融为一体，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对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他们养育的六个孩子，或许就不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不会有后来的宋庆龄——孙中山夫人。

宋家还有一个非正式的成员——保姆魏妈。她没有名字，连一个小名也没有；就连“魏妈”中的“魏”字也是沿用了她丈夫的姓。她不到两岁时就成了孤儿，目不识丁，却记住了《四书》、《五经》中的一些流传较广的话。她不满意那些不称职的女仆时，就会无师自通地用“朽木不可雕也”来形容。她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这个宗教跟那个宗教对她来说都差不多；但她却笃信有天堂、地狱，还有无穷的忌讳和规矩。每当眼皮一跳，她就认为是坏兆头，觉得必须拔掉一根眼睫毛才能避灾。每当嘴唇一颤，她就确信将要有人跟她吵嘴，于是言辞举止便格外小心。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08



每到过年的时候，她都要送给孩子们一点红色的东西：一朵红花，一条红丝带，或是一方红手帕，并且说一些吉利的，像“恭喜发财”“长命百岁”之类的话。孩子们也觉得，假如听不到这种贺词或没接到这类礼物，新年就还没有到来。魏妈给童年时代的宋庆龄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热爱孩子的善心地。每天晚上，庆龄跟她的姐妹们讲完神怪故事，都会害怕得不敢睡觉。这时，魏妈就会偷偷地上楼来跟她们做伴。如果孩子们有点伤风感冒，魏妈又会主动到宋父、宋母面前替他们请假。她会夸大其辞地说：“着凉，咳嗽，不休息就会变成大病。请一天病假，总比缺一月一年的课好。”听到魏妈说得这样人情入理，宋父、宋母就会慷慨地让孩子们休息一天……

宋庆龄的童年是幸福和愉快的。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宋嘉树已经辞去专任的教职，转而从事实业，家境渐好，日子慢慢富裕起来。坐落在有恒路的宋氏寓所是宋嘉树在事业渐获成功后，特意在上海虹口郊区农村买地，自己设计建造的。这是宋家在上海的第一个定居处，共有两层。这

所风格独特、中西合璧的住宅虽然后来被密集的城市建筑所包围，但当时是坐落在绿色的田野上，周围被枣树和其他上海稀有的树木环抱。房主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思恋，还特意在院子周围种了一些椰子树，一条小溪在房前流淌……楼上楼下各有四大间屋：楼下是书房，餐室，配有红木家具的中式客厅和摆有钢琴、沙发的西式客厅，这些房间后面则是贮藏室和楼梯间；楼上四间房，分别为父母、女孩、男孩和仆人的卧室，摆着上海罕见的美式沙发床，另有两间大浴室，澡盆里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这是宋庆龄早年居住过的地方——东余杭路628号C（今为530号）宋氏原址。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10



层是绿色的釉质，盆外有一圈黄色的龙雕。宋庆龄后来在给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描绘了她在虹口的这个相当欧化的家庭：“我们这里的生活和你那儿的一模一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欧洲式的。……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我们家里有许多卧室、浴池和盥洗室，将来你一定要到我这儿来看一看。”

跟宋家正对的那栋楼房里，住着宋庆龄大姨妈一家。宋母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爱到对面去找她的大姐——牛尚周夫人倪桂金商量。在倪家姐妹中，大姐是最有权威的人。宋庆龄晚年给亲友的信中，还亲切回忆起儿时跟表姐妹们隔着一条小弄堂窗对窗说话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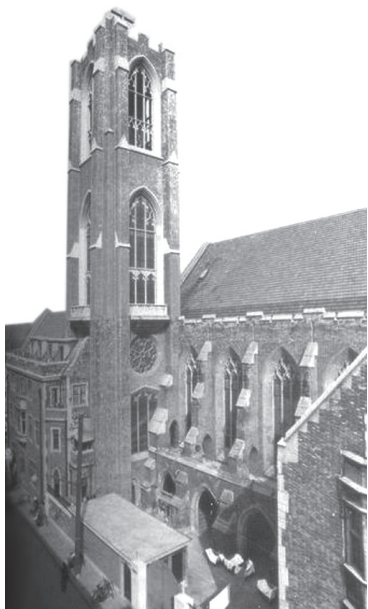
7岁那年^①，庆龄用罗莎蒙德的英文名字进入位于八仙桥的三一堂女塾。学校离宋家不远，是一所教会女校，坐落在上海八仙桥侧，后来并入中西女塾（McTeyre School for Girls）。

中西女塾设立于1892年，为纪念马克蒂耶

^①写于1921年4月28日的《宋庆龄自述》中说她“12岁才被送入教会学校”，以前是在家读书。

立教，西文名为“墨梯学校”。中西女塾是上海的南方监理会布道团团团长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创办的，当时是上海有名的贵族化学校，所收的孩子均为在华外国人和“高等华人”的孩子。试图培养一批具有西方文化素养的中国士子，影响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宋庆龄上学的时候，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讲究穿戴。她留短头发，不讲究编好看的辫子，同学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小辫子。庆龄从小喜欢学习，读书很用功。每当天色晚了，她还在读书的时候，父亲劝她休息，她会回答说：“把功课准备好，我才



◎1900年，宋庆龄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这是学校原址（今西藏中路沐恩堂）。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12



快活。”她爱动脑子，喜欢问问题，凡事喜欢寻根究底。随便什么问题，如果要她相信，她总要问个为什么。那时学校每星期三晚上都要请一些校外著名人士来学校主持“宗教讨论”活动。小听众可以提出任何问题而不被制止。庆龄常常大胆地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美龄不对牧师的说教提出任何异议。有一次，美龄生气地问庆龄：

“为什么你对巴斯德·赖提出问题？难道你不相信他的话吗？”宋庆龄还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喜欢独立思考。一次，上福音课时老师讲了《圣经》中一个《饼和鱼的奇迹》的故事。故事讲的是耶稣把所剩的几个饼和几条鱼祭天之后，分给了跟随他的几千人吃了。宋庆龄听了以后马上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然愿意像基督教导的那样，为别人而活。

宋庆龄儿时性格中，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智慧、含蓄、沉稳。她的情绪总是很稳定，从不慌张。她还富于同情心，心肠很软。一次，她在学校里看见厨师宰鸭的情景，就跑开了，并为此哭了起来。从此，她在这个学校里再也不吃鸭子

了。

宋庆龄特别喜欢英语和文艺。虽然她生性腼腆、娴静，但在文艺演出的时候却很大胆，演技颇好，经常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学校附设的幼稚园在学期结束前常举行戏剧公演。小朋友们要排出童话剧，剧本中人物较多，有一个角色很难演，特意从小学部请宋庆龄协助演出。在剧中，庆龄扮演的公主被加冕为皇后，使臣民们过上了快快乐乐的生活。家长们是观看演出的忠实观众。宋庆龄的演技博得了在场教师和家长的赞扬，当演到举行加冕仪式时，宋嘉树的一位朋友不禁高兴地叫出声来：“啊哈！这样一来，宋先生就是皇后的父亲，国王的岳父！”宋父听后乐不可支，其他观众都将目光投向他，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如果说这个故事是庆龄后来成为“国母”的征兆，那当然是荒诞不稽的，但这件事表明，庆龄很小的时候就具有高出其他孩子一筹的表演才华。庆龄一生非凡的仪表，高雅的谈吐，跟她小时候受过艺术的陶冶显然是不可分的。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14



◎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时的宋庆龄。摄于1907年。

在父亲的影响下，庆龄还是个小爱国者。

1900年，广东惠州起义前夕，孙中山于8月28日来到上海，住在宋家，和宋嘉树探讨救国之路，畅谈反清革命问题。庆龄被大人的话吸引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因“痛感人间不平而终身投入革命”的献身精神，让她十分敬仰。只有7岁的她，曾经对人说过：“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

暑假期间是和兄弟姐妹欢聚的时刻，但母亲并没有放松他们的学业。上午，她请来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孩子们学英语和拉丁语；下午，她又请了一位中国教师教古典文学。午饭后那短暂的休息时间，母亲规定孩子们午睡。但贪玩的孩子们趁妈妈睡着之后，就悄悄地溜到花园里做游戏——他们最爱玩的是“枪壁角”和“拉黄包车”。一次，蔼龄装车夫，庆龄装乘客。“车夫”用力过猛，把“乘客”抛了出去，致使庆龄在这场事故中留下了一个作为终生纪念的小伤疤。



二 韩家故里

“宋庆龄原姓韩，不姓宋”，这在海南籍的韩氏宗亲中几乎无人不知。但一般人对这件事却毫无所闻，或不知其详。

关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的经历和宋氏家族的起源，国内外几本有影响的介绍宋氏家族和宋氏三姐妹的著作，说法相当混乱，传说很多。

据作者所知，最早披露“宋庆龄原姓韩，不姓宋”这一秘闻的是美国人包华德。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他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其中列有介绍宋庆龄父亲宋嘉树的条目，词目写的是——“宋嘉树，原名韩乔荪（音），别名：耀如。”但这一辞典并未在我国公开出版，所以在国内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1985年初，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撰写的《宋家王朝》一书由纽约哈泼斯—罗公司出版，立即引起了美国书评界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密切注意。香港《百姓》半月刊和《南北极》月刊争相选载此书。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日报》、《中报》、《北美时报》纷纷发表评论。很快，澳门和国内先后出版了此书的中文译本，成了红极一时的畅销书。这部倾注了作者15年心血的著作，在第一章再次宣布宋嘉树及其子女“姓韩，不姓宋”。这一说法在港台引起了争议。有人在《九十年代》杂志183期发表文章，说斯特林·西格雷夫的考据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但也有人以宋庆龄同宗的身份在《百姓》半月刊96期撰文反驳，证实宋庆龄家原来确实姓韩。

为了揭开谜底，作者曾亲自到海南岛文昌县的昌洒区牛路园村进行实地调查。

文昌县位于海南岛的东北部，素有侨乡、椰乡之称。俗话说：“海南椰子冠全国，文昌椰子半海南。”其椰子的种植面积和产量约占海南



一半以上。田汉在七绝《访文昌四首》中，有“十八万株三十里，椰林今日亦长城”之句，描写了文昌椰林似海的壮观景象。仅文昌东郊区椰林乡玉树村有一棵树龄110年的椰树，一年就能结155个椰果，被誉为“椰树王”。在海南的传说中，椰树是英雄的化身。它不怕烈日骄阳，不惧狂风暴雨，顶天立地，傲视云天，象征着海南人民不畏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性格。

在海南居民中，文昌县的华侨人数居于全岛之冠。其中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最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丹麦、菲律宾、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土地上也都洒有文昌籍华侨的汗水。列宁说过：“毫无疑问，只是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离开祖国……”^①文昌人大量侨居海外正是由“极端的贫困”驱使的。据《文昌县志》^②：“从1876年至1898年的23年间，仅通过客运出洋的琼侨人数就达24.47万人左右，平

①列宁：《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页。

②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2000年出版。

均每年1万有余，最高的年份竟达2万余人，其中文昌人占半数以上，几乎都是青壮年劳动力。”

早在汉代至唐代中叶，中国人已开始走向世界。到了明代，海南华侨已经到达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清朝道光年间（19世纪20年代），海南岛的机帆船从海口出发，将大量包括蜡、鞋、伞、纸张、干果、药材等的商品运至东南亚各地。商船的运载量已达2000至2500吨，由此可以遥想当年海外贸易的规模。1859年，在驻广州英国领事巴夏礼的协助下，英属圭亚那殖民地政府急切要求鼓励中国劳工向该地移民，从而迫使广州中国当局正式承认该省人民移居外国的权利。1860年，清政府又宣布“准华民赴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工作”。此后，海南人远渡南洋者逐年增多，且由从事贸易活动的性质变成移民的性质。海南华侨之所以背井离乡出外谋生，情况大体可分三类：一、避乱逃兵；二、贫困饥饿；三、投亲靠友。其中，贫困饥饿则是最基本的原因。

“番客番客，没有一千有八百。”这是在文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20



昌民间流传的一句谚语。意思是，华侨的生活再苦，也多少能挣一些钱，总比在国内忍饥挨饿要强一些。据清咸丰八年（1858年）的《文昌县志》和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重修的《文昌县志》记载，文昌县汉代属珠崖郡地。唐武德五年（622年）分置平昌县，属崖州。贞观元年（627年）改名文昌。宋开宝五年（972年）改属琼州。明清属琼州府。宋庆龄的祖父韩鸿翼是清嘉庆年间诞生，清光绪年间去世，大约活了七十多岁。他生活的年代中，文昌灾情不断：1821年，文昌发生了瘟疫。1824年，天大旱，飓风摧屋，飞蝗入境。1828年，飓风又作，商船覆没。1831年，洪水泛滥。1836年，龙卷风起，树林尽拔。1839年，飓风三作，稻不获收。1849年，又有风灾。1851年，瘟疫蔓延。1852年，虫害害稼。1854年，飓风大水。1855年，飓风霖雨。1856年，天寒霜降，作物多枯，禾状如葱，有华无实。除了天灾，还有官府勒索、海寇掳掠等人祸，文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贫困、饥饿使文昌人只能大量背井离乡，出外谋生。

据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一书介绍，宋庆龄的父亲“出生于海南一个贫穷的商人家庭”。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一书说，“宋氏家族祖籍在山西，在耀如诞生的前几年，由于内战逃往海南岛”，“成为走南闯北的买卖人”。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一书，说宋庆龄的祖先“住在北方离大海几百英里的山西省”，在清朝初年南迁至广东省，又渡海到海南岛避难，到宋庆龄祖父一辈，已成为“十分富裕的商人、造船商、秘密会社的老前辈、走私贩”。其主要根据是宋子文曾赠送一具海南岛帆船的模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作礼物，并附了一封信：“敬悉阁下对航海船只很感兴趣，谨由敝国驻华府公使致赠海南岛航海帆船一具留念，这是在敝国海关监督下完全仿照实物按比例缩小制成。海南岛为广东沿海岛屿，吾家世代久居于此，众所周知其勤劳人民以此种小船从事贸易有远航至印度者。”他还援引了宋庆龄父亲1881年6月25日给传教士林乐知那封信中的一句话：“他们有帆船从澳门到河内，六天的水路。”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22



事实上，宋庆龄的远祖是河南相州安阳人。战国七雄之一韩国的版图就在这一带。到了唐代，相州的辖境包括今河北成安、广平和魏县西南部和河南安阳市、汤阴、林县、内黄及濮阳的西南部。相州安阳韩姓中的名流，首推以抵御西夏闻名的北宋大臣韩琦（1008~1077）。《宋史》卷三一二有韩琦传，说他“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民族英雄岳飞也是相州人，少年时代曾在韩家为佣，可见韩姓是当地的一个大户。

韩姓渡琼的第一代始祖叫韩显卿，南宋时代曾先后出任浙江会稽县尉和广东廉州太守。此人颇有才，但一生未被重用，退职后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携眷属和家谱来到尚处于开发阶段的海南岛，在文昌县的锦山区定居。韩显卿之所以选择当时尚被称为“南荒蛮地”、“谪宦逐客羁栖处”的海南岛度过晚年，除了因为这块土地色彩缤纷、风光旖旎之外，还因为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却远比烽烟不息、干戈四起的中原大地安定。

其实，韩显卿的南迁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汉族首次进入海南岛是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但大量落籍海南则始于宋朝。据考证，宋代汉人迁入海南者约十万之众，除少数商贾外，绝大部分都是南来避乱的中原难民。明代文昌籍的进士邢宥在七绝《海南风景二首·之一》中，有“故家大半来中土”之句，就反映了这一迁徙状况。

古往今来，文昌籍的韩姓中产生了不少德才超群的人物。《文昌县志》卷一《舆地志》中，录有刘敬熙诗：“文昌蕞尔邑，大海环其隅，洗荡出奇秀，人物齐中区。”蕞尔，是“小”的意思。小地方人才辈出，正是文昌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但文昌籍人士中，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居于显赫地位的，恐怕莫过于宋嘉树。

宋嘉树，原名韩教准，1861年10月17日生。包华德撰写的人物词条中将他的名字拼写成“韩乔菘”，是因为“教”“乔”两字音近，“准”字文昌话读音也近于“菘”。宋嘉树的祖辈并不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24



是商人，而主要以务农为生。

据现存宋嘉树曾祖父韩仁循的墓碑推断，当时韩家的生活状况近于小康，所以死后置有祭田，让子孙轮流耕种，所得作为祭祀的费用。韩仁循是清嘉庆甲戌年间（1814年）去世的，当时宋嘉树的父亲已经出生，故立碑人中有他的名字。

宋嘉树的祖父叫韩锦彝，原住文昌县锦山区的罗豆，后迁至同属锦山的昌洒镇牛路园村。迁居的原因，现有三种说法：第一，罗豆地少人稠，难以谋生；第二，犯了族规，勒令迁移；第三，1990年，据当时在珠海定居的九十多岁的韩扶丰说，韩锦彝曾经参加太平天国起义，是文昌县北地区“老洪”的头头，因为起义失败，易地而居。韩锦彝有两个儿子：长男鸿翼（即宋嘉树的父亲），娶王氏为妻；次男鹏翼（即宋嘉树的叔父），娶宋氏为妻。

据现存文物考证，韩鸿翼出生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死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享年六十四岁。他葬于文昌县宝劳区大昌坡上，

墓葬至今保存完整。韩鸿翼出生后，家境日趋穷困，只剩下种四斗种子的田地，约1.2亩。因为种地不能果腹，他只得靠卖椰子、椰绳，或在运椰船上当搬运工补充收入。韩鸿翼的妻子王氏是小脚，仍下地劳动。她淳朴善良，勤俭持家，受到亲友的赞扬。说明韩鸿翼家贫，还有两件有力的物证：韩家祖宅、韩王氏墓碑。

韩家祖宅所在的牛路园村，民国初年住着韩姓、符姓共九户人家，解放前夕只剩下三户姓符的人家，目前只有宋庆龄的堂弟韩裕丰老人一人在此居住。韩家祖宅是座西南、向东北的两间

◎海南宋氏祖居。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26



正屋（一间正屋有三间横室），一间厢房。文昌县的农舍，一般有9~12根房梁，而韩家祖宅只有4根房梁，可见属于当地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

清同治五年（1866年），宋庆龄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韩家祖宅西北约百米处的牛酸树林中，有宋庆龄祖母韩王氏的坟地。坟头已平，坟前仅有一小块花岗石墓碑，中刻“清韩妣王氏之坟”七个字。从墓葬的规模，也可断定韩家当时绝非富户。

韩鸿翼和韩王氏共生育了三个儿子。长男韩政准，19岁飘泊到马来西亚，靠养鸡为生。因穷困，终生未娶，32岁病故，安葬在马来西亚的麻坡。据说他曾到上海探望过宋庆龄的父亲。当时宋家住上海虹口，门口有仆人守门。仆人向韩政准要名片，他就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家兄韩政准要跟你见面。”仆人赶快请他进屋。宋庆龄的父亲为他赶制了长袍、马褂。他在上海住了两三个月，然后又回马来西亚去了。韩鸿翼的第三个儿子叫韩致准，娶符氏为妻，生有三男一女。他一直在家乡劳动，除种田外，还外出补

锅。他34岁那年，为家里盖房，墙是打垒墙，要用夯将两层木板当中的泥巴砸结实，劳动强度很大。结果房子刚盖成，他就累死了，妻子也改了嫁。

宋庆龄的父亲原名韩教准，是韩鸿翼的第二个儿子。现在在文昌县，还流传着一些关于韩教准的传说。乡亲们说，韩教准小时候十分调皮，有冒险精神，特别会爬树。有一次，他正爬椰子树，树干突然裂了。就在树干裂而未断之际，他顺势一悠，抱住了另一株椰树的树干。周围观看的人吓出了一身冷汗，都夸他像小松鼠一样灵巧。乡亲们常说，韩教准孝敬老人。他家居偏僻，购买日常用品需跑远路。每当父母要他买东西，他都高高兴兴地去，不怕劳累，大人们夸他“脚力好”。乡亲们还说，韩教准从小好学。海南祭祀祖先时，有老前辈诵读“祝文”，其他孩子觉得诵读“祝文”的姿态和语调十分奇特，禁不住笑出声来，独有韩教准利用这个时机，悄悄在一旁辨认“祝文”上的字。

据1918年重修的《文昌县志》卷18记载：



“光绪年间，耶稣教徒招至蛟塘市传教，设教堂，广招乡间男女教授。有英美法教支派不同，大致以博爱为宗旨，倡平等自由男女平权之说，与中国教歧异。遇有冲闹各持其事，官厅莫能禁止。耶教徒又恃神父为护符，乡间好事者皆借其教为声援，传播愈广。文昌昌洒铺前蛟塘等墟渐次设堂演教，入会者颇众。”这是关于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宋庆龄祖籍布道的一条重要的地方文献资料。有的文昌父老说，因为韩教准聪明活泼，外国传教士很喜欢他，常叫他上树采椰子，或替他们购买“佳誉荣膺水果王，味浓蜜赋室生香”的菠萝蜜。

韩教准改姓宋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澳门星光书店1985年10月版的《宋家王朝》中的说法是目前流行的一种解释。即韩教准的“准”字，按海南岛发音读成“沈”（Sun）。故美国人叫他做“查尔斯·沈”。但韩教准英语学得蹩脚，发音不清，将“沈”（Sun）拼写成“松”（Soon），成了查尔斯·松。“后来他回中国探家，他感到不得不改变西方习惯而

随中国的习惯，于是他把Soon（松）改成Song（宋）。”^①

其实，韩教准改换姓氏的原因相当简单，那就是因为他被堂舅收养，而堂舅家姓宋。因为按照中国的习俗，一个人姓什么是跟本人和亲属关系极大的事情，即使偶尔发生拼写错误，也会迅速改正过来，而不能将错就错。因而像《宋家王朝》中所说的因拼音错误而导致改姓的说法是难令人信服的。

韩教准的叔叔叫韩鹏翼，娶宋氏为妻，生有二子敬准、效准。宋氏为人勤劳温顺，但不知其名，因她娘家住在现属昌洒区的昌后村——该村村民全都姓宋，故人们尊称她为“昌后婆”。在宋庆龄的堂弟韩裕丰家，保存有1919年秋为韩宋氏立的墓碑，中刻“韩祖妣宋孺人墓”七个大字。韩宋氏的弟弟——韩教准的堂舅，就是早年赴美国修筑铁路的海南岛移民之一。

列宁指出：“国家愈是落后，它的非熟练

^①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澳门星光书店1985年版，第21页。



的、干粗活的农业工人就愈多。先进的民族可以说是占据了高尚的工作，把低下的工作留给半开化的国家。”^①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情况正是这样。他们最初在淘金区充当厨师、洗衣人，或从事欧美冒险家们所不屑于干的笨重的体力劳动。1863年，参加铺设中央太平洋铁路的白种人因劳动艰苦而纷纷离职。中央太平洋公司当局决定大量招募中国劳工。当时，占筑路工人五分之四的中国劳工工资比白人少三分之一，还不能享受免费食宿的待遇，却从事最危险、最笨重的劳动。他们置身于柳条筐中，从悬崖吊下，在山壁上钻洞，放进炸药，点着引子，炸开了号角峡大峭壁。他们还攀上海拔7000英尺的多恼峰，在高及人头的积雪中打出了一条隧道。韩教准的堂舅就是在美国大量募集筑路华工的“自由移民时期”来到美国的。他先在华工当中做点儿小生意，后来攒了一些钱，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了一家丝茶商店。据说他是第一位在美国开丝茶店的华侨。

^①列宁：《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页。

大约在1875年，9岁的韩教准随长兄政准到东南亚谋生，在马来西亚一个亲戚家当佣人，立了三年契约。1878年春，韩教准的堂舅回文昌探亲，见到了韩鸿翼，说他在美国立稳了脚跟，生活不错，但由于没有孩子，经商缺少帮手。韩鸿翼动了心，同意将韩教准过继给他当儿子。同年夏，韩教准的堂舅返回美国，途经马来西亚，便将12岁的韩教准带到了波士顿。这一年，到达美国的中国人总数有8992人^①，而波士顿的华侨约有4000人。韩教准到美国之后，改名为宋嘉树，号耀如。

很多事实表明，宋嘉树及其子女承认他们是海南岛文昌人，而且本来姓韩。大约在清光绪年间，宋嘉树曾回文昌老家探亲，当时他母亲和婶婆都健在。哥哥也从南洋回来跟他团聚。宋嘉树回家时，正值盛夏。他体胖，怕热，常光着膀子在家门口大树下纳凉，手中不停地摇着一把葵扇。文昌的老人们对此有深刻印象。宋嘉树原准

^①柯立奇：《中国移民》，《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32



备拿出一些钱替家中盖房，但弟弟韩致准偷了他的钱去赌博。他一气之下离家返回上海，结果房子也没盖成。1926年冬，宋子文也专程回过海南岛，先到海口市，后到文昌县城。乡绅组织军人和学生夹道欢迎，并举行宴会。宋子文在宴会上发表讲话，开了一张要在海南岛修建环岛铁路的空头支票。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南京电催宋子文火速回返，因此他没有来得及回归故里。老家人将一些土特产和一部《韩氏族谱》送到海口，宋子文乘飞机带走了。宋子文这次回文昌，还捐款修建了一所小学，位于文昌县文城镇文庙旁边，命名为子文小学。此后，宋子文虽未再回文昌，但曾委托一位叫云日东的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替他回乡扫墓。

宋庆龄也承认文昌是她的祖籍。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昌有一年不雨，县北发生大旱灾，很多农民被迫逃荒。宋庆龄获悉后，主动写信给县政府表示慰问，并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几百元赈济灾民。1960年11月9日，宋庆龄致安娜·刘易斯·斯特朗信中又说：“我一直想去海南的老家

看看，我能想象那里一定是非常迷人的。不过，我担心情绪上的紧张和旅途的劳累会使我不堪此行。”

20世纪70年代，台湾文昌籍的国民党军政要员120多人捐资发起复印《文昌县志》，并成立续修《文昌县志》委员会。该会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借来一部1918年重修的《文昌县志》（蔚文公所藏版）复印。宋美龄亲笔为该复印件题写了书名：“文昌县志”，落款是“蒋宋美龄题”。

考虑到他们这种乡土之情，宋庆龄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特邀文昌县委书记符和火来京守灵。文昌县委决定，将宋庆龄祖居所在地改名为宋庆龄乡。海南行政公署还拨款1.5万元，重修了宋庆龄祖宅，供中外崇敬宋庆龄的人们瞻仰。

文昌有一种植物叫海莲果，本是红树的一个品种，果熟蒂落之后，多被海潮带到别处泥滩，扎根发芽。有一首咏海莲果的诗写道：

熟果离枝逐浪漂，
拼将弱质战狂涛。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34



耻借平坡抽嫩叶，
偏朝骇浪举新苗。

宋庆龄父辈漂洋过海、艰苦创业的精神，不正跟海莲果的特点有着相通之处吗？

三 查尔斯·宋

波士顿，美国东北的海岸城市，海滨一片红砖房，港口帆桅高耸。当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里是美国革命的摇篮，独立和自由的象征。为了驱逐英国占领者，这里的市民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斗争和武装暴动。当宋嘉树来到这儿的时候，波士顿已经发展成为美国的大商埠、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这座繁荣兴旺的城市令宋嘉树大开眼界。在踏上这片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土地之后，宋嘉树立刻呼吸到了扑面而来的民主和自由的空气。美国一位无名诗人描写道：

这里是名扬全球的波士顿，这里是
永世纪念的列克星敦。



自由之钟在这里敲响，自由之子在这里牺牲。

从此，自由的钟声长鸣，自由的精神永存。

根据波士顿市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宋嘉树堂舅所主持的丝茶店是打进美国东部的第一个专营丝茶外贸的中国商业机构，被誉为“北美华商先锋”。店员都是文昌乡亲，店堂布置古色古香，典雅美观。一位波士顿绅士当年赞扬说：“这里给你以梦一般的美不胜收的感觉，让你从清醇的饮料中获得怡悦性情的享受。”

在丝茶店里当学徒的日子，宋嘉树聪颖机灵、勤快温和，很快掌握了经营商业的知识。堂舅十分满意，经常给他鼓励，并希望他以后能继承家业，传宗接代。

但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小嘉树被美国民主独立精神感染着；家乡海南岛的悲惨生活与波士顿繁荣景象的鲜明对比，使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渴望自己的祖国也像美国一样富强起来。

而小店里每天来来往往的都是一批一批丝织品和散发着各种不同气味的茶叶，单调、沉闷、乏味，使小嘉树感觉到如果长期在这里待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的出路，最终只会像堂舅一样，庸庸碌碌一生。他不再满足于堂舅安排的帮助经销丝茶店的命运，开始追求更远大的目标。

当时居住在波士顿的中国人很少，主要是一些被清政府派去留学的官宦人家的子弟，住在查尔斯河另一岸的坎布里奇。他们经常光顾丝茶店，在店里高谈阔论。这对宋嘉树的改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一天——这是改变宋嘉树整个人生的一天，丝茶店里来了两位清国留学生，他俩是表兄弟。一位叫牛尚周，操上海方言；另一位叫温秉忠，操广东方言。在异域他乡见到自己的同胞，宋嘉树感到格外亲切。温秉忠的语言勾起了宋嘉树的缕缕乡思。牛尚周12岁考入留学生预备学校的经历更使他神往。表兄弟都是作为广东人容闳所组织的中国教育团的成员来到美国的。很快，他们和小嘉树成为了好朋友。他们鼓励宋嘉树走



出丝茶店，在美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到学校去学一门有意义的学问，待学成后，谋一个理想的职业，回到故乡，报效祖国。他们的劝告，使宋嘉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小嘉树终于下定决心，向已经成为他养父的堂舅提出了在美国求学的要求。堂舅无法理解小嘉树的愿望，他只希望小嘉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商人，继承他的家业。但求学的欲望却像火一般烧灼着宋嘉树的心，而且愈燃愈旺。

这年初冬的一个深夜，他终于溜出了丝茶店，离开了只顾经商而对西学毫无兴趣的堂舅，逃上了一艘名为“阿尔伯特·加列汀号”（Albert Gallatin）的缉私艇。

好心的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Eric Gabrielson）也许是佩服小嘉树的胆量，也许是喜欢他追求独立创业、追求自由的勇气，竟然收留了这位异邦人，让他充当船上的仆役。那时，对这样的偷乘者，船长有权处罚或令其在下一个港口上岸。

1879年1月8日，宋嘉树改名查理·琼斯，

加入美国海岸防卫队，点名册上将他的年龄填成16岁，虚报了3岁；因为16岁是美国船员的最低合法年龄。加布里埃尔森船长非常喜爱这个聪明能干、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少年。他发给宋嘉树一套漂亮的官方船员制服，又送给他一套苏格兰粗花呢西装，星期日还带他去监理会的教堂做礼拜，使这个不信教的少年逐渐变成了基督教的虔诚信徒。宋嘉树还在船上跟船员们学会了用细绳编制吊床的技术。

1880年5月，因南方海岸走私更为猖獗，加布里埃尔森船长调往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港“科尔法克斯号”缉私船，宋嘉树也追随到那里，在船上的食堂任杂役。当时，美国的基督教把用教义感化别人当作“白人的义务”，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自然就成了“可能拯救灵魂最多的地方”。当年11月7日上午，14岁的宋嘉树在威尔明顿第五街监理会教堂正式受洗礼，把他带到教堂的是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的朋友罗杰·穆尔上校。那天教堂张贴的通知上写道：



今天上午的洗礼仪式将在本教堂举行。一位中国皈依者将是享有这项庄严权利的人之一，也许是迄今为止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位“天朝人”。

身穿双排扣大礼服的里考德牧师主持了这一仪式，他用手轻抚宋嘉树的黑发，赐给这位新信徒一个教名：“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仪式结束后，威尔明顿的卫理教会产生了一个想法：把宋嘉树培养成到中国传教的牧师，使这个“灵魂得救”的异教徒回去布讲福音，感化他的异教徒同胞。

1881年4月，宋嘉树进入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圣三一学院（Saint Trinity College）^①。资助他的是罗杰·穆尔上校的朋友——靠经营达勒姆金牛烟草发迹的慈善家朱利安·卡尔将军。宋嘉树称他“卡尔父亲”。为了感谢朱利安·卡尔的资助之恩，宋嘉树后来给长女蔼龄取了一个英

^①即现在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文名字“南希”，因为卡尔将军的夫人叫南妮卡尔。

达勒姆是一座小城，这所学院仅有两座建筑物，招收了200名学生，由6名教授授课。宋嘉树是学校的“特别预备生”，因为他此前没有进过正规学校，需要在几个月内学完其他同学几年学习的课程。他的勤奋受到校方的表扬。精通玄学和修辞学的院长克雷文博士在他1881年6月9日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他（宋嘉树）每一方面都很出色，专心学习，一定会成功。”这年夏天，宋嘉树用英文给远在千里之遥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1878年离开了在东印度的哥哥，来到美国，我幸运地发现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我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到一所大庙拜木头菩萨。父亲呵：拜木头菩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就是拜一辈子也不会有一星半点好处。……我信赖上帝，希望凭上帝的意志再次在这个世界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42 ■



上看见你。

1882年秋，宋嘉树转入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神学院就读。在校期间，他所有的考试都能及格，在神学方面是班上的优等生。放假时，他常帮助牧师们布道，也



◎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时的宋嘉树。

用绳索自制一些吊床出售，贴补一点儿零用钱。跟同学相处时，他常开怀大笑，显得和蔼友好、性情快活，但一人独处时，孤独仍时时袭击他的心。他曾泪流满面地说：“我多么寂寞，远离亲人，久在异乡。我觉得我真像密西西比河中顺水漂浮的一片小木片……”

对故乡和祖国的思念，使宋嘉树更加努力学习。他希望能够用基督教帮助并拯救他的祖国，对回国传教充满信心。1883年7月27日，当他得知教会已决定在他毕业后派他回上海工作时，他给林乐知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

接奉手书已有数日，确实不胜欣慰。我看到你完全把你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赐，让我尽快见到你……在我结束我的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



这封信充分表达了宋嘉树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基督上帝的虔诚。

1885年5月28日，宋嘉树以优等的成绩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这时，他不仅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发表过用英文撰写的文章。

按照宋嘉树的想，他还想在美国继续深造，学点儿医学，以便回国后更好地帮助自己的同胞。从耶稣开始布道，行医就是基督教分内的工作，是争取民心、辅助传教的重要手段。热心的朱利安·卡尔先生也十分愿意资助他继续学医，但校长霍兰·马克谛耶（Bishop H.N. McTyeire）主教坚持派他到上海去任见习牧师，断然拒绝了宋嘉树的请求。他们认为他不配接受美国系统的高等教育，甚至污蔑他希望留下来学医是为了贪恋美国“高级文明”的生活。1885年7月8日，范德比尔特大学校长马克谛耶给上海南方监理会布道团团团长林乐知写了一封信，透露了他的看法和打算。他要求林乐知立刻让宋嘉树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定期巡回传教士，而不是教师，虽然这是早先答应过宋嘉树的。马克谛耶说：“不

用给予什么特别的考虑，就是应该把他派到最低一层去。他要徒步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巡回布道”，“没有轿子就走着去”。对于宋嘉树希望学医的心情，他认为“在他到中国人中去努力工作之前，不要把他身上那种‘中国佬’的味道都磨干净”。还说，“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而且并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舒适”。因此，“已经告诉他：我们已有多得足够布道团所需的医生，不再需要了。”马克谛耶的这封毫不掩饰地表示对宋嘉树侮辱和歧视的信，无疑对宋嘉树回国后的宗教事业投下了阴影。

林乐知是在1860年来到中国的。他是把“孔子加耶稣”系统地从理论上加以鼓吹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他通过提倡兴学、办报、出书和写文章等间接传教的方法，向中国的上层，如官吏、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宣传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思想，并提出传教士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主张。他认为这样比以往各国教会传教士多与中国穷人打交道的办法，能在更大范围、更直接地影响中国的政局。他自办自编的《万国公报》共出了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46



750期；以他为主要干事和领导人的广学会，共印书246种，达73万余册。除创办中西女塾外，他还创办了中西书院。

1885年底，宋嘉树在血腥的排华浪潮中乘坐火车横穿美国，抵达旧金山，换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1886年1月13日，24岁的宋嘉树抵达上



◎1886年，宋嘉树由美回国途经日本时留影。

海，回到他离别了十年的祖国。

曾受到善良的美国人民关怀、爱护和帮助，并将美国视为自己第二故乡的宋嘉树，在神学院毕业后就初尝种族歧视的苦果。林乐知按照马克谛耶主教的指示，打发他到吴淞、苏州、昆山一带布道，有时也在当地的教会学校兼课。据他的学生胡适回忆，当这位新老师出现在讲台时，他宽阔的身体、短发和华南人的容貌，引起了学生们的嗤嗤窃笑。但开始讲课后，学生们立即安静下来。新老师平凡的出身和不平凡的经历，强有力地吸引了他们。对于他的薪金，林乐知认为，宋嘉树只不过是“一个失去民族特征的中国佬”，因此仅付他每月15美元的薪水。这个数目大大低于同等职级的美国神职人员的收入，只相当于一个被雇佣的中国人的工作。还煞有介事地声称是为了不把这个“中国佬”给惯坏了，种族歧视变得更为赤裸。这让踌躇满志的宋嘉树在归国初期的心情很不舒畅，不得不常常在顶头上司面前像老鼠那样忍气吞声。

尽管这样，宋嘉树还是以极大的热忱，虔诚



地进行着他传教士的工作。他在1887年2月4日写给索斯盖特先生的信中，报告了他在上海传教的情况。信中说：

我已经开始用本地方言布道，尽管方言讲得没有我想要的那样流利……昆山是个有着4英里围墙的城市……请为我和我的工作祷告，愿上帝让我们来年取得更多的成就，更加深切地体会他的爱。

1887年12月21日，宋嘉树在写给《罗利基督教倡导者》报的信里，也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工作：

工作前景非常乐观，主的灵迅速走向蒙昧的人们的心中……中国布道团已完成使命……我回到昆山已有一年。在主的慈爱和帮助下，我希望为主能做多、更好的工作……我们在苏州的女子

医院业已建成，在上海英租界新建的砖
砌教堂处于收尾阶段。

当然，宋嘉树的心中孕育着反抗。他称林乐知是“那个无视我一切应得权利和平等地位的人”，并打算一旦时机成熟，“我将打掉目前这位上级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以及他对本地牧师的憎恶态度”。

正当宋嘉树感到极大苦闷之时，他在上海街头与昔日在波士顿结交的朋友牛尚周邂逅。牛尚周觉得有一个为宋嘉树排忧解难的好办法，那就是让他早日成家。此时，牛尚周已经结婚，妻子是余姚牧师倪蕴山的长女倪珪金；温秉忠成了他的连襟，娶了倪蕴山的三女儿倪珪英为妻。倪蕴山的二女儿倪珪贞仍待字闺中。她受过西方教育，数学特别好，又弹得一手好钢琴。年幼时，母亲一度按旧俗给她裹脚，结果发起了高烧。父母心疼女儿，终止了这种摧残肢体的酷刑，从此倪珪贞便有了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中非常罕见的天足。在以“三寸金莲”为美的年代，被讥为大脚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50 ■



婆的女子很难找到一位合适的中国丈夫。于是，牛尚周自告奋勇，充当了“假洋鬼子”和大脚姑娘之间的媒人。

1887年仲夏，21岁的宋嘉树跟18岁的倪珪贞



◎初婚时的宋嘉树和倪珪贞。

在上海三马路与泥城桥路之交的监理会新教堂举行了婚礼。这对当时盛行的正统中国婚俗来说，是一个大挑战、一个超时代习惯的新式婚礼。主持人是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婚礼的气氛跟盛夏的气温一样热烈。倪珪贞娘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宋嘉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契机。宋嘉树的人生开始了第二次转机。

宋嘉树结婚之后，临时住在岳父母家中。1888年，宋嘉树被提升为正式牧师。1890年2月，他在英租界山东路上开设了一家华美书馆，作为自己的兼职。他的书馆，替美国圣经协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印行中文版《圣经》及其他宗教读物。这一印刷业务虽然赚头不大，但可以从一些西方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得到金钱和技术方面的帮助。为了赢利，宋嘉树又大量翻印西方的历史、科学、技术书刊。不过，为宋嘉树带来巨大财富的还是经营面粉生意。他用卡尔将军替他购置的面粉机开设了一家阜丰面粉厂，自任经理。由于该厂碾制的面粉质优价廉，立即源源进入上海租界的面包房和粮食店，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52



不久，这家面粉厂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面粉厂之一。这样，在宋庆龄出生的前一年，宋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完全可以不靠教会的施舍和约束过日子了。

1892年，因为林乐知无理阻挠宋嘉树回海南岛探亲，每月15美元的收入又不能养家糊口，宋嘉树便辞去神职转而经商。但他仍然热心教会的事业。他在1892年10月9日写给《基督教倡导者》报的一封信中说：

……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着传道的终止，……现在我在为美国圣经会工作，但是依旧做着和我们教会有关的事情，希尔和邦尼尔兄弟可以作证。因此，离开布道团仅仅意味着我只是监理会布道团里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说，不依靠本地教会的支持而为布道团竭尽全力。

他接着说：

我现在掌管着监理会新教堂。该教堂由美国堪萨斯城的穆尔兄弟所捐赠，是本市最漂亮的教堂。该教堂主日学校^①规模很大，学校教师都很优秀。我给上课的班级里，学生老幼均有。

他对基督教的最大贡献是参与创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最早是在1876年传入中国的，但只是在一些学校建立了小组织。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举行全国大会，正式向美国提出请求派员到中国来组织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由加拿大和美国组成的基督教北美协会首次派遣了莱会理牧师来到中国，开展青年会的活动，正式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宋嘉树辞去传教士的工作之后，在经营印刷业和工商业的同时，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创办青年会的事业中，成为组织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之一。他不仅在上海活动，还走遍全国几个大城市。终于在

^①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又称星期日学校，是教堂利用星期日正式礼拜前一个多小时开设的一个宗教文化班。



1900年正式成立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翌年，宋嘉树资助的上海青年会馆落成，此后其他城市的分会也逐渐成立。

然而，基督教义中描绘的美好天国，跟他亲身经历的严酷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反差，宋嘉树不得不思考通向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有效途径。

于是，除了富商及教友领袖的身份之外，宋嘉树还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他的华美书馆成了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他为主张君主立宪的教育家姻兄温秉忠印刷西方教科书，还为反清团体印刷了很多秘密文件和政治宣传品，而且跟孙中山有了直接交往。有一位反清志士写诗赞道：

壮哉印书馆，
“华美”天下传。
《圣经》表其志，
檄文快我胆。

1894年阳春三月，宋嘉树在书馆接待了途

经上海北上天津给李鸿章上书的孙中山。据宋庆龄晚年回忆，宋嘉树跟孙中山最初是在美国相识的。宋嘉树在美国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必要性，因而成为朋友，还曾一道旅游。据《宋家王朝》一书介绍，“孙和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穆尔捐建的卫理公会教堂里，是在星期日做礼拜之后经人介绍而认识的。孙一生里经常到教堂去寻觅新成员。他常爱说：‘我不属于由各种教会组成的基督教，而是属于革命者耶稣的基督教。’”由于宋嘉树和孙中山都是广东同乡，都在国外受过教育，又都有宏大抱负，甚至都曾想学医学……这许许多多的共同点，使他们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旧友重逢，友谊倍增。宋嘉树认为孙中山的天津之行不会有什么成效，但他保证，孙中山此行如不成功，他可以在长江流域组织力量支持孙中山的事业。这次会见时，宋嘉树还介绍给孙中山两位朋友，一位是招商局帮办、《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另一位是声望颇高的新闻工作者王韬。孙中山到天津后，李鸿章果然没有接见他，他只得将《上李鸿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56



章书》交给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发表，第一次将他的改革主张公诸于众。

在宋嘉树的参与建议下，孙中山于1895年10月发动了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乙未广州起义。1903年，为了反对俄国侵略中国，他又积极支持在上海的爱国者发动拒俄运动。据《苏报》记载：当上海教会进行拒俄活动时，“在美华书馆演说者以宋君耀如为最著，大旨谓耶教救国有自由之权，今俄人夺我之地，我欲自保，并非夺

◎1913年3月11日，宋嘉树（前排左一）与孙中山（前排左二）、戴季陶（前排右一）等在日本大阪参观《每日新闻》社。



人之地。教友能结团体，如日方新，有蒸蒸日上之势云云。”1905年，同盟会成立，宋嘉树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人，后赴美国为革命筹款。他特意拜访了“卡尔父亲”，请求他在经济上支持孙中山的事业。此后，他还多次往返日本、美国和中国之间，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他还被同盟会任命为司库并兼任孙中山在上海党部的执行秘书。有人称他为孙中山“最大的财务支持者”。

宋嘉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从此成为了孙中山为数不多的密友之一。由于他的革命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在孙中山革命的公开记录上，有关宋嘉树的革命事迹记载很少。他的革命活动虽然鲜为人知，但他所做的默默无闻的贡献却熔铸在孙中山不朽的事业里。孙中山在1912年4月17日《致李晓生函》中这样写道：

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
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58



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与实业，而隐于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

四 虔诚贤淑的母亲

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受父母的影响，自小便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教徒。

倪珪贞出身名门，母亲倪徐氏，是明代大科学家、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天主教徒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子孙。徐光启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正处于中国由先进向落后转折的关键时期，他出于强烈的爱国心，为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而矢志学习，成为了明代中国向西方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先行者，也是明末沟通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人物。他留下的科学遗产，如编撰的《农政全书》、翻译的《几何原本》等，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徐家自利马窦来华，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之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60



后，家人都成为了虔诚的教徒。且自徐光启起，徐家世代为官。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后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上海，住在现在上海西南部的文化、经济、交通中心徐家汇。据说，“徐家汇”就是以这个家庭命名，从字义上解释即“徐家聚居地”。

徐家汇后来划入法租界，教会的活动受到了租界当局的保护，由于这种历史与宗教的渊源，徐氏家族一直在租界内很有威望和影响。宋庆龄十分重视这一血缘关系，深为她的这位杰出的远祖感到自豪。她说，她跟埃德加·斯诺数十年友好，从未发生过争论，但斯诺介绍她的家世时没有提及徐光启，她颇感遗憾，并提出了意见。

倪珪贞的父亲倪韞山和宋嘉树一样，是一个虔诚的中国籍的牧师。倪韞山还是一个法律学造诣很深的学者。他活跃在社会上层，各界都有他的好友。由于工作关系，他年轻时就由浙江余姚迁居上海，在倪珪贞的母亲徐家任教师，后来和徐家的一个姑娘结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倪蕴

山思想开明，所以倪家的孩子不分男女都接受教育，他把子女都送入教会学校读书，不包办子女婚姻。

由于信仰、性格、志趣相投，倪珪贞嫁给宋嘉树后，生活美满幸福、和谐融洽。

婚后不久，倪珪贞与宋嘉树离开上海，赴昆山布道。新婚燕尔，倪珪贞便体会到了传教士的清贫。宋嘉树的月薪15美元，寒冬来临时，倪珪贞连一条新围巾也舍不得买。日常的生活费用，也要靠她不断地变卖从娘家带来的嫁妆才能维持收支平衡。作为妻子和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倪珪贞非常称职。她善持家务，自奉俭朴，又具有先进思想，是个乐于助人的家庭主妇。宋庆龄和她的姐妹兄弟们经常这样说，那时“母亲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节余下的钱，她即捐赠给革命事业。她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 and 教堂的赞助人”。“虽然，父母并不十分富裕，但母亲仍然让全家人都生活得快活和舒适，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始终保持这样。”她的作为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朋友们称她是“世界上



最好的女人”。

倪珪贞个性很强，不屈不挠，具有刚强的意志，竭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宋嘉树在家里的地下室秘密印刷革命小册子和文件。如果这些秘密工作被人发现，将会给全家人和亲戚们带来灭顶之灾。宋庆龄的祖母曾经多次严厉地警告和提醒倪珪贞，但倪珪贞依然默默地支持宋嘉树的革命活动。

对于宗教，倪珪贞似乎比她的丈夫更为虔诚，凡是在宗教信仰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事，她都不遗余力去做。她虔诚地信守十戒，完全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她视酗酒、赌博和跳舞为罪恶，不允许在自己家中进行这些活动，而且把这一切都看作是神的意志，不允许违反。她一生笃信祷告的力量，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宋美龄在谈到她的母亲时曾这样说：“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

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①

倪珪贞要求孩子们办事认真，并以身作则。她校对华美书馆出版的《圣经》时，就要求不出一个错字，因为任何差错在她看来都是对上帝的亵渎。

对孩子，她采用的是斯巴达式的教育，从小就开始向他们传授知识，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中国有句古话叫“养不教，父之过”，但倪珪贞认为“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所以她一反古老中国严父慈母的惯例，对子女始终严加管教，严禁孩子们做有失体统的事情，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为了不让孩子们在受了西洋教育后，变成马克谛耶主教所希望于宋嘉树或他的子女们的那种“失去民族性”的中国人，宋嘉树夫妇坚持让孩子们接受一点儿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特意请了原来曾为宋嘉树补习中文的家庭教师来教孩子们学习中文。一次，在古典文学课上，先生觉得应该对宋家的第二代管教得更加严

^①宋美龄：《祈祷的力量》，台湾《读者文摘》，1955年第7卷第4期。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64



格些。可是大姐蔼龄不喜欢这些功课，于是瞅了个机会，溜到老师的背后，把老师的辫子系在椅背上，然后不动声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故意气老师。结果老师被气得猛然起身，准备去惩罚蔼龄的时候，却被狠狠地向后一拽，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椅子也顺势砸到了老师的身上。为此，倪珪贞狠狠地打了蔼龄的屁股。母亲自己喜爱读书，不爱干针线活，但却希望女儿们拥有这项技艺。她请来一位守寡的贫妇培养女孩子们的这项本领。上海话里的“女工活计”一词听起来像“女叫化子”的音，还是大姐蔼龄，她不喜欢刺绣，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做文章，戏弄师傅。后来，女工师傅知道了孩子们在叫她时笑个不停的原因，就跑到倪珪贞那里去告状。母亲觉得蔼龄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少女的礼节，同时也是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就严厉地训斥了女儿。后来还是父亲宋嘉树出面袒护蔼龄，她才没有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庆龄却慢慢喜欢上了刺绣，直到晚年，作为消遣和修身养性的好方法，她有时候还会绣些小品。如今，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卧室床

头，还悬挂着宋庆龄和保姆一起完成的刺绣作品《安多利恒花》。

在孩子们当中，母亲最宠爱美丽而富于幻想的庆龄。她回报母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珍视和学习母亲的优秀品德，特别是把责任心置于自我之上，为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亲友们认为，庆龄很多脾气也像她的母亲。

宋庆龄对母亲的爱是深沉、细腻的。在上海淮海路宋庆龄的住宅中，餐厅的东墙上，庄重地挂着一幅母亲倪珪贞的大型半身油画像，母亲的脸上流露着一种“永



◎1900年左右宋庆龄与母亲合影。



恒的微笑”，显示出她对儿女无限的爱。这是20世纪20年代一位美国画家送给宋庆龄的。她一直视为珍宝。画像下面摆着1943年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生协会赠送的银盘，盘内镌刻着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园美景。正是这位教育思想比较开明的母亲，让15岁的小罗莎蒙德远涉重洋到美国留学。宋庆龄看到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银盘，该会忆起母亲对他们的慈爱之心，忆起那段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吧。此外，在宋庆龄去美国读书时，母亲送给她一枚蓝宝石胸针，她也一直珍藏在身边，现在陈列在北京宋庆龄故居的展览室里。

倪珪贞喜欢梳一种中国式发髻，并要求她的女儿也这样。1927年大革命时，一些革命妇女流行剪短发，有些人建议宋庆龄也剪短发。宋庆龄坚决拒绝了这些人的建议。这除了表现出她不随流俗，不赶时髦，脚踏实地地奋斗的独立人格之外，还有对母亲深沉、细腻的爱。

倪珪贞夫妇把女儿们作为智力上完全与男子平等的家庭成员来对待的思想和他们对中国慈善

事业的贡献，更使三个女儿感受至深。日后，性格迥异、立场不同的三姐妹都热心于中国的妇女运动，都直接从事或领导了中国的妇女运动，并发表了许多有关妇女解放的论著，以实际行动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并不同程度地从事中国的慈善事业，不能不说是受到她们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1939年7月20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斯大林、何香凝等一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①。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和何香凝的当选，是对她们热心从事中国妇女运动和慈善事业的肯定，而她们在抗战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并引导更多女性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宋庆龄和她的兄弟姐妹，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分歧、思想信仰的不同而分开了，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骨肉亲情。直到晚年，宋庆龄还曾多次对身边的隋永清说：“我们家的兄弟姐妹，看法不同，但亲情永远不断，我们总是互相牵挂，互

^①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68 ■



相惦念，我们始终是一家人，是兄弟姐妹，是至亲。”这也是倪珪贞夫妇所赋予她们的中国平民百姓的性格特征。

五 留学亚美利加

1907年，在教育部门为选拔赴美留学生而举行的考试中，首次出现了女学生的身影。经过考试，最终从全国选定了11名男生和4名女生，作为官费生派遣出国。庆龄就是其中一员。这是中国“官费女生留学西洋之始”。宋庆龄曾自豪地说：“这场考试的成绩使那些男主考官们认识到，女学生在智力方面并不亚于男学生。”

美龄听到这一消息，也要求跟着去。当时，庆龄14岁，而美龄只有10岁。父母劝美龄晚些时候再走，但美龄却坚持要跟庆龄同行——因为有一次她生病时，父母曾经答应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

面对即将出国的庆龄和准备同时赴美的美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70



龄，父亲宋嘉树嘱咐道：“爸爸让你们去美国，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终止你们的追求。”

当时庆龄的小姨父温秉忠（1862~1938）代表清政府出洋视察各国使馆。当年8月，经过一番曲折，庆龄、美龄终于跟随温秉忠登上了太平洋邮轮“满洲里”号，踏上了赴美的漫长旅途。他们一路顺风，船靠旧金山码头时，也没有发生四年前蔼龄抵达这里时遇到的因证件“不合要求”而不准上岸的麻烦。

入境后，姐妹俩先入新泽西州萨密特镇的一所私立学校（校名为波特温）补习法语和拉丁语，因为这两种外语是大学入学考试时必须应考的。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身材修长，长着一头栗色头发的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她的祖先是白俄，父亲曾在耶鲁大学辅导过中国学生，对远东的情况有所了解。校舍是租赁的，白色的墙壁，褐色的屋顶，显得朴实无华。两个异国小姑娘在这个

当时还不怎么繁华的小镇，很引人瞩目。以至于数十年后她们的一些师友们还记得她们。这所学校一名叫埃米莉·唐纳的学生后来回忆起庆龄入学时的情景：“……有一天早晨我们来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她们已经来了。大的那一位非常庄重、文静，年龄约莫有15岁，看来比我们都大得多。我们当时都是9岁左右。她的中国名字叫庆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称呼她‘罗莎蒙德’……我们不常见到她，因为由于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她自然不会来参加我们那些小孩子的玩耍和戏闹。”

宋庆龄酷爱读书，爱泼斯坦曾经说她是“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经常到学校对面的萨密特镇图书馆去借书。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记得，“她是一个害羞、漂亮的姑娘，书读得很多。她经常选择一些非常严肃的书来读，这些书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通常是不读的。”路易丝·莫里斯记得庆龄到他们那里如饥似渴地看书的情景。她说“这个严肃的姑娘”，贪婪地读着成年人看的书——小说、传记和历史等等；这些书籍无论是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72



文艺或非文艺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超出一般同龄少女们的鉴赏水平”；而美龄却喜欢读《兔子彼得》一类的童话故事。

1909年夏，庆龄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监理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文学系。9月5日正式注册入学。

美龄因为年龄小，还不能上大学，暂时留在佐治亚州的山城德莫雷斯特，在那里一所叫皮德蒙特的学校上八年级。葛龄一位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负责照料美龄的生活。1910年，威斯里安学院新院长修订了非本院学生不得住校的规定，美龄才以“特别生”的身份就读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来到二姐身边。当时大姐宋葛龄已经是这所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了。三个姐妹



◎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能在异国他乡团聚，无比快乐。

葛龄在庆龄入学的四年前，就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预科班的学生了。她是第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女孩子。宋葛龄在学生时代，就是个聪明、大胆的女子。1905年12月，温秉忠受清廷派遣，率领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考察时，温秉忠把宋葛龄从梅肯市接到华盛顿，并在1906年1月带她出席了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宴会。就这样，宋葛龄成了宋氏家族中会见美国总统的第一人。在宴会上，罗斯福总统问这个17岁的中国姑娘觉得美国怎么样。宋葛龄说：“美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很幸福。但是，为什么你称它是个自由的国家？”她用坚定而温和的语气叙述了她刚抵达美国时被海关扣留的遭遇，向老罗斯福总统表示了抗议。“如果说它那么自由，为什么一个中国女孩却被拒之于这个国家的大门之外？我们从来不会这样对待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美国可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世界啊！”听了她发的一通怨气后，总统大感意外，只是喃喃地说他对此表示歉意，就转向了下一位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74



客人。第二天，华盛顿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题目是《中国少女抗议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蔼龄学习成绩很出色，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学院备受欢迎的学生。她当时并没有忘记，父母将她们姐妹都送到美国接受教育，绝不是为了让她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而是为了让她们学成之后更好地报效祖国。所以当有一位教授夸奖她是“漂亮的美国公民”时，蔼龄觉得是受了奇耻大辱。她当着同班同学的面反驳说，她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中国公民，并为此而感到骄傲。

梅肯是奥克穆尔吉河畔的一座小城，树木葱茏，色调淡雅。当庆龄到来时，这座城市仅有85年的历史。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坐落在这个年轻城市的小山上，四周一片苍松翠柏，学院原来只有一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建筑风格的大楼，正面矗立一排圆柱，好像是一排警戒的哨兵。庆龄入校前不久，主楼改建成了维多利亚式的美丽的楼房，增盖了尖形的塔楼和带阁楼的房顶，为了保证学生们能有舒适、卫生的生活环境，每间寝

室都配有大壁橱和梳洗间，每层楼都有设备完善的卫生间。这是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很少。而在庆龄留学的时代，学生人数则更少——住校生仅七十余名。来这里上学的学生，不是富家千金，就是名门闺秀，一百多年来，学校培养出不少文学、医学和商业方面的人才。而宋氏三姐妹则是这所学校的骄傲和荣誉。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的宋氏三姐妹，
左起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

大学时代的宋庆龄好学深思，讨论问题时态度文雅，而且雄辩，这给老师和同学留下深刻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76



的印象。同学们亲昵地称她为“苏西”。她的同学霍莉黛夫人和其他校友回忆，“她当年是一个有学问的、严肃的和有理想的学生”，“她温柔而好思考”，“她非常用功，从不漏掉任何一门功课的作业，总看见她在学习”。校友们还将她跟她的姐妹们作了比较：“庆龄娇小美丽，看起来比姐姐和妹妹更庄重。她是三姐妹中最好的学生：沉思，内向，就她这样年纪的孩子来说，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

学生时代的宋庆龄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那时候，她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个孙中山先生的热心拥护者。在思想上庆龄与她的姐妹们相比，更富有爱国主义感情、民族感情和关爱下层人民的感情。宋庆龄和宋美龄到美国后，父亲经常“给女儿们写长信、寄剪报，使她们了解国内的形势。宋庆龄能够从这些片段的情况中了解到孙中山博士革命的艰难历程”。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凯瑟琳女士评价：“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对国家大事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有着浓厚的兴趣。”

校友们回忆，宋庆龄通常表现得认真严肃、沉默寡言。有一次班上讨论问题，有同学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多地考虑国家大事，而不无忧无虑地享乐。她回答说：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所说的那些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有的同学评价说：“正是她那副忧伤和沉思的神情，使她显得俏丽动人，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忠贞不二的造反者了。”

还有一次，历史教授问她：“从历史课上学



◎1911年，宋庆龄（下右八）和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同学们。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78



到的，你觉得哪件事最重要？”她说：“我想，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上，不唤起全民族的精神，就不能有真正的进步。”她的精辟见解，使老师和同学们都赞叹不已。

在校友们的记忆中，庆龄还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有一次，历史课上讨论“历史进程与历史演变”问题。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同学说：“世界文明的中心曾经很长时间在中国，后来则是欧洲，现在转移到了年轻的美国，我看不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庆龄不同意这种见解。她用流利的英语反驳道：“我不同意中国已经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说法，因为这个观点没有考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既然对世界的昨天发生过重大影响，就不可能不对世界的今天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的现实是，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事变，许多仁人志士在组织革命团体，他们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中国的革命现在虽然没有胜利，但总有一天会胜利！”

而美龄则恰恰相反。有一次，美龄曾骄傲地宣布：“在我身上唯一属于东方的是我的脸

孔。”还有一次，美龄对历史老师说，她不想听关于1860至1864年间解放黑奴的美国内战的讲述，因为她作为美国的南方人，感到厌恶。这意思是说，年轻的美龄不仅把自己看作是完全的美国人（除了她的皮肤），而且是属于美国南方奴役黑人的上层阶级。然而，年轻的庆龄却极端厌恶美国上层人士对东方人的歧视和对黑人的压迫，在她的心目中，这些都是严重民族偏见。

宋庆龄的英语十分出色。在美国读书期间，老师称赞她：“在英文课的班上，她写的文章最好。”据威斯里安校刊记载，宋庆龄，“1912年~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The Wesleyan）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Harris Literary Society）通讯干事”。

庆龄的思想、才华，可以从她大学时发表的那些才华洋溢的作品略窥一斑。这些文章无不饱含着宋庆龄对于祖国的爱，而她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则成为她终身不渝的两大特征。

1911年11月，18岁的宋庆龄在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学生文学杂志1911年11月号上发表了她的第



一篇文章《留学生在华之影响》（*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Educated on China*），论述了中国早期留学生在政治、教育、社会改革等方面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影响。号召中国留学生应该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抒发了自己为祖国而学习，希望归国之后全力以赴克服现存弊端的崇高愿望和坚定信心。译文如下：

中国鉴于新思想之需要，年必遣送大批男女学子来泰西各国求深造。此等留学生回国之后，在政治、教育、社会上具有莫大之影响。

数百年来，中国之政治，日趋腐败。政府要职俱入学者手中，或由朝廷恩赐，或由金钱捐得。彼等于政治行政，毫无智识。于是万民怨愤，时起反叛。及至今日，政治始渐上轨道，以留学之士，充任官职，而去庸凡之辈。朝廷颁布，中国将于一九一七年改为立宪

国家。

中国人素以教育为重，惟几世纪以来，所谓教育，完全倾向古文。义和团事件后，中国人始知古文之外尚有其他更重要之文化。政府礼聘西洋博学之士，演讲于大学之中，由译者传述其意，惟译者时有错解，以致迭成笑话。是以留学之士，能以其所受之西洋思想，用国语传述，遂为国人所欢迎。

智体二育并重，为教育之基则，是以西洋体育运动遂传入中国学校。今日之中国青年，无不以运动为重。辩论一事，亦所重视，因而始知“平等”“自由”之获得，不在罢工，反叛，而在缓和之教育。由于此辈留学生之建议，华北华东诸省遂有许多大学之设立，其中授业之教师皆为留学生。

至于社会之改革，亦蒙极大之影响。诸如戒烟会之设立，青年会之成立，缠足风气之革除，中国青年不复再



愿与缠足女人结婚，婚姻制度改革，是皆由于留学生之大声疾呼所致。辫子之革除，尤为不可或缓之事。

社会上街巷之陋习，世界各国，无不相同，中国自亦不能例外，是以留学生等亦切冀改革此种情形。

纵观以上，留学生之在中国，确有限之援助。今日之中国，确有限之机会，使留学生得以为国效劳，中国目前之诸大问题，亦有待于彼等之改革也。

很明显，宋庆龄在这篇文章中列举的有些事是她父亲从事的工作。她以后所走的道路也在这篇文章中略见端倪。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当时孙中山正在远离宋庆龄所在的梅肯城的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为革命筹款。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余年来浴血奋战、屡遭挫折并陷入困境的革命，竟然在他没有

安排的地方成功地走出了第一步。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16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从美国回国，抵达上海。他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被南京举行的十七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到南京宣誓就职。宋嘉树一家也随同前往。在宣誓就职仪式上，宋嘉树夫妇、蔼龄、子良、子安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宋家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从此公开。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宋蔼龄正式担任他的英文秘书。宋嘉树的工作更忙了。倪珪贞写信给在美国的女儿说：“提到你们的父亲，有很多话要说，但也不想多说。我只告诉你们一点，他正在老朋友之间，做他乐意做的事情。”不久，父亲给她们写信说：“我正和孙中山一起工作，还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国内的现状有利于革命党人，但做伟大的事情，总是要冒些风险的。促成民主，并非旦夕一蹴而就的。”^①随信，

^①陆印泉：《宋庆龄与辛亥革命》，载《团结报》1986年5月24日。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84



父亲寄来一幅第一批制作的新国旗——五色旗^①。庆龄接到信和旗后，激动万分，马上跳上椅子，挂在墙上，并把原来悬挂的清朝的龙旗扯下来，扔到地上，踩了又踩。和她同寝室的同学还记得，当时她还情不自禁地喊着：“打倒龙旗！高举共和国的旗帜！”欢呼辛亥革命的胜利。

接着她就写了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1912年4月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上。这篇文章充满了宋庆龄欢呼的声音。她说，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个辉煌的成就，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遭到剥夺。她高兴地认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而她更远的目标是“博爱”，并认为自己的祖国将首先达到这种境界。在引用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名言

①五色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中国动，则渠将动世界，是可知中国之伟大”之后，她满怀信心地写道，实现这个预言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并且这个国家将对人类的进步产生影响。她还认为，中华民族应当在世界和平中起到先导作用。

自滑铁卢战役之后，二十世纪最伟大之事件，依照多数教育家与政治家之意见，厥惟中国革命一事。是为世界上最光荣之成功。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此后将无复再有满人专制中国，中国本属富有之国，而满人使之穷困如今，岂不痛哉！

五月之前，余等之幻梦尚无成为事实之希望，人们所切望者为立宪之政体，惟中国爱国之士，无论士农工商均以推翻满清为快。所谓迫之者急，则抗之者必烈。



报载中国发起剪辫运动，一洗吾国人之辱。十年之前，无辫者寥若晨星，欲求仕禄者无人敢去发辫，而今日则几无人有辫矣。今日中国之其他问题，诸如币制问题、捐税问题，亦在切待解决之列。余等坚信，中国人民当能以最明练之法恢复国家之繁荣与团结。

中国革命烈士，以无数赤血，已换得自由平等，所待者仅博爱一事而已。可尔葛德大学教务长克劳萧曾谓博爱至今犹未明了之人道主义也，人与人之间，如不以兄弟同胞相待，则平等无从而生，如不互相友爱，则自由无安妥之基本，是以博爱为自由平等二者之前提。

中国以世界历史最古之国，尚有解决博爱之大道。梟雄拿破仑氏曾谓：中国动，则渠将动世界，是可知中国之伟大。中国地大物博，民众占世界人口之四分之一，于人类之一切有极大之影

响。法律之首创者为中国，哲学之玄想发轫于中国，礼节道德亦始于中国。几世纪来，中国人民为最爱和平之人类，以纸笔代干戈，不以战争为乐，不以武人为重。中国之民族当为世界和平之先导者。

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年仅19岁的庆龄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世界和平和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以及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成了宋庆龄一生中最关心的事情，以至在后来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艰险进程中，她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进行了无数艰苦的斗争。

文中洋溢的爱国主义激情，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引用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名言“中国动，则渠将动世界，是可知中国之伟大”，被中国留学生和广大华侨传为激励爱国豪情的警句。

同月，她还发表了童话《四个小点》（*The Four Dots*），讲述了一个“善有善报”的故事。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88



故事的内容是：古代一个名叫杨韦林的孩子，勤奋善良，曾经救过一只在雨中挣扎的小蚂蚁。后来，他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在试卷上漏写了四个小点，蚂蚁为了报恩，用身体填补了这四个小点，使杨韦林得以应试成功。

她还关心妇女和下层人民的问题。1913年4月，毕业前夕，庆龄在《威斯里安》发表的两篇文章就反映了这些内容。

政论文《现代中国妇女》（*The modern Chinese Women*）从1907年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开始在中国招收女学生一事，论证了女孩子的智力并不比男孩子差，因此在提高占人类半数的男子的素质时，不能忽视提高人类的另外一半妇女的素质。同时她号召妇女要获得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则必须靠自己在工作和斗争中去争取，而不能等待别人的恩赐。所以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女留学生，为了共同的幸福，就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她深信，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国妇女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译文是：

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上层社会的妇女就已经受教育了。她们学文学，学诗词，学音乐。遗憾的是，只有出身高贵人家的女儿，才能享有这种受教育的特殊权利。她们是非常幸运的人，但为数却甚寥寥。在欧美人士的眼里，中国妇女，无论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属于上层或中产阶级的，都没有享受到多少自由。除了接触近亲中的男人外，她们生活在一种封闭的脱离男性社会的状态之中。但是，对于中国妇女来说，这种封闭状态毕竟不是什么很不好的事情。因为她们生性温顺软弱，一心只管家务，一心追求家庭乐趣；她们所具有的那种满足现状的心理，在其他地方是难以找到的。她们也同亲朋来往，互相进行访问；在家里，她们受到家人的爱戴和尊重。的确，她们还能更多地希望什么呢？



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以及受尊重的程度，都毫无疑问地比过去提高了。受教育的权利，不再像从前那样只局限于个别阶级了。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除了教文学、诗歌和音乐之外，还增设了自然科学、数学、体育等课程。中国政府看到了这些学校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看到了“摇动摇篮的手在治理国家”，便在全国各地兴办学校。这样一来，受教育就成为国民必须履行的义务了。一九零七年，教育部门为派遣女学生出国留学而举行了择优录取的考试，被选派的留学生享受由威尔斯利提供的奖学金。这场考试的成绩使那些男考官们认识到，女学生在智力方面并不亚于男学生。于是，中国政府每年都举行一次出国留学的考试，来从全国各省中挑选一些女生赴美留学。奖学金则是美国用赔款设立的所谓“赔款奖学金”。

不光是政府在为妇女的高等教育尽力，一些平民百姓也把他们的儿女送往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和奥匈帝国去念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来，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她们积极行动，配合政府取缔不良风俗习惯，破除各种迷信。由于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她们比其他国家的大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共同的幸福，她们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她们所取得的毕业文凭，并没有使得她们自命不凡，自视高人一等；她们也没有因此而希望自己成为置身“象牙之塔”的精神贵族。

当今中国的妇女，如同其他文明国家的妇女一样，都享有同样多的自由。尤其是城市妇女，她们都和男人一样平等。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妇女们在大礼堂内倾听自己的姐妹站在讲台上作报告，还可以看到她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现在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平等普



选权”问题，而且也把开始的步骤和将要采取的措施记录在案。这个情况，想来还不至于引起英国姐妹的妒忌吧。在不久的将来，从这些妇女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出现潘克赫尔斯特和贝利蒙特式的人物。但希望她们的口号是“争取女权不要像男子那样去打架”。既然人类一半人口的提高不可能同时提高另一半人口，既然中国正在鼓励办好女子高等教育，我们深信，用不着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

这是宋庆龄最早论述妇女问题、宣传男女平等思想的文章。从此，研究妇女问题，进行妇女解放运动，就成为她一生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她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和领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在散文《阿妈》（*Ahmah*）中，她以自家的

保姆为原形，充满感情地记述了一位在他们家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目不识丁的老保姆，表现了她仁慈的胸怀和对下层人民的挚爱。

在威斯里安读书期间，宋庆龄还是个网球爱好者。课余时间，她会穿上网球装和同学们一起去打网球，锻炼身体。她是中国最早参与网球运动的女子之一。1911年，当中国国内的女子还在为放开“裹脚布”而斗争，无法去参加任何现代意义的体育运动时，她已经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1911年，宋庆龄（后排右四）与威斯里安学院网球俱乐部成员合影。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94



网球俱乐部的成员了。

1908至1913年，宋庆龄在美国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时期，经过美国民主主义的熏陶，由一个天真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她的爱国主义思想也随之日趋炽热并进入到献身革命的境地。

1913年春，20岁的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



◎1913年春，宋庆龄大学毕业照。威斯里安毕业生年鉴上对这幅照片的说明是：“从她的双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

六 接近革命运动的中心

日本大正二年（1913年）深秋，一群老练的日本便衣警察在横滨、神户、东京等城市频繁地活动着。他们的秘密使命，是密切监视流亡到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孙中山、宋嘉树等人的行踪，每天向日本外务省作出报告。他们发现，这年8月29日上午，宋嘉树离开了他在横滨海滨山上租赁的楼房，到码头迎接一位亭亭玉立、文静腼腆的年轻女郎——他的二女儿宋庆龄。当时宋庆龄已从美国威思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取了文学学士学位，专程从美国赴日本探望她的父母。她带来了仍留在美国攻读的妹妹美龄、弟弟子文对家人的问候，还特意远道带来一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产的水果——这是孙中山在美国的崇拜者托宋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96 ■



庆龄带来的礼物。

本来1913年初夏，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的庆龄准备返回上海跟久别的亲人团聚。美龄由于孑然一身，转学到了麻城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由一年前考入哈佛大学的大哥子文作为监护人。她6月22号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之后，突然收到了父亲的一份电报，要求她推迟行期。



◎1913年，在美国波士顿宋庆龄（右）与宋子文（中）、宋美龄（左）合影。

原来，当庆龄准备回国时，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3月，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4月，又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磅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作为镇压国民党的军费。这两件事，使孙中山认识到袁世凯乃是破坏共和的奸人，于是力主兴兵讨袁，先发制人。宋嘉树则是孙中山这一主张的全力支持者。6月，正是武装反袁的酝酿时间。

宋庆龄接到父亲的电报后，立即退掉船票，将行李存放在檀香山，借此机会到美国各地去游历。当时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恰好是庆龄姨父温秉忠的同窗好友。他替庆龄订了一个有趣的日程，让她到处观光，并出入于舞会和剧场。在中国留学生举办的有150人参加的招待会上，庆龄作为主宾受到款待，由此可见她在留美学生中的威望和影响。在檀香山时，她驱车进山，观赏了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奇花异木，品尝了名称古怪而味道极佳的水果。在那里，她遇到了不少中国和日本侨民，还有穿着像胸衣一样的服装的肥胖的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098



士著人。英国有句格言，叫“生活简单，思想高贵”，形容人应该追求的精神境界。宋庆龄用开玩笑的口吻，将她的这一段生活形容为“生活高贵，思想简单”。

7月中旬，江西、江苏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兴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纲领，内部又十分涣散，很快在袁军大举进攻下溃败，孙中山、黄兴再度逃亡日本。宋嘉树也追随孙中山赴日，准备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再次发动讨袁斗争。因此，庆龄只得改变了返回上海的计划。

8月下旬，庆龄乘船赴日本横滨。她乘坐的远洋海轮有170个头等舱位，还有一支很好的夏威夷乐队，跳舞时都由乐队伴奏。庆龄乘坐的是头等舱。她常走出客舱观看乘客们跳舞。当她看到连传教士也在兴致勃勃地看跳舞时，不禁为他们的凡心未泯感到好笑。庆龄的行李中，有她捐给父亲和孙中山的加利福尼亚水果，此外，她还随身携带了一封友人托她捐给孙中山的信件。

孙中山——这位庆龄幼年时代就崇敬的英

雄，在政治上再次受挫之后将如何行动呢？这件事，牵动着这位20岁少女的思绪。抬头，是一望无际、宁静不动的蓝天；低头，是一片动荡不安的滚滚波涛。海轮在浩淼无边的海面颠簸着，庆龄的心潮也随着海浪起伏不已……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她的一位老师——哈泽德夫人写信说，“我不久就要踏上回家的旅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

早在童年时代，宋庆龄就对孙中山产生了崇拜之心。那时，她的父亲宋嘉树在上海负责保管同盟会的财务账目和会员名册，而且负责秘密印制革命宣传品。孙中山是虹口有恒路宋嘉树寓所的常客，也曾到宋家在山东路开设的华美书馆印刷所跟同盟会的志士秘密集会。宋庆龄经常听人说，孙中山是民族英雄，和她父亲是最亲密的朋友。

有一次，孙中山在她家谈道：“中国一定要改革，要推翻现有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让人民拥有最大的权利。但中国的民众很多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00



人还在沉睡，一定要唤醒他们。一个人如果不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他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我要为中国革命而生，为这个目的去死。”

孙中山走后，小庆龄对她的父母说：“孙先生这个人独具慧眼的，我也决定如此。”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说出这样老成持重的话，全家人听了都感到吃惊。

有时，孙中山深夜来到她家，跟她爸爸一起翻阅那些刚刚印好的、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秘密宣传品。宋庆龄看到后，也走上前去翻看。这时，父母亲就会赶紧制止说：“罗莎蒙德，小孩子不许随便动这些东西！”那时候，宋庆龄梦想着，长大以后，她一定要帮助几百万民众，成为伟大事业中的一分子。如今，宋庆龄终于有机会跟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起工作了，而且又正值这位革命先行者特别需要各方面帮助的时候。宋庆龄认识到，实现她童年时代理想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帮助孙中山，这就是帮助中国革命；帮助孙中山，这就是献身于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目标。

孙中山是因“二次革命”失败，于当年8月4日乘抚顺号客轮离福州到达基隆，5日从基隆改乘信浓号轮船赴日本，8日上午入门司港，正午转往神户。由于宋嘉树是公认的孙中山的亲密友人之一，继续留在中国风险太大，于是也在8月初携妻子倪珪贞、长女蔼龄和两个儿子子安、子良从上海乘客轮到日本暂避。到了日本，宋嘉树很快就跟孙中山会合，恢复了旧日的秘密革命活动。

到达东京的第二天，9时50分，宋庆龄在父亲和姐姐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转交了带来的信件和礼物。这是成年后的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第一次见面。当她实实在在地站在自己久仰的英雄面前时，一下子便觉得拉近了与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正义事业的距离。

从父亲宋嘉树和孙中山的交谈中，宋庆龄很快了解到共和国还在摇篮中就被袁世凯扼杀了，革命没有取得人们所期待的成果，她曾经称颂的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没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真正的生机和活力。如今不但自己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法施展，甚至连家都不能回，只能随同



流亡的家人滞留日本。

据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有关孙中山动态》文件，从1913年9月至1914年9月，孙中山与宋蔼龄、宋庆龄姐妹经常往来。宋氏姐妹除协助孙中山处理公务外，还曾陪同孙中山拜访友人、参观博览会、游览公园。其中，从9月16日至25日的十天中共有七次之多，每次都待上几个小时。1914年3月27日，孙中山腹痛，庆龄和蔼龄曾到孙中山的寓所进行护理。从1914年5月24日开始，庆龄和蔼龄两姐妹同去的次数日渐减少，从6月开始，宋庆龄单独来访的次数增多；这年9月以后，宋蔼龄的名字就很少出现在日本便衣警察的监视记录里了。

宋蔼龄1910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1912年出任全国铁路督办之后，即任命宋嘉树为全国铁路财务处长，同年4月宋蔼龄担任他的秘书。孙中山1913年8月初再度流亡日本，宋蔼龄继续担任他的秘书。但在此期间，宋蔼龄在东京碰到了她在纽约结识的孔子第75代孙——孔祥熙。当时，孔祥熙新近丧妻，心情沮丧，为改换环境东渡日

本，在东京的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担任总干事。孔祥熙的父亲是山西巨商，通过广开当铺聚敛了大量财富。这对以爱财著称的宋蔼龄无疑有很大吸引力。宋蔼龄是最早赴美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女子之一，学识不凡，尤谙于人情世故。孔祥熙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时，就听到过宋蔼龄向罗斯福总统直陈美国移民局歧视华人行为的事情。他很快就被宋蔼龄迷住了。

1914年6月以后，蔼龄忙着准备与孔祥熙结婚，庆龄开始为孙中山承担更多的秘书工作。1914年9月，宋蔼龄身穿绣有梅花图案的粉红色缎子礼服，跟胖胖的孔祥熙在横滨一所坐落于山丘上的小教堂里按基督教礼仪举行了婚礼。

当时宋嘉树得了肝病，不宜按日本的方式长时间席地而坐进行工作；宋蔼龄婚后又很快身怀六甲，行动不便。10月，经孙中山同意，庆龄正式接替了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她经常帮孙中山起草文件；有时孙中山口述，她笔录；有时孙中山提出观点，她形成文字。她还负责密码保管和外文复信，并帮助孙中山致函各地的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04



◎1914年9月，宋蔼龄和孔祥熙在日本横滨结婚。9月20日，宋家成员在横滨合影留念，当时宋美龄和宋子文仍在美国留学。前排左起：宋子安、宋庆龄、倪珪贞、宋蔼龄；后立者左起：宋子良、宋嘉树、孔祥熙。

革命党人，指导就地组党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这些工作中，宋庆龄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离不开的助手。并从中获得了最大的愉快和满足。

孙中山为了推倒袁世凯，重建民国，正忙于重新组党集结革命力量。由于革命屡遭挫折，宋庆龄亲眼看到，“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许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或者投降分裂，跟随在身边的同志不多。”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通过其驻日使馆组织暗杀团，阴谋伺机刺杀孙中山。

所有这些并没有减损孙中山的斗志，他依然号召革命党人鼓起勇气，猛力向前，既不可因失败而灰心，亦不能因困难而却步。他在东京创办《民国》杂志，鼓动讨袁；设立政治学校，培养干部；召开中国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加强革命领导机关；他还频繁地致函或派遣干部与国内及海外各地革命党联系，指导党务，建立武装及筹措经费、军械等各项事宜，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江西等地发动了一些武装起义和暗杀活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06



动。但是由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只是由少数人去进行军事冒险，因此这些小规模的反袁武装斗争都接二连三地失败了。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以图再举，他被选为总理。但中华革命党一成立，就出现分裂。原因是孙中山坚持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他。孙中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支新的队伍在战斗中保持团结，并在遇到挫折或取得胜利后不致于像以前发生的那样分崩离析。然而，同意孙中山这一主张的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这样很少一部分坚决的革命者。另有一些久经考验的同志却反对孙中山的这一主张，因为他们不愿意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事业。许多长期并肩战斗的同志的离去，使孙中山在心理上处于从未有过的孤立境地。宋庆龄曾这样评述，并强调这是孙中山自己后来总结出的结论：“在这时期中，他为了要复活他的政党，进行了改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同时也由于不断地重复了主要依靠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建立严格的党的

纪律这一错误，因此他的政党缺乏广大的群众基础。”^①

在跟孙中山共同工作的日子里，宋庆龄发现，由于岁月的流逝，道路的坎坷，孙中山经常显出憔悴疲惫的神色。在处理完繁忙的公务之后，孙中山就像柱石倾倒的大厦，精神顿时显得颓丧而孤独。不知不觉中，宋庆龄除了关心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关心起孙中山的个人生活。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时，她脸上就会禁不住泛起红潮。

当然，宋庆龄在孙中山身上发现的更多还是他作为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品质和情操。她看到了男子汉性格中最具有魅力的所在，那就是坚定如一的目的性，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敢无畏的奋斗精神。因此，她愿意克服世俗的障碍，跟孙中山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伟大历史目标、一个宏伟的远景而生活。

^①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孙中山诞生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08



在孙中山身边危险而繁忙的工作，使宋庆龄着迷。她在1914年11月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时高兴地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并接着写道：

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七 我愿这样献身于革命

在孙中山处于革命征途十分困苦的危难时刻，宋庆龄在工作中给予了他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在共同的工作中，孙中山从宋庆龄身上感受到“现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他很快被年轻、充满理想、漂亮、文雅而又能干的宋庆龄吸引。

孙中山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两个女儿曾经回忆过1914年夏天的一个晚间聚会。

冈本梅子回忆说：

在吃完晚饭之后，大家都去了客厅，我弹奏钢琴，母亲拉小提琴，宋庆龄也弹奏了钢琴，并演唱了非常动听的



女高音唱段。

在宋庆龄独唱的时候，妹妹千势子在客厅内到处走着。孙先生抱起千势子，并把手放到嘴上，做了个“保持安静”的手势。在整个演唱的这段时间里，孙先生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宋庆龄。

国方千势子说：

宋庆龄小姐就算以当时我的眼光去看，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这个印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连幼小的我都有这般的感觉，可以想象孙先生在这位美女面前时是怎样的一种表情。

1914年11月，宋庆龄和宋蔼龄一起回国时，孙中山就寄居在梅屋庄吉家。自从宋庆龄返回上海以后，孙中山的情绪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原本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但在那段时间

里，虽然翻着书，但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吃饭也没什么食欲了。

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非常担心，便多次问孙先生是不是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还是饭不对胃口。

孙中山总是回答说：“不，没什么，请你不用介意。”

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孙中山的食欲还是非常差，整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德子苦苦思索着。

在德子的反复追问下，孙中山终于承认自己的怅然若失全是为了宋庆龄。

孙中山说：“我忘记不了宋庆龄。遇见她，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体会到了相思的痛苦以及恋爱的那份喜悦。”

然而，孙中山与宋庆龄年龄相差将近27岁。

德子说：“宋庆龄小姐的年龄与您的子女年纪差不多，如果你要与她结婚的话，那可是要折寿的呀。”但即使德子这样说，孙中山仍然坚决地表示：“不要紧，如果能与宋庆龄小姐结婚的



话，哪怕我婚后第二天就死去，我也不会觉得后悔。”

1915年3月27日，宋庆龄由上海返回日本。抵达东京时，孙中山亲自去接宋庆龄。接下来的几个月，宋庆龄和孙中山频繁见面，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1915年5月，宋庆龄在给美国女友阿莉·曼的信中说：

我们参观展览、商店、兵工厂等。晚上我们则去看电影。我并不太喜欢这些电影，但每次看电影都给我带来一些兴奋的时刻，特别是有关历史事件的片子。

晚上数里长街灯火通明，真是华丽壮观。我好几次晚上去那里，为的是想看看荷花池中的倒影。在月光皎洁、星光灿烂的夜晚，这里像梦幻一般的可爱，促使已逝岁月的美好回忆再度涌入人们的脑海。

当前正是樱花盛开时节，我们曾抓

住时机愉快地乘车长行，深入花海。昨天晚上我们沿着堤边走了整整一小时，两旁花枝低垂，使我们望不到天。想象一下嫩绿的杨柳作为背景衬托着这些樱花！大自然也知道如何使颜色协调。



◎1912年，宋庆龄在美国与女友阿莉·曼（后为亚历山德拉·斯科普夫人）合影。她们之间的通讯持续了60多年。



这些诗一般的语言，不能不使人想到，宋庆龄已经沉浸在热恋之中了。

宋庆龄准备6月中旬又一次回国探亲，临行前她叮嘱孙中山：“在我离开后，假使你能把你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大致记录下来，我返回后可以进一步整理，再由你来订正。这于我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而又可以节省你的时间。”孙中山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宋庆龄，满怀期待地问道：“那么，你还准备回来，是不是？”宋庆龄用坚定的语调回答：“当然要回来的，这件事我认真地考虑了好久。我觉得除了帮助你的革命工作外，再没有什么能使我快活的事情了，我愿这样献身于革命。”这时，宋庆龄的脸上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她凝思片刻后，渐渐低下头，略带羞涩之情地问道：“但是，有一件事我愿意晓得：你究竟愿不愿意要我。”孙中山从这位纯真的少女口中听到如此大胆的表白，放在桌面上的双手不觉微微震颤起来，面色也突然变得有些苍白。他极力克制着激情，发自肺腑地说：“庆龄，这也许是不值得的。我是个不值得你考虑的人。我已经老

了，而你还这样的年轻。”宋庆龄站起来，深情地对孙中山说：“革命是不问年龄的。爱情，也没有年龄。因此，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的心一直在追随着你。我的生命已经跟你的生命，跟你的事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相信你是需要我的。你应该发现，在困难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好过些。”孙中山走上前，紧紧握住了宋庆龄的手，两眼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关于孙中山和宋庆龄恋爱定情的事，廖仲恺还告诉过他女儿廖梦醒这样一件趣事：在日本的时候，一次，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到某风景区去玩，一行人爬上一个小山坡。宋庆龄年轻走得快，先到达山顶，孙中山紧跟在后，接着是廖仲恺。廖仲恺平时就动作迅速，走路很快，因此把胡汉民等人远远抛在后面。张静江是坐轿子上山的，更落在后面。快到山顶时，孙中山回转身向廖仲恺摇摇手，示意不要跟上去。廖仲恺会意，就让大家停半山坳休息。过了一会，两人满面春风地走下



山。据说，那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由于年龄差距，宋庆龄怕父母不同意，没有马上决定，但答应考虑^①。

1915年七八月间，宋庆龄返回上海后，准备根据孙中山的嘱咐，就婚姻问题征询父母的意见。但她没料到，在她归国之前，她的父母已经将她许配给了一位名门子弟。大姐蔼龄极力想撮合这桩包办婚姻，拼命向宋庆龄吹嘘那位阔少如何漂亮，如何有前途。宋庆龄这才恍然大悟：这位阔少原来主要是大姐替她物色的对象。她斩钉截铁地表示：“这不是我订的婚，而是家长未经我同意做出的片面决定，我决不会承认它！”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可是我不希望由此而破坏了我们家的欢乐气氛。我一直等了好久，现在不能不说了。”宋庆龄回家一星期之后的一天晚上，趁只有父母在场时，郑重地提出了跟孙中山结合的请求。她的语调徐缓，但具有不容移撼的内在力量。

^①李湄：《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父母惊愕地看着这个外表文静、娇弱的女儿，不知道她要说出什么使他们震惊的话来。宋庆龄接着坦诚地告诉父母：“我跟孙先生希望互相结合，这样我们可以常常厮守在一起。我的心倾向着革命，我可以在革命事业中帮他不少忙。他是一个善良而伟大的人物，希望你们同意我的请求。”

母亲气得几乎要跳起来，她怒气冲冲地反驳说：“庆龄！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年龄比你大一倍，又没有财产。难道他将来准备用火药来喂养你吗？况且，他还结过婚，有三个孩子！”

父亲当时显得稍微冷静一点。他了解庆龄宁折不弯的性格，想用温和一点的办法动摇她的想法。他说：“庆龄，这件事需要等待，需要再慎重考虑考虑。孙先生是一位革命者，你能跟随他经受将要遇到的艰难困苦吗？”

父母的软硬兼施，使宋庆龄感到一阵晕眩。父母接下来所说的话她一句也听不见了。醒来时，她躺在二楼卧室的床上。她不知道是谁把她抱上楼的，也不知什么时候泪水把绣花枕头浸湿



了一大片。

就这样，宋庆龄被父母软禁了近三个月之久。在这段受煎熬的日子里，她的心泉被灼热的爱情蒸发着，化作片片相思的云雾，飘过关山，飘过大海，飘到了孙中山的窗口。焦虑不安的孙中山再也不能静心等待下去了，他准备从日本归国，亲自探明虚实。但是，宋庆龄却不愿意孙中山因为这桩多难的婚事而分散精力，便写了一封信婉言劝阻，请她忠实的女仆偷偷带出家门，寄往日本。她在信中写道：

敬爱的孙先生……我多么希望早日回到日本，跟从前一般和你共事啊。虽然我知道，现在已有别人在帮助你——但请也为我留些事情，等我归来后做吧！你要到国内来的消息我很兴奋。但我认为你来这里也不会有用的，还是照现在这样等待吧……我目前正随时准备到你那儿去。“总理”，我听到有人现在已这样称呼你。我很喜欢这个称呼，

因为它显示了你对他们的重要性，和他们对你的尊敬。

在给正在美国威斯里安大学读书的小妹美龄的信中，庆龄更大胆透露了她准备“私奔”的计划，和她想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决心。她用清秀的英文字体一丝不苟地写道：

在前几封信上，你当已经知道，我希望早日离沪返日，而父母大人表示反对。母亲不要我回去，怕我再卷到与孙先生的事情中。而父亲的意思，是要我慎重地考虑，怕我不能经受将来跟孙先生会遭遇的种种困苦。我就这样在家里被禁好久。我一直希望劝说妈妈改变主意，但是，既然她的主意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我也只好及早下定决心了。

美龄，你知道当我还没回国的時候，父母居然为我订婚的事吗？你能相信他们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吗？蔼龄居然



也介入了这件事，她只管对我说那人是怎样漂亮，怎样有前途。父亲在这件事上倒没说什么，只是母亲坚决地要我嫁这人，而不让我跟随孙先生。他们几乎是使用了所有的办法——尽管是最温和的办法——想逐渐动摇我的想法。但是他们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了！他们不知道我认为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的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因此，美龄，当你接到此信时，你不必惊奇，很可能我已抵达日本，回到孙先生身边。我通过孙先生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做到这件事。我将采取迅速和秘密的行动，我想你或许会把这叫私奔吧！但是我只好如此了！由于家庭的反对，我到日本后与孙先生的婚礼，也将是非常简单和秘密的。这事情你代我转

告子文吧。美龄，在这情形下，事情是很难办的，但我的决心非常坚定！

当宋庆龄跟她的家庭进行着极其激烈、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时，孙中山也在日本为他跟宋庆龄的正式结合做着多方面的准备。



◎1915年孙中山为宋庆龄定制的日式晨衣。



一是物质上的准备。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只添置了一些毯子、坐垫和文具等物品。孙中山还特意托人购买了一块黑底配金黄色花朵图案的衣料，请裁缝为宋庆龄量身定做了一件金黄色镶边的日式晨衣。

二是舆论方面的准备。孙中山准备跟宋庆龄结合的消息传出后，这桩婚事遭到孙中山的亲朋和战友中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都认为很不妥当，于是对孙中山进行劝谏。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

一种说法是，在他们结婚之前，孙中山的朋友们曾经开会讨论，并派了一个“代表”去说服他。但这个“代表”见到孙中山之后，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孙中山问这个朋友有什么苦恼？这个朋友未发一言就借故告辞了。

胡汉民的回忆是：“经中华革命党的战友们商议，公推陈其美、许崇智两人去劝中山先生。”孙中山表示：“我一定要正式结婚，不能像你们似的嫖娼宿妓，不讲究个人的品行操守。”陈其美和许崇智张口结舌，只得退出。经

商量，他们又请一贯洁身自好的胡汉民、廖仲恺去劝孙中山。这次孙中山说：“我没有你们二位的好福气。你们都娶到了贤惠的夫人，能跟随着你们东奔西走。”

还有一个版本是跟孙中山十分亲密的胡汉民、朱执信曾当面“诤谏”，要求他取消这个打算。孙中山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介入我的家庭私事。”孙中山坦率地告诉这些人：“我不是神，我是人。”又说：“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孙中山义无反顾地表示：“我爱我国，我爱我妻。”由于孙中山的说服，反对的舆论减少了。

三是法律手续上的准备。在法律手续上，孙中山是结过婚的，在跟宋庆龄结婚之前，他必须跟原配夫人妥善办好离婚手续。他说：“要不这样办，人们就会把庆龄说成是我的妾，这种流言蜚语将对革命有害。”

对于这桩婚姻，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表示理解。卢慕贞是一个纯粹的旧式农家妇女，一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24



个传统的中国式贤妻良母。孙中山出生农家，童年时就奉父兄之命跟卢慕贞订了婚，并在1884年5月26日完婚。这时孙中山虚岁19，实际年龄只有17岁半。婚后，孙中山即入香港西医学院读书，仅每年寒暑假回家；1894年以后又奔走革命，流亡海外，回乡省亲的机会就更少了。卢慕贞先后生有三个子女，作为一个旧式农家妇女，她柔弱的双肩担负着养育孩子、侍奉翁姑的责任；作为一个“造反者”的家属，她不得不忍受颠沛流离的痛苦和艰辛，她尽力使革命的孙中山无后顾之忧。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经把卢慕贞接到南京，让她分享他多年奋斗的喜悦。卢慕贞看到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这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置身于孙中山的政治世界，她更多地还是感觉很不舒服。1913年，革命在短暂的胜利后，又出现了危机。袁世凯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卢慕贞觉得他们的家庭又恢复到过去那种东躲西藏、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般的生活。那一年，她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待了一段时间，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受伤。卢慕贞觉得这不是一

个好兆头。她只希望在国内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不愿意卷入革命。她不识字，不可能深刻理解孙中山的事业，更不可能对孙中山的事业提供更多的帮助。

1915年3月，孙中山派同乡好友朱卓文到澳门，向卢慕贞说明情况，说服卢慕贞与孙中山协议离婚。卢慕贞理解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感情，亦愧疚于不能帮助孙中山的事业。她一度希望孙中山按照当时中国的旧习俗，娶宋庆龄为妾。但这是孙中山和宋庆龄都不可能接受的。

同年9月2日，朱卓文将卢慕贞接到日本，商议离婚之事。卢慕贞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慨然允诺，用大拇指沾上红墨水，在离婚协议书上按了手印，从而结束了这段使她并不感到幸福的婚姻。孙中山将协议离婚书印了几百份，分发给他们的亲友。

9月23日，卢慕贞离开东京，返回澳门居住。孙中山亲自将卢慕贞送到东京车站。在以后的岁月中，孙中山仍然关切着卢慕贞，并负担她的生活费用。



做好了以上准备后，孙中山便于10月上旬委派同乡朱卓文和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到上海去接宋庆龄。

朱卓文原是旅美华侨，跟孙中山在旧金山相识。他枪法很准，手枪弹无虚发，专替人充当打手或杀手，是被称做“斧头仔”的黑社会组织中的成员。在孙中山的启发诱导下，朱卓文改邪归正，加入了同盟会，担任了孙中山的警卫员。大约从1909年开始，他经常守卫在孙中山身边。他的女儿慕菲雅也成了宋庆龄的朋友。

10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宋庆龄趁父母还在熟睡，便匆匆逃出家门。朱氏父女在外面接应她。当晚，他们一行三人就登上了开往神户的轮船。第二天早上，宋庆龄走上甲板，眺望荡无涯际的大海，成群的海鸥展翅追逐着船尾。这时，她顿时感到生活的天地如此开阔。是的，人生下来就不是为了抱住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她愿乘着爱的方舟，跟孙中山一道，在险风恶浪中继续前行。10月24日下午1时10分，孙中山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东京车站迎接风尘仆仆的宋庆龄。车厢上

蒙着远道的尘土，却遮不住宋庆龄脸上洋溢着
的幸福。当晚，她跟慕菲雅在日本友人头山满先生
家中借宿^①。

①宋庆龄写于1981年4月底5月初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说，她和慕菲雅是在青山原宿109号度过了她结婚前的最后一夜。头山满家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中山逃脱袁世凯魔掌东渡日本后住在头山满家，约有一年时间。



八 有情人终成眷属

她，珍妮，是个很甜很甜的姑娘，
这个很甜很甜的姑娘就是我的珍妮，
她像一朵百合花那样端庄、腼腆，
所以，她是最可爱最可爱的珍妮。
谁能把这朵百合花采到手，
谁就是幸运的宠儿。

这些诗行是宋庆龄16岁时创作的，献给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时的学友珍妮·多特里。事实上，这首诗也可视为宋庆龄的自我写照——她的确像百合花一样纯洁迷人，而将它采到手的幸运的宠儿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1915年10月25日上午，22岁的宋庆龄与49岁的孙中山愉快地乘车到东京牛込区袋町五番地（现为东京新宿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寓所。在这里，由和田瑞主持，孙中山与宋庆龄签署了一份婚姻誓约书。誓约书原件是用日文起草的，以便向日本当局登记。译文是：

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
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
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妻关系，共同
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
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
亦不得有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
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
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



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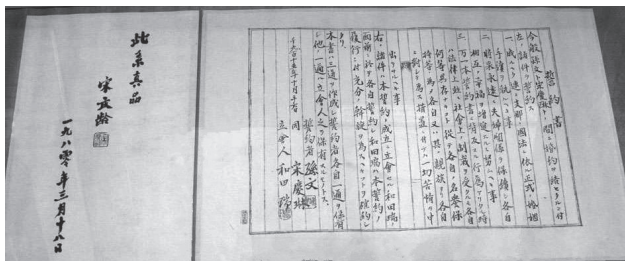
誓约人 孙文（章）

同上 宋庆琳

见证人 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私人手中征集到这份《誓约书》的原件，请宋庆龄亲自鉴定。她当时通过秘书作了口头答复，加以肯定。1980年3月18日，宋庆龄又亲笔签署：“此系真品”。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宋庆龄结婚誓约书。

誓约书原件纵11.25厘米，横17.25厘米；朱丝栏，全页24行，墨书日文22行；中缝有上鱼尾；栏外左下角印有篆体字“东京榛原制”，做腰圆戳记状。誓约人与见证人签字后，和田瑞律师将誓约书送到东京市政府办理了法律手续。

按照日本当时风俗，结婚选择双日吉利，所以和田瑞律师建议将25日写为“26日”。为了书写简便，宋庆龄将繁写的“龄”字写成了“琳”字。由于宋庆龄留学美国时未刻图章，所以结婚时无章可盖。只有孙中山在誓约书上盖了章。

办完法律手续，已经是午后，孙中山和宋庆龄来到了位于大久保百人町三百五十番地（即今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二十三番）的梅屋庄吉家用茶点。

梅屋庄吉是一位侠肝义胆的日本商人，1895年经英国医学博士康德黎介绍与孙中山结识，曾经为广州起义、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提供经费和武器，并为印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提供了经费。所以孙中山1913年再次流亡日本后，经常在他家安身。



◎1914年11月17日，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合影。

为了祝贺孙中山新婚，梅屋庄吉约请了一些友人举行了简单的庆祝仪式。仪式在梅屋庄吉寓所二楼客厅举行。在客厅正面二间的壁龛前面，摆放着金碧辉煌的八折金凤屏风。右边两边是中

国造的红木高低架，架上摆着青瓷大花瓶，花瓶里插着盛开的菊花。

参加仪式的客人有五六十人。其中大多数是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以及革命志士，包括犬养毅、萱野长知、宫崎滔天、头山满、古岛一雄、内田良平、小川平吉、寺尾亨、杉山茂丸等。

中国的革命党人为了表示反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多数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仅有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家和陈其美在场。廖梦醒和廖承志姐弟是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从此宋庆龄对待他们俩一直亲如子侄。

那天宋庆龄头戴一顶风致秀雅的宽檐女帽，身着一套花卉图样的西式套裙，俏丽动人。廖梦醒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在婚礼上，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文静。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们。”廖梦醒那时11岁，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仪式中充当了翻译。廖梦醒看到宋庆龄戴的珠串，很喜欢，就跟她要。新娘答应说，“等你长大了”就给。廖梦醒没想到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34



◎1916年，宋庆龄与孙中山补拍的结婚照。

15年后，宋庆龄果真实现了这个诺言。

仪式开始，由梅屋夫人向新郎、新娘敬香槟酒。犬养毅唱了《祝福歌》。然后由头山满做中介人，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宋庆龄与梅屋夫人分



◎1916年，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德子合影。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36 ■



别结成义兄弟和义姐妹。

宋庆龄后来回忆说：“我的丈夫就是在这个茶会上宣布我们结婚的。”孙中山还送给新娘宋庆龄一支毛瑟手枪作为结婚礼物。孙中山说：

“这枪配了二十粒子弹，十九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作为最重要的纪念品，宋庆龄终其一生都精心地收藏着这支手枪。



◎1915年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结婚礼物——德国毛瑟手枪。

晚7时仪式结束，孙中山和宋庆龄回到他们在东京青山原宿109号寓所，度过了新婚第一夜。

宋庆龄在离开上海去东京时给父母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告诉父母：自己决心已定，要帮助孙中山并同他结婚。她还告诉父母，孙中山已经和他的妻子离婚。

宋庆龄的出走震动了上海的上流社会。正如她自己所说：“因为像我这种家庭的女孩子是从来不解除婚约的。并且私奔到日本，和孙博士结合。”^①而当宋美龄见到宋子文，准备告诉他宋庆龄准备“私奔”的消息时，子文却递给美龄一份报纸。要闻栏中登载着一则消息：

上海名门宋氏的第二女公子宋庆龄女士，已于10月24日从上海家中私奔抵达日本东京。据讯，她来这里，是为了与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结婚。

^①李寿葆、施如璋：《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5页。



宋庆龄出走后，得知这一消息的传教士们去找宋嘉树夫妇，强烈反对宋庆龄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劝说他们把女儿从日本追回来。宋嘉树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无法抵抗来自教会的压力。加之他们本来就反对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所以当发现女儿逃跑后，宋嘉树夫妇于10月26日怒气冲冲地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客轮赶赴日本，希望阻止这桩婚姻。可是已经晚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已经举行完毕。

这桩婚事使宋嘉树夫妇深受伤害。作为母亲，宋夫人觉得自己女儿嫁一个年龄两倍于她，同时又是结过婚的男人，简直是疯了，坚决反对。作为父亲，宋嘉树出于对孙中山及其事业的高度尊敬，对这桩婚事十分犹豫和矛盾。他一方面承认在中国人中间没有人比孙中山更高尚、更亲切、更有爱国心了，另一方面又觉得女儿嫁给了自己的朋友，有伤荣誉和面子。为宋庆龄操办婚事的梅屋庄吉之女——国方千势子，回忆当年宋嘉树赶到东京企图阻挠这门婚事的情景时写道：

“夺走我女儿的总理（按：孙中山当时是中华革命党的总理），给我出来。”当我父亲梅屋庄吉听到喊声时，宋嘉树先生正愤怒地站在我家的正门口。我父母非常担心，正准备到门口去看一看的时候，孙先生对我父母说了声：“没什么，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就向大门口走去。我父亲出于担心，也跟随孙先生到了门口。孙先生缓缓地步向大门口，并用非常平静的口气对宋嘉树先生说了句：“找我有什么事吗？”刚刚看上去还满腔怒火的宋先生却突然一头跪了下去。“我那个愚钝的女儿，就拜托您了，麻烦您好好照顾她。”并在原地向孙先生磕了几个头，然后就这样头也不回地回去了。

在战友之情和亲情之间的徘徊，使父亲宋嘉树的痛苦远远大于宋庆龄的母亲。几个月后，宋嘉树向自己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说：“我一生



中从未受过这样的打击，来自我自己的女儿和最好的朋友。”

不过，宋嘉树夫妇毕竟是受到过西方民主精神的熏陶，有见识、明事理的人。况且，宋庆龄终究是他们最钟爱的女儿，他们终究拗不过倔强的女儿。孙中山也毕竟是与宋嘉树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领袖。尘埃落定，宋嘉树夫妇从盛怒中逐渐平静下来，也只好承认事实，向亲友们宣布，庆龄已经“正式同孙博士结合了”。作为承认宋庆龄和孙中山二人婚事的象征，宋嘉树夫妇补送给庆龄一份嫁妆：一堂从老家订做的柚木家具，瓷器，还有一条金丝绣花被和《百子图》缎绣被面。其中最具深意的是母亲倪珪贞自己结婚时曾经穿过的锦缎裙袍。宋庆龄十分珍视这份嫁妆，视为珍贵的纪念物，一直珍藏在身边，保存十分完好。

正如埃米莉·哈恩所说：“宋氏一家尽管对此非常恼火，但他们并未张扬出去。姐妹之间曾经一度互不理解，宋夫人也未停止横加指责，然而局外人士对此却一无所知。宋查理并没有因为

女儿的行动而动摇了自己的信仰，他仍然一如既往地 为孙中山、为祖国的未来尽心尽力。”^① 罗比·尤恩森也说：“宋嘉树当了自己的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感到难为情，但他还是孙中山的朋友，继续在政治上与他共事。”^②

虽然出于对子女无限的爱，但父母的做法给宋庆龄的内心留下了很深的伤痕。1980年，宋庆龄在去世前八个月的时候致信爱泼斯坦，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母亲哭着，身患肝病的父亲劝说……他甚至跑去请日本政府为他们做主，说我还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 不过宋庆龄仍然十分爱自己的父亲，因为婚事而不得不违抗父

① [美]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香港1941年英文版，第109页。

② 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42



亲，使她一直感到内疚和痛苦。她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其实，孙中山也很希望一直战斗在自己身边的革命密友宋嘉树能够理解自己与宋庆龄的感情。1915年7月，孙中山曾经致信宋嘉树，非常委婉地暗示宋庆龄可能与一位“大叛逆者”结婚。只是毫不知情的宋嘉树认为孙中山说的是“一件十分新奇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于是在1915年8月3日给孙中山的回信中，他除了表达了自己对革命事业和孙中山的忠诚外，还认为这个“大叛逆者”是他和孙中山共同的敌人。他说：“我亲爱的博士……我们是如此高度地尊敬您，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伤害您和您的事业。‘大叛逆者’是我们大家永远的敌人。罗莎像您一样极为憎恨这种人，所以，不会有和这种坏人结婚的可能的危险。加上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做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总统。我们不可能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任何事

情。……我的亲爱的博士，请您记住，不管情况如何糟糕，我们都是您真正的朋友。……我们宁可看到庆龄死去并且埋葬，而不愿意看到她为们的大叛逆者做妾，即使是（做这种人的）妻子（也不能允许）。”

与宋家对宋庆龄的婚姻持反对意见的事实相反，在国内许多拥护孙中山、反抗封建礼教的年轻人为自己的领袖娶了一位非凡的姑娘而热烈欢呼。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利于推进革命的好事，是对旧礼教的挑战和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这种符合西方人观念的做法，在四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一种时髦。许多有文化的男女青年都因为不满家庭的包办婚姻而重结良缘。故而王安娜后来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评论说：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使年轻一代“深为感动”，“庆龄成了新的自由和理想的化身，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

这件事的全部经历对宋庆龄产生两个影响：一是报纸上有关她的不实报道出现，一些恶意的谣言更是被添油加醋地到处传播，让宋庆龄深刻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44



体会到人身攻击是怎样被用于政治目的。在宋庆龄漫长的人生岁月中，对于这位坚强的，在个人品质上几乎无懈可击的人民领袖，谣言成了她的敌人唯一可以立见成效的武器，对宋庆龄造成了很多困扰。对于这些谣言，她总要用真理去戳破它，并常带着些辛辣的讽刺。她在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听到一些编造出来的关于我在梅肯的报道，真让我都蒙了。譬如我听说，有人说我在结婚前曾经做过革命党的密探。”二是她对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狭隘心理感到厌恶。她回忆道，那些传教士都是“倒退和保守的，他们因为我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而大怒，跑去找我的父母，想劝他们去把我从日本追回来。而中国的反动分子，我们的政敌们，则同那些传教士站在一边，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时就结了婚”^①。从此，孙中山和宋庆龄，一个皈依的基督徒和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都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个教会会员的身份。他们虽然都还有基督教教育所给予他们

^①宋庆龄1980年9月17日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信。

的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还有许多对革命持同情态度的基督教朋友，但他们都跟神学分手了。宋庆龄说，孙中山步入壮年以后，“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我曾告诉他，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了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①

孙中山与宋庆龄婚恋过程所经历的波折，是对他们爱情的考验，也是对他们情感的净化。宋庆龄一直很珍视和孙中山结婚的日子。1979年8月1日，宋庆龄在会见日文版《宋庆龄选集》译者仁木富美子女士时，还幸福地回忆起64年前的往事，并深情地说：“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①宋庆龄1966年4月致伊斯雷尔·埃波斯坦的信。



九 “当学徒的日子”

尽管宋庆龄和孙中山在婚前承受了许多压力和抱怨，但他们婚后的生活却是幸福的。爱情像一道绚丽的生命之光，驱散了孙中山、宋庆龄昔日心灵上的阴霾。宋庆龄在写给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位校友安德逊（A. Anderson）的信中说：

这次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讨厌那些繁文缛节。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比是迈进了一所学校，只是再没有“考试”来麻烦我了。

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在给他的恩师杰姆斯·康德黎（Cantlie）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的婚姻时，也充满着幸福的声音。

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及夫人，宋庆龄除了继续负责孙中山的英文函电往来外，在孙中山的指导下，还学习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比如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使用隐形墨水书写等。她还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孙中山还教她对钻研革命队伍的间谍、个人野心家和追求刺激的人时刻保持警惕。宋庆龄也养成了把各种不同的联系对象和工作领



域相互严格分开的习惯。

唯一让宋庆龄感到不适的是，她喜欢安静的工作，不喜欢繁文缛节、热闹场面和抛头露面。但做了孙中山的夫人后，她不得不经常在公众场合或报纸上出现，每天要见好多人。起初，由于这些场合会让她感到有些紧张，她必须经常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害羞心理，后来就渐渐适应了。她在给另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你知道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我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中国人同欧洲人不同。他们总是让那些胆小腼腆的人去承受称颂和荣誉，而不是那些值得称颂和接受荣誉的人。我每天要见许多人：实际上我是完全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的。

他们在日本新安置的家里接待朋友，他们多数是孙中山在以往的共同斗争中结识的。有中国

革命者廖仲恺夫妇和朱执信，他们都始终不渝地同孙中山一起前进；还有另外一些人，后来从进步走向反动，如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还一些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吴玉章和林伯渠等，他们原来是孙中山的党员，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和老战士；还有一些变色龙似的人物，像陈公博、周佛海等，他们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又回到国民党，最后叛国投敌，充当汉奸，身败名裂。日本朋友中有英勇的宫崎滔天、梅屋夫妇，也有些人后来走上拥护武装侵略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他们还常常会晤来自印度、朝鲜、越南、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流亡者。他们和这些人一起讨论世界形势和各自国家正在进行的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

宋庆龄晚年，还对她的秘书介绍过她新婚后的生活情景。她说：

我的丈夫有许多书，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晚，他最喜爱的



事是铺开巨幅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等。而我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有著名科学家如汉道斯·埃利斯和著名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等的书。那是我当学徒的日子。

宋庆龄的家庭，是当时中国为数很少的富有且有西方教养的家庭。她以前所了解的只是城市富裕人家和校园的生活以及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她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的理解是抽象的。而孙中山“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经常向宋庆龄讲述自己过去的生活动。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孙中山“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

的生活方向。人民的种种痛苦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使他决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就这样，在他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孙中山好几次告诉宋庆龄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成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①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宋庆龄很快成了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孙中山的讲述，使宋庆龄真切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使她对“压迫导致革命”的认识变得具体和深化，为她逐步正确理解旧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她在孙中山逝世后正确判断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奠定了基础。宋庆龄终生都把孙中山看成自己的导师，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弟子”。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

^①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页。



爱国者。他们决心献身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希望自己的祖国尽快繁荣富强，独立自主；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赶上最发达的国家，进而超过他们。他们也知道，要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以恢复和完成中国已经被严重破坏的独立自主，消除封建主义。孙中山一个年将五旬的老将，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带着“不息的热诚”，百折不挠；宋庆龄一个羽毛未丰的新兵，却在渴望着投入战斗。他们将在以后的岁月中并肩作战，前仆后继，为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进行不懈的斗争。

后来，当有人问宋庆龄为什么要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因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有这种精神的人。她认识到孙中山是中国的一位政治改革家，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在与孙中山共同的工作中，通过直接接触，她更真切地感

受到孙中山是一位从来都无所畏惧的人，各方面学识都很渊博，为谋求中国的独立耗费了全部青春，因此她终于勇敢地克服了惧怕与疑虑，跟孙中山结婚了。“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她慢条斯理地对斯诺说。“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

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我认识孙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①

宋庆龄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是一种高于通常意义的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历久弥香。2003年，在北

^①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一卷《复始之族》，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京宋庆龄故居举办的“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精品展”上，一封宋庆龄写给孙中山二女儿孙婉的亲笔信让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的温情与爱意扑面而来。这封信共有两页。第一页为英文信件，字迹清晰，书写流畅、有力。译文为：

亲爱的格雷斯^①：

承你告知将有香港之行。如果你能给我买一个兰克劳馥德公司的chafing盘子（铝制品）、给你父亲买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我将十分感谢。我不确切知道你父亲的手套尺码，大概是7号。这里是个图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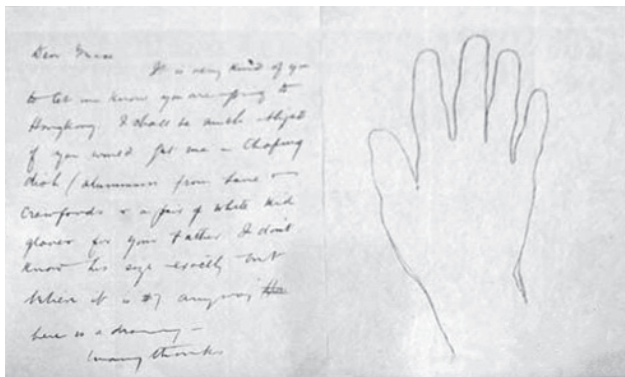
多谢你。

R C Sun^②

第二页是一张用铅笔绘成的图样，画的是

①格雷斯是孙婉的英文名字。

②R是宋庆龄英文名字Rosamonde的缩写，C是Ching Ling的缩写。Sun即孙，宋庆龄的夫姓。



◎宋庆龄为孙中山绘制的手型图样。

孙中山的右手轮廓。时隔80年，在变成深黄色的信纸上，还可以感受到孙中山将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这张纸上，让宋庆龄仔细为他勾画手样的细节。

宋庆龄在以后漫长的孀居岁月中，时时怀念着跟她十年携手的孙中山。她细心地保存着孙中山所有个人遗物和纪念品。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宋庆龄无论出差，或是出国，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只圆形的银质小镜架。这是一个小碗口大小的银质镜框，厚实的玻璃下，镶嵌着孙中山一张两寸小照。照片虽已发黄，但宋庆龄仍十分珍爱。每到一地方，她都要把镜框擦拭得干干净净，端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56



端正正地放在床头柜或一眼即能望见的柜橱上，无声地表达对孙中山无尽的思念。每逢孙中山的诞辰和忌日，宋庆龄都要在孙中山遗像前的花瓶里插上洁白的花朵，拉上窗帘，穿上黑衣，坐在孙中山坐过的靠背椅上沉思默哀。她说，“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在孙中山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宋庆龄就是这样在精神上跟孙中山生活在一起的。

1976年，宋庆龄将结婚时孙中山送她的那件黑底配金黄色花朵图案、镶金黄色衣边的日式晨衣，送给了隋永清。结婚至今，整整60年过去了，宋庆龄的身材渐渐发福，已经不能再穿这件衣服了。隋永清非常喜欢这件衣服，立刻穿上给宋庆龄看。19岁的隋永清，风华正茂，身材很好，衣服穿在她身上十分合适。宋庆龄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回到了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中。

赠出这件晨衣后，宋庆龄对往事的怀想却与日俱增。1980年，宋庆龄逝世前一年，得知廖梦醒即将出访日本的消息后，宋庆龄在同年3月19日

致信廖梦醒，想让廖梦醒为她购买一件和服。她在信中写道：

送上一百五十元给你自己买些东西和给我买一件黑绉纱的和服。现在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穿着睡衣。希望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能穿上一件深紫色或黑色的绉纱和服。衬里可以是红色或其他颜色，但面料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外面有白花没有关系。和服得有一条腰带，这是要另外买的。以前孙博士的和服就有一根腰带用来绑他黑灰色的和服，可是它和所有我珍藏的东西一样都失去了……

别忘了，我那件和服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我不喜欢别的颜色！）。它一定要长及足踝，太长的话可以改短，但是不要那种短的。

宋庆龄特意在“绉纱和服”、“深紫色”、“黑色”、“长”、“不要那种短的”等字下画



了横杠，表示强调。当天下午，宋庆龄又给廖梦醒写信补充说：“请要求妇联让你把那150元换成外币为我买和服。我以前从来没有要求过外汇。你无需害怕提出要求，因为这是为我，而不是为别人做的。”在“为我”二字下边，宋庆龄又画了横杠表示强调。宋庆龄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奉献了一生，从来没有向国家提出过任何或大或小的个人要求。如今为了买一件和服，却想到找妇联来帮助兑换外币，无疑是为了圆一个长久以来萦绕在她心头的梦，为了睹物思人，慢慢体味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后那段相对安逸的短暂时光，并以示纪念。

宋庆龄性格内向，但很多时候还是在无意中流露出她对孙中山的深深爱恋。特别是在给亲友的书信中，表达了对孙中山无穷的思念，直到晚年。1974年11月15日，宋庆龄致函廖梦醒，感谢她在孙中山诞辰日送来鲜花。信中写道：

我知道每当那个周年纪念日，你的
思绪总是与我互通的，而这正是我莫大

的欣慰。时间永远不会淡化我的记忆。

1975年3月12号，孙中山逝世50周年，廖梦醒又给宋庆龄送去鲜花，以示纪念。宋庆龄回函答谢：

谢谢你送来如此艳丽的康乃馨，有粉红和朱红的，它们温暖了我的心！我想，你是这样的一个朋友。你懂得，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还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但正像你所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



十 不同凡俗的“蜜月旅行”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由日本启程回国，继续进行反袁斗争，于5月1日抵达上海。宋庆龄随后于5月19日搭法国邮船公司的班轮回到鹰犬密布的上海。这次旅行她不能再像结婚前那样公



◎1916年4月，孙中山、宋庆龄等在日本友人田中昴寓所举行“帝政取消一笑会”。

开，因为她现在已是孙中山的夫人，成为引人注意的目标。而孙中山则不顾危险，亲自到码头迎接宋庆龄。宋庆龄在上海法租界洋泾浜（今延安西路）55号下榻后，即开始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文书工作。

在宋庆龄协助下，孙中山继1915年12月发表《讨袁宣言》，呼吁“爱国豪杰”讨伐“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的袁世凯之后，又于1916年5月9日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再次揭露袁世凯“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号召全国人民粉碎帝制复辟，重建民国^①。

当时，袁世凯虽然已气息奄奄，但还妄想保住权力，在做垂死挣扎。在宋庆龄到达上海的前一天，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了。辛亥革命时，是陈其美帅义军占领了上海，然后又攻占了南京，使孙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新的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他的遇刺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从海外回国反袁护法的革命者不得不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03页。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62



采取更严密的掩护措施，比如使用暗语、更换地址等，以保护自己。险恶的形势从宋庆龄给梅屋庄吉夫人的信中可见一斑。5月20日，宋庆龄写了一封英文信给东京的梅屋夫人，说她已于19日安全抵达上海。在信封背后，她写的发信人姓名就是暗语“Woicy”。Woicy或Waicy是孙中山当时在上海通知别人给他发电报时用的假名。发信人的地址起初写的是“350 Hsien……”，然后又用笔划掉，改写成了“55 Yang King Pang, Shanghai”（上海洋泾浜55号）。其实，“洋泾浜”这个地址也是一个秘密地址。在《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中，孙中山曾经告诉收信的人，在寄信来的时候要用两个信封。外面的一个信封上写这个“洋泾浜”地址，里面再套一个信封，写明是给他的。信封上贴的是日本邮票，说明这封信不是从中国寄出的，而是托人带到日本后发的。在信尾，宋庆龄亲笔签名“R. Nakayama”。R是她的英文名字“洛士文”的第一个大写字母；Nakayama是“中山”的日文发音。英文署名是为了瞒过中国的检查人员，但收

信的人一看就可以知道是谁的来信。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很快将离开上海，但仍请把给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纯三郎转交。信上不要写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的名字，因为陈先生就是在山田的寓所被袁的特务暗杀的”。山田纯三郎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者。当时是日本三井物产公司上海分店的职员、南满铁道社社员，并任中华革命党上海机关报《民国日报》社长。

宋庆龄非常明白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但她充满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所以她白天不得不隐蔽起来，等到晚上则穿上西式服装溜出去办事。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到达之前，他（指孙中山）的住处同陈先生的寓所相近。他一向是无所畏惧的，即使有许多特务跟踪他时也是如此；所以除非我同他在一起，我总是不放心。但有许多事情他必须亲自照看，因为他是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唯一能挽救我们的中国免于毁灭的人。因此我也必须为国家的利益和解放事业担当风险。”5月27日，庆龄在给梅屋夫人的第二



封密信中表达了同样的信心。她写道，“陈其美的遇刺是骇人听闻的，但他只是在袁世凯手中被害的许多无辜的爱国者之一。”“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内心十分忧伤，但真理必将永存，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再次恢复和平和繁荣并为人类造福。”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毙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袁世凯临死前的恐怖统治总算终结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孙中山误认为，“袁氏一死，大局立变”，立即下令各省讨袁军休兵罢战。他自己也顿时有一种轻松之感。

可能是前一段时间工作和生活过于紧张所致，7月末的时候宋庆龄病倒了。严重的肠胃炎，发着高烧。孙中山很着急，立即找山田纯三郎去请一位好医生来诊治。8月中旬，宋庆龄终于病愈，可以外出旅行了。

8月16日至25日，孙中山携宋庆龄到杭州作一次短暂的旅游。胡汉民、冯自由、朱卓文、戴季陶等随行。当然，孙中山此行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流连于湖光山色，还为了凭吊辛亥革命

先烈遗迹，广泛宣传他的革命主张。

孙中山一行在杭州下车后，忽然有三个警士尾随。孙中山问他们要干什么，警士回答：“我们是来保护贵人的。”孙中山笑道：“蠢仔！有什么‘贵人’？”他亲切地对警士说：“警察职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何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

随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清泰第二旅馆（今仁和路群英旅馆）26号房间下榻，稍事休息后，孙中山一行游览了西湖。17日上午再次游西湖。



◎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杭州。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66



孙中山与宋庆龄荡舟湖中，后在“三潭印月”小憩。孙中山见湖中荷叶无穷碧，莲花别样红，不禁发出了“西湖真美”的赞叹。他俯下身采摘了一枝荷花送给宋庆龄，语意隽永地说：“愿中华民国当如此花！愿你当如此花！”宋庆龄去世之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经拍摄了一部介绍她生平的纪录片《国之瑰宝》，序幕中就出现了高标挺秀、清香四溢的荷花，以象征宋庆龄美好而坚贞的品格。

过湖登岸，游览孤山公园，后达到秋瑾墓。孙中山与宋庆龄绕墓徘徊，思绪万千。宋庆龄说：“女革命志士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秋瑾就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她以自己的修养、见识、才干和牺牲精神，在中华民国的开国史上留下了记录。”孙中山呼喊道：“是的，光复以前，浙江人在东京首先加入同盟会的，就有秋瑾女士。如今秋女士虽不能再生，但她留下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传诵人间，令人不忘。”中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风雨亭进餐，品尝了鲜美的西湖醋鱼、莼菜。饭罢又

泛舟湖上，尽兴而返。

18日晨，孙中山与宋庆龄等步出钱塘门，至葛岭，登初阳台，凭高远眺，只见石壁凌岩，奇峰突兀，山下景物尽收眼底，心胸顿感开阔。下午1点钟，浙江督军吕公望宴请孙中山一行，作陪的皆两浙名士。孙中山即席讲演。他感慨万端地说：

中华民国成立，于今五年，若云建设，应大有可为，乃因人民知识未尽开通，遂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非但不能建设，并且立国之基础亦遭动摇，殊堪痛惜。今者共和再造，建设之事不能再缓。^①

演讲毕，孙中山、宋庆龄来到镇海塔下的观潮亭，观看了举世闻名的钱江秋涛。下午3时许，只见钱塘江潮万马奔腾，电闪雷鸣。最初是远处

^①来自孙中山《在杭州督军署宴会上的演说》（1916年8月17日），据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8月19日《孙中山先生游杭记》。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68



呈现一条白线，从塔前四五公里开阔的江面咆哮而来，近到眼前，则如银涛雪浪，高达七八米，直扑江堤。转瞬间，潮水奔腾而过，江上顿归静寂。孙中山说：“伍子胥忠魂未泯，驱水作涛，是为钱塘潮。可见人的精神不死。即或躯体不存，而其爱国精神，犹能如潮水弥漫天地。”他还触景生情，为海宁县立乙种高科职业学校题写了“猛进如潮”的横额；又应请写下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题词。观完潮，孙中山一行又逛虎跑，游高庄，在雷峰夕照中步入清波门归寓。

19日上午，孙中山与宋庆龄一行步出清波门，至净慈寺，观赏书画，摩挲碑碣；又谒张苍水墓。孙中山感叹道：“苍水抗清图恢复，大业未成，从容就义于杭州，乃吾人之先觉者。云山苍苍，江水茫茫，民族精英，永志莫忘。”后又游石屋、乾坤、青龙、烟霞等山洞，观摩造象，欣赏幽境。下午4时，孙中山冒雨赴浙江省议会讲演，强调应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解决民生问题。晚7时，又在陆军同袍社演说，主张增加对官吏

的弹劾权和考试权，对文官进行考核，对贪官进行弹劾，以弥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不足。他指出，中国人最喜欢做官，以官为利藪，不论其所学如何，群趋于官之一途，所学非所用，这好比让厨师做衣服，哪能尽善尽美。如果工商业发达之后，则求富不必为官，好官亦不能致富。

20日晨，孙中山、宋庆龄及随行人员乘车出凤山门至南星桥渡江赴绍兴。据清泰第二旅馆的主人回忆，孙中山与宋庆龄行李简单，生活简朴，不带侍卫和仆人。他们待人和善，就跟普通旅客一样。1915年，袁世凯曾派一官吏到杭州为浙江都督朱瑞授勋，抵达杭州时，满街军警放哨，不准行人通行。这跟曾做过大总统的孙中山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天，孙中山一行抵达绍兴，后来又视察了宁波和象山、舟山的军港，还顺道游览了普陀山，于8月底返回上海。

孙中山跟宋庆龄结婚十个月以来，由于事务繁忙，很少有时间休憩。这次难得的旅行，实际上是这两位政治家的一次不同凡俗的“蜜月旅行”。



十一 前仆后继，两次“护法”

袁世凯去世后的形势，并不像孙中山估计的那么乐观。另一个北洋军阀、亲日派段祺瑞继承了袁世凯的卖国衣钵。他在美日两国的怂恿下，于1917年对德宣战，并以“参战”名义大量向日本借款，以强化其军阀统治。宋庆龄对这些一心想把中国推向战争深渊的野心家进行了严词谴责。她在同年4月2日致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夫人信中说：“至于我国的政治境况，你会意识到，有很多自私的野心家正竭力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这样做，对我们来说即使无所失，也将一无所得。令人遗憾的是，为了微小的一点钱，不少人竟甘愿牺牲他们国家的命运。我的丈夫为中国的独立，几乎贡献了他的全部青春，他敏锐地感

到有些官吏的卑劣行径，他们视金钱和个人的地位胜过于真理、忠诚和自尊。”

1917年7月1日，驻扎在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当时担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和担任内阁总理的段祺瑞之间的矛盾，把仍然居住在故宫中的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溥仪捧出来，演出了一出为期12天的复辟丑剧。张勋复辟被推翻以后，段祺瑞企图以武力统一南方，使南方实力派军阀陆荣廷、唐继尧受到威胁。于是，控制了两广的陆荣廷与控制了云贵的唐继尧联合起来，谴责北洋军阀解散民国国会，破坏带有革命性、民主性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否认段祺瑞政府的合法性。由于南方军阀要借用孙中山的威望，海军总司令程璧光这时也向北京政府宣告独立，表示追随孙中山，因此孙中山亲率“肇和”“永丰”（后更名为“中山”舰）两艘军舰南下，于7月17日抵达广州，号召护法，建立了第一个护法政府。宋庆龄因为等待由美归国的宋美龄和宋子文，稍后才到广州。

据当时的报道，追随孙中山的有朱执信、陈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72



◎宋家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摄于1917年暑期。前排：宋子安，二排左起：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三排左起宋嘉树、倪珪贞，后排左起：宋子良、宋美龄。

炯明、章太炎、唐绍仪、伍廷芳等。由于当时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孙中山于8月5日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9月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10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宣布军政府的职责是“攘除奸凶，恢复约法”。广东、广西、

贵州、四川等省和湖南、江西、福建的南部纷纷响应。广东新政府与北洋军阀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孙中山指出，南北政权之争“非帝制与民权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孙中山就职的大元帅府在广州河南原土敏土厂旧址（现为广州东沙街18号广东农业机械供应公司），门楼坐北朝南。门额上有“财政府管辖广东土敏土厂”几个大字，至今依稀可辨。入门一前一后两座三层楼房。前面一座为办公楼，后面一座是生活区，有两个侦缉班守夜。据孙中山当年的杂差欧培烘和梁照林回忆，后楼三层左侧是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卧室兼工作室。墙上挂着中国大地图。室内有孙中山的大办公桌，还有一张云石写字台，是宋庆龄协助孙中山工作时使用的。宋庆龄每天埋头于写字台，写作、写信，并且打字，经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入门左斜角放一张藤椅。孙中山吃完饭常坐在藤椅上休息，宋庆龄坐在旁边读英文报纸给他听。由于局势复杂而混乱，孙中山有时心情不佳，宋庆龄总是体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74



贴、迁就他。欧增烘还说：“宋庆龄对勤务员很和气，从不苛求。她平时早餐也很简单，有时只吃点腐乳、白粥。她和孙中山先生的俭朴生活，我们做勤务员的都很感动。”

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实际上是有政府而无军队。广东的陆军，主要是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桂军和滇系军阀唐继尧的滇军。这些军阀多是一些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心目中并无所谓“约法”与“国会”，根本不听从孙中山调遣。国会中的议员，人品混杂，大部分是中间派，真正忠于孙中山的并不多。1917年12月，陆荣廷宣布正式取消护法，通电南北议和。1918年1月，桂系莫荣新擅捕大元帅府卫队官兵数十人，诬为土匪枪决，变相对孙中山施加压力。5月，莫荣新又囚捕陆军总长张开端，非常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案。至此，孙中山不得不于5月4日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孙中山领导的1917年至1918年的护法运动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民主与专制命运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的大患莫大于军阀争雄，而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1918年5月3日，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因癌症在上海病逝。临终前，宋庆龄跟她的兄弟姐妹全都随侍在侧。为了表彰宋嘉树对卫理教派的贡献，美国于1942年11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威尔明登市为他建立了纪念堂。

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自潮州东渡日本，作短时间逗留，于6月25日抵达上海，与宋庆龄重聚。最初，他跟宋庆龄每月花65元房钱，租赁了法租界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的一幢房子，与廖仲恺、朱执信等同住。从此时



◎孙中山与宋家人的“全家福”。相片中有倪珪贞（后左三），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后左一、二）及宋家其他亲友。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76



起，孙中山跟列宁之间开始了函电来往，起草函电的工作多由宋庆龄及廖仲恺、朱执信等帮忙。

1918年8月，孙中山和宋庆龄迁住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后来这里一直成为他们的寓所，直到他们两人先后去世。当时旅居加拿大的华侨看到孙中山终日为革命操劳，但在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于是由孙中山的加拿大籍华裔副官黄惠龙募集资金买下了这所房子，配置了室内的家居陈设，安排了庭院的花木，还在花园里布置了网球场，作为孙中山在加拿大的追随者的礼物送给他。他们这所住宅是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一生中唯一一座为他们自己所有的住宅。它现在是孙中山上海故居纪念馆，原来的家具和书籍都照原样保存着。那时革命工作急需经费，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将房契抵押银行。本息累计，无力偿还，后来国民党海外支部发动侨胞募资才把它赎回。

莫利哀路孙中山故居是一幢淡灰色的两层楼房，安适而华贵。楼前是一片正方形的苍翠草坪，三面环绕着一株株长绿的松柏、香樟和玉

兰。竹篱笆上开放着绚丽多姿的鲜花。台阶上也摆满了花。人们一走进庭院，就感到芬香扑鼻，生意盎然。楼下有客厅和舒适的餐厅，楼上有办公室、卧室和一间小客房。家具大半是西式的，也许是为了调和中西格调，男女主人却常穿中式服装，即使在酷热的夏天也穿得朴素而整洁。书房四周，楼梯角下和过道旁边都放满了书橱和书籍，说明主人好学不倦，知识广博。卧室有一个可以收缩的工作台，宋庆龄曾将打字机放在台面上，替孙中山打出一封封信函，一叠叠书稿。卧室外面是一个奇巧的阳台。墙上挂着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婚照片。这张照片，给孙中山以鼓舞和力量，使他在革命受挫的痛苦处境中，回忆起昔日那甜蜜温馨的岁月。他们的家还是工作和会晤的繁忙场所。30多年之后，宋庆龄在《〈上海中山故居〉纪念册序言》中回忆了故居当年的情景：从这个故居的会客室可以想见孙逸仙时代的政治。客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普通老百姓，有外国大使和政治家，也有少数流氓恶棍。他们到这里来讨论问题，制定计划，或



者进行威胁，各以自己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前途。也正是在这间会客室里，孙逸仙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问题采取了新的、唯一正确的看法。

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的家庭生活温暖而有规律。清晨，宋庆龄总是陪孙中山打打网球。早在威斯里安读书的时候，宋庆龄就是网球运动爱好者。孙中山也有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但打球时常常不遵守规则，随意把球打出去，宋庆龄就会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

早餐后，就开始办公，往往至深夜还



◎1920年10月，宋庆龄和孙中山在上海合影。

在阅书、读报或工作。孙中山读到一本好书，总是热心地推荐给宋庆龄。比如1913年7月，孙中山读了《神学与科学之争》，认为不错，立即让宋庆龄阅读，并嘱她读完再传给他人。同月，孙中山又读到一本《大脑智力进化的原因》，觉得其思想极新，驾乎近时学者之上，也立即让宋庆龄阅读。

书籍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生活和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他们相互之间表达爱意的重要方式。宋庆龄为孙中山读书；孙中山介绍或赠给宋庆龄书籍。若干年后，宋庆龄还记得，1913年他俩刚认识不久，孙中山知道宋庆龄正在学习中文，非常关心她的学习和活动，经常鼓励她，还赠给她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以至于宋庆龄说，“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①。如今，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留下来的书籍中有一本1913年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汉文大系》；还有一本1920年4月12日孙中山赠给宋庆龄

^①《宋庆龄自述》，1921年4月28日。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80 ■



的英文原版的《中国的发展》，在扉页上还用英文写着：“给我的妻子Rosamonde”。

在宋庆龄的协助下，孙中山以“痛心疾首”的心情，把“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对革命成功后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论述和规划。《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和《建国方略》这些重要著作就是在这时期完成



◎1920年，宋庆龄在上海留影。

的。在此期间，宋庆龄协助孙中山查阅资料，誊写文稿。《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一部分是用英文起草的。孙中山写出一章，即由宋庆龄用英文打字机打出。

工作虽然繁忙，但饮食却简单而有节制。在协助孙中山潜心进行总结和探索的同时，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照顾体贴而周到。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没有规律的生活损害了孙中山的健康，孙中山的肠胃不很好，宋庆龄为他精选一些易于消化的食物。全家每天菜金不超过两元。据说，有一次，唐绍仪来访，畅谈甚欢，至午饭时刻，孙中山留他吃饭，特意叫人买了一只卤水鸭待客。吃完鸭子，唐绍仪还在等待上菜。宋庆龄尴尬地笑了。她一边向客人道歉，一边叫仆人从厨房里拿出仅有的一点咸鱼来。这事让唐绍仪十分感慨。他说：“我大吃大喝惯了，家里每餐至少要花十来块菜钱，你们的生活真是太清苦了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天，段祺瑞政府派军警驱散群众，并逮捕了31名学生、一位市民。这32人同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82



里，室内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一个大尿桶，臭气四溢；吃的是白开水就窝窝头，只有中午放风的时候才能稍微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他们的斗志十分高昂，有人写诗明志：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正在上海闭门著书的孙中山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立即对学生、工人、市民的爱国行动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他指示邵力子到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又让宋庆龄起草了一封《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要求段祺瑞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孙中山的努力和其他各界人士的支持，特别是广大群众的团结斗争，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了全体被捕者。7月中旬，宋庆龄又代表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军政府电，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学界代表，并严词谴责了桂系军阀支配下的广东

政府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行径：“盖民气以愈激而愈烈，若专恃武力，横事摧残，不惟粤人之所共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①

8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会见了许德珩等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据许德珩回忆：“那是1918年的暑假，……我们去莫利爱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们谈话时，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1919年8月，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再一次拜会了中山先生。这次访问，我们与中山先生就国家大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宋庆龄同志仍然坐在那里打字……她并没有以中山先生夫人身份参加我们的讨论，这种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

这次运动，也极大地推动了孙中山、宋庆龄反帝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发展，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这一时期，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宣传工

^①《致广东军政府请释放工学界被捕代表电》，载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集，成都近分书屋1944年版，“文电”第166页。



作的重要，为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组织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这本杂志的名称很容易让人想到与30年后由宋庆龄在1952年1月组织创办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有着某种联系。《中国建设》以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至1990年1月易名为《今日中国》。

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再次改组他的党，名为“中国国民党”。10月18日他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指出：

吾人欲救民国，所可采者唯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现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之改革也。

在阐述“重新革命”时，他强调辛亥革命“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

扫除”，所以要把窃据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僚、军阀、阴谋政客”驱除殆尽，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民国之主人”。

1920年11月下旬，经陈独秀介绍，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会见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格利高里·纳乌莫维奇·维金斯基。维金斯基又名查尔金，在中国工作时用中文名吴廷康，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奉派前来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在与北京的李大钊和上海的陈独秀就建立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商谈后，经陈独秀介绍，与孙中山见面。在孙中山的书房，他们促膝畅谈了两个多小时。孙中山询问了十月革命的情况，介绍了辛亥革命的情况，并表示希望通过中国南部的军事胜利，发展中国中部、北部各省份的革命运动。孙中山还为广州离俄国太远而感到遗憾，他希望苏联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以加强同广州的通讯联络。宋庆龄陪同接见，她给威金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11月，驻闽南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86



系军阀。11月25日，宋庆龄离开上海的家，陪孙中山乘中国号邮船从上海经福州到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经过汕头时，永翔舰舰长请孙中山、宋庆龄吃了一顿丰盛的海鲜。

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东省财政厅大楼举行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被绝大多数议员推举为非常大总统。会上有一位议员反对孙先生，湖南籍议员周震麟气愤地操起墨盒向他砸去。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同宋庆龄一起检阅了广州数十万市民的庆祝游行队伍，随后又亲自参加了游行。晚间，他们一起观赏了广州人喜爱的灯会，各色精致彩灯竞放光辉。这是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建立政权。然而，孙中山并没有陶醉在喧天的欢呼声和锣鼓声中。他清醒地看到，要收复中原，统一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就必须进行北伐，用武力打倒军阀。要进行北伐，又必须首先消灭在广西的桂系残余势力，以免它为患广东，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

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

出兵讨伐旧桂系军阀头目陆荣廷，并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分兵三路攻袭桂军。为了实现孙中山的宏图，宋庆龄与何香凝发动妇女组织了“出征军人慰劳会”支援前线，宋庆龄亲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这是中国妇女界为了慰问义师第一次办起来的慰劳会组织。

“出征军人慰劳会”主要通过组织义卖、义演、捐献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为北伐筹款和慰劳出征军人及救助伤员。慰劳会曾于这年7月在广州东园举办了一次大型的筹款义卖活动，设有美术、文具、食物、绣织、玩具、花草、化妆货物、药物、音乐、演剧各部。各部均陈列整齐，布置华美。其中以美术部各种书画为最美观，有孙中山书扇，胡汉民、汪精卫、陈协之、高剑父、何香凝、邹海滨、徐桂农、高奇峰等人的书画。宋庆龄以会长身份，与何香凝等女界代表出席了义卖开幕式。孙中山、胡汉民、马君武等到会祝贺。她们辛勤奔走，向各方面筹集了十几万元慰劳经费。当时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评论说：“广州出征军人慰劳会，为孙大总统夫人发



起组织，实为我国创举。连日在东园卖物筹款，成绩颇佳。”同月，慰劳会派出总干事何香凝率领的慰问团，携带蚊帐、衣物、药品、水果等慰问品，奔赴前线梧州，慰问出征的北伐将士。

8月4日，宋庆龄、何香凝又偕古湘芹和朱卓文的女儿慕菲雅等到各医院慰问北伐受伤战士。她们“携备蚊帐三百床，及汗衫、仁丹、食物、烟仔（香烟）等项，亲往医院分给伤兵……所有伤兵，皆欢欣鼓舞，感激非常”。出征军队士气高涨，在短短三个月中就平定了广西，统一了广西。

这次援桂讨陆之战，是孙中山晚年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它瓦解了陆荣廷在广西的反动统治，消除了桂系对广西的祸害，粉碎了北洋军阀政府企图假手桂系、颠覆孙中山的革命政权的阴谋，为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十二 桂林扎营，准备北伐

两广统一后，孙中山便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由桂经湘，进行北伐，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宋庆龄同行。

1921年10月18日，广东出征军人慰劳会与红十字会合并，负责救护伤兵的工作。宋庆龄担任名誉总裁。12月下旬，宋庆龄又亲率红十字会会员由广州到达梧州，学生、工人列队到码头欢迎。街道两旁观者如堵。人们高呼：“热烈拥护孙大元帅督师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拥护国民革命！”在徒步前往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操场参加梧州各界群众欢迎大会途中，宋庆龄被群众蜂拥围观。因为她蒙着面纱，身着西式服装，老百姓误以为她是外国妇女，愈发好奇。宋庆龄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90



历来腼腆，特别怕见生人，碰到这种意想不到的场面，更是浑身不自在。幸亏卫士多方解释，群众才给她和孙中山闪开一条路。随后，宋庆龄又来到了桂林。孙中山是12月4日到达桂林的。当时欢迎队伍由城内一直排到搭有欢迎彩棚的将军桥，绵延十里。孙中山在将军桥与各界代表一一握手后，上轿入南城门到皇城行辕——独秀峰侧原桂王府。沿途除张灯结彩外，大街几里路还用布拉起了天棚，地面铺盖着清香柔软的松叶。数万群众唱起了《欢迎歌》：

蹕节兮遥临，桂岭兮生春。
君子兮至此，万众兮欢腾。
笑徐逆抗命，伪廷卖国计空逞，
不见武鸣陆，穷兵黩武终逃奔。
到头来还是强权失败民权胜，
三民五权主义真，欢迎我元勋。

由法专同学周邦惠创作的这首歌，表达了桂林人民欢迎孙中山的空前热情和他们对北洋政府

头目徐世昌和为害广西的军阀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黄新荣的无比痛恨。

孙中山一到桂林就在桂王府设立了大本营。这里原为前清贡院，民国后改为咨议局，左邻师范学院（今广西师大），规模非常宏伟。警卫团团部设在前楼，中间有一大楼，孙中山、宋庆龄的办公室、餐室、卧室均在楼上。后面是大礼堂，孙中山、宋庆龄与陈少白、胡汉民四人同餐。饭后，宋庆龄常跟孙中山在大礼堂附近兜圈子散步；有时也步行于街道，同围观群众谈话。卫士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孙中山说：“我们为 人民做事，难道会有人来害我们吗？”人们还发现，他们在街上行走，总是宋庆龄稍微靠前，孙中山随行在后。因为当时广西有男尊女卑的陋习，孙中山有意用尊重妇女的行动向旧传统挑战。1922年元旦，孙中山夫妇用华侨送的年糕招待宾客，每一份年糕都是宋庆龄亲手切的。从这件小事，客人们感到了宋庆龄待人的诚挚。据曾先后任过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排长和大元帅府警卫团连长的李洁之回忆：“在桂林期间，宋庆龄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92



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秘书，夜以继日地负责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协助孙中山起草文件和讲稿，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庆龄同志身为孙夫人，在中外都享有盛誉，但她从不为自己谋名利。她生活俭朴，早餐多为腐乳就米粥，家里陈设也很朴素。”

宋庆龄到桂林后参加的第一项重要活动，就是陪同孙中山接见列宁派赴中国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弗莱德。原籍荷兰，在印度尼西亚长大，曾在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参与独立运动，并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当时，马林经张继介绍，由张太雷陪同，乘船离开上海，先到武汉，又经湖南，于12月23日傍晚到达桂林，在建筑雅洁、卫生设备完善的广西银行下榻。马林在桂林逗留了9天，跟孙中山进行了几次晤谈。宋庆龄参加了会见。

晤谈时，马林穿一件黑哔叽呢上衣，套一件灰色棉外套，头戴黑绒高帽，围一条长绒围巾。他身材魁梧，谈吐隽永，常常一边说话，一边下

意识地托托挂在耳朵上的无框无色的近视眼镜。他介绍了爪哇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组织泛伊斯兰教联盟的发展，并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两项建议：一、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则向他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流亡海外的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关系以及华侨对国民党的帮助。通过会谈，孙中山认为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他深信苏联能先实行与三民主义相符的政策。从这一理解出发，孙中山赞同联合苏维埃俄国。马林对这次会谈也颇感满意。他认为孙中山可以跟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

宋庆龄从事的另一重要工作，即发展桂林妇女运动。她不顾旅途劳顿，一到桂林后立即在盐道街桂林艺术学校召开了三次妇女座谈会，调查、了解桂林的妇运状况。大家谈了桂林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的悲苦处境，宋庆龄十分动情。她说，妇女一定要解放，也一定能解放！斗争则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94



生，革命则存。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冲破封建牢笼，做新时代的女性。投身到北伐战争中去，就有力量，就有希望。在宋庆龄的号召下，桂林妇女发动起来，成立了“桂林妇女联合会”，会址设在依仁路道立女子师范学校，后迁至王宫街武庙内跟市政府一起办公。桂林的女国民党员也由原来仅有的一人迅速发展到二百人。

在桂林，宋庆龄还常陪孙中山走访名山胜景，有时是为了视察地形，有时是单纯游览。他们到过孔明坛、老君洞、伏波山等处。1922年2月9日，宋庆龄又陪孙中山游览桂林叠彩山。孙中山头戴礼帽，身穿中山服，右手拄一根手杖。宋庆龄文静地站在他的右侧，身着中式衣裙，左手提一把洋伞。1921年底，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廖仲恺等人游罗浮山。他们是一起坐小电船去的。孙中山在船上谈到中国革命问题。他说：“现在有人对民生主义不甚了解，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并不是当前最迫切的要求，其实这是错的。我们革命，目的是在推翻帝制，建立自由平等繁荣富强的民国。如若不解决民生问题，怎能达到繁荣

富强呢？”孙中山又谈到了他在《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里写的建设远景，大家听了都很兴奋。还有一次，宋庆龄陪孙中山游览七星岩，洞内一片漆黑，一群打着赤脚、衣衫褴褛的小孩子手持火把导游。宋庆龄笑咪咪地给孩子们分赏钱。孙中山勉励孩子们说：“你们今天拿火把导游，将来长大了就要参加革命。革命成功了，日子就好过了。”

1922年3月下旬，正当集结在桂林的部队准备挥师北伐时，传来了后方不宁的消息。孙中山即下令回师韶关，改途北伐，仅留参军林树巍率叶挺一营和电讯、测量二队留守桂林。5月6日，孙中山抵赴韶关督师，宋庆龄率红十字会员多人随行，准备进行战地救护，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孙中山北伐统一中国大业的热诚支持。

6月1日宋庆龄随孙中山乘火车返回广州。当时以孙中山随员身份到达桂林的叶剑英回忆说：“1921年的出师桂林北伐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在后方的陈炯明与北方军阀勾结起来，反对北伐，五六个月不供应在广西的军饷，再加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196 ■



◎1922年5月6日，孙中山广东韶关督师北伐，宋庆龄率红十字会员随行。

上在前面的湖南赵恒惕又变了卦，所以孙中山先生不得已于1922年回师广东。但是他这时仍决心北伐，所以他本人进入广州，却叫李烈钧、朱培德、许崇智等仍出兵江西，进行北伐。当北伐军

打下赣州，节节推进时，盘踞广东根据地的陈炯明（当时在惠州）却密令叶举，由广西突然袭击广州，这就是陈炯明的公开叛变事件。”^①

宋庆龄在广西的这段生活虽然只有半年多，但却给她留下了珍贵的回忆。195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桂林市政协曾将孙中山、宋庆龄当年的部分合影寄赠宋庆龄。宋庆龄收到后即复信致谢：“感谢你们考虑周到，赠给我珍贵照片，特此函谢。遥祝你们工作更好，学习更好。”

^①叶剑英：《孙中山先生的建军思想和大无畏精神》，《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页。



十三 “中国可以没有我， 不可以没有你”

广州越秀山公园南门对面，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八角形建筑，蓝色的琉璃瓦屋顶，红色的圆柱，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这里原为清新军督练公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将总统府设于此地。进入公园南门，有一座小山坡，在开着绚丽红花的凤凰树丛中，巍然屹立着一座石碑，上书“孙中山读书治事处”。这就是孙中山、宋庆龄观音山住所的原址——粤秀楼。

辛亥革命前，广东提督龙济光在这里修建公馆。龙济光是袁世凯的走卒，深为老百姓痛恨，为了防止刺客，他前后花费三千余万银元在观音

山修建了一个坚固易守的住宅。从他的公馆到新军督练公所通以天桥——一条桥梁式的过道，蜿蜒一里多长，由街道及住屋上经过。山下装有升降机，山上装有发电机。由山下到山上共设28个兵站。山上有炮垒83座，配备了两尊15厘米的大炮、两尊12厘米的大炮、四尊马克辛炮。道旁还置有12厘米的大炮两尊。山上掘有水泥钢筋防空壕一孔，又建有高射炮楼两座，配备了瞭望镜、探照灯等工具。不过，孙中山夫妇住进这里之前，上述设施早被撤除。

1922年6月中旬，当北伐军克赣州、进逼吉安时，孙中山一手培植的广州国民政府陆军部长陈炯明发动兵变，将总统府与粤秀楼夷为平地，孙中山与宋庆龄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幸运，九死一生，幸免于难。

陈炯明，字竞存，原是清朝秀才，1909年任清广东省咨议局议员，1909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任广东副都督，后代替胡汉民行都督职权。“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在新加坡组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00



织所谓“中华水利促进社”，拥戴前清大官僚岑春煊为首领，跟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对抗。

1916年袁世凯暴卒后，陈炯明再次投机革命。

1917年，孙中山倡议护法运动，陈炯明由于找不到其他出路，表示“竭诚拥护”。同年底被孙中山

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孙中山

任命他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第二年孙中山

出任非常大总统后，又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兼内务

部长，集四要职于他一身。权力增大，陈炯明的

野心随之膨胀。小时候，他曾做梦，一手抱日，一手抱月，这就是他用“明”字做名字的原因。

如今，他真想一手遮日月，一手遮青天，取孙中

山而代之，成为岭南王。1922年，陈炯明以“保

境安民”“联省自治”为旗号，与南北各实力派

军阀结成反对孙中山的反革命联盟，阻挠北伐进

行。他派人在广州暗杀了拥护孙中山的名将邓

铿，扣押了财政次长廖仲恺，想断绝北伐军的粮

饷。他还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反对北伐军假道

湖南。因此，孙中山免去他广东省长、粤军总司

令和广州政府内务部长三职，只留下他陆军部长一职。“图穷匕首现”，陈炯明阴谋败露之后，于同年6月15日密令他手下的将领叶举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

兵变前夕，宋蔼龄刚好带着小女儿洛士文来看望宋庆龄和孙中山。宋庆龄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一无所知，还要宋蔼龄在回上海时把小洛士文留在她身边。后来和宋蔼龄关系密切的一位作者在写到这件事时说，“如果蔼龄真的把孩子留下，那么历史就要因此而发生变化，因为孙中山夫妇带着一个孩子是绝不可能脱险的”。

15日夜，陈炯明的军队开始对总统府和孙中山住地粤秀楼所在的观音山实施包围。情况万分危急。16日凌晨两点，孙中山叫醒睡梦中的宋庆龄，要她一起逃出包围圈。孙中山说，他刚接到卫戍司令魏邦平的电话，说陈炯明的部队将进攻总统府，必须立刻避入战舰。宋庆龄请求孙中山先行撤离，因为她如同行，反对孙中山不便。孙中山态度坚决地说：“我身为大总统，岂能擅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02



离职守，屈服于暴力？平定叛乱是我的责任，生死成败决不计较，你们快走吧！”宋庆龄深情地看看孙中山，同样坚定地说：“先生，你应该赶快走。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再说，我是一个妇女，总不致有什么大危险。请你放心！”当时宋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宋庆龄一边说服孙中山，一边帮他穿上白夏布长衫，戴上白帆布的盔形帽，化装成出诊医生的模样。接着，林树巍、林直勉、胡毅生、陆志云、谭惠全五人挽着孙中山的双臂，强挟他离去。孙中山身不由己，只好回过回头，对跟在身后的侍卫副官马湘和黄惠龙说：“你们不要跟我，好好保护夫人！”后来，孙中山跟广东省长伍廷芳及一些文武官员乘坐“楚豫”号军舰避住黄埔。

当时，叶举部队4000人分东、南、北三线包围总统府，从北面攻占观音山官邸的有一个师的兵力，而总统府只有一个团的卫队，团长陈可钰，营长薛岳、叶挺、张发奎。守卫观音山官邸的卫队

官兵只有五十余人，队长是美国人姚观顺^①；一分队长黄惠龙，二分队长马湘。主要武器是新从檀香山购买的手提机枪30支，其余就是一些驳壳手枪、五响步枪。战斗打响前，宋庆龄把厨房里的白米、鳅鱼和咸鱼都拿出来，让战士们饱餐一顿。然后大家配好武器，准备迎敌。由于叛军占领了山头，居高临下，左右夹击。他们一面朝粤秀楼开枪，一面狂呼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冲进总统府赏洋50元！活捉孙文赏洋20万！”为了吸引叛军的火力，造成总统仍在粤秀楼的假象，宋庆龄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毅然命令卫队将大楼里的全部电灯都开开，连阳台和过道也亮灯，以掩护孙中山退却。四周夜色浓重，独有粤秀楼灯火通明，

^①姚观顺（1887~1952），英文名字乔治·鲍，上校，美籍华裔，1887年生于美国加州格拉斯谷，毕业于美国诺恩里奇军事学校。祖籍广东香山。1917年，他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的卫队，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奉命保护孙夫人脱险，自己负伤。伤愈后，1925年至1927年间在北伐军中任工程师。1931年，由宋庆龄推荐给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派往财政部所属的盐警队任职。先后参加了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1943年后，在昆明任中国与美军的联络官。新中国成立后，在澳门从事工程工作直至去世。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04



像高耸在黑夜里的一座光明堡垒，像在险风恶浪中拼搏的一艘战舰。因为看不清敌人，卫队暂不予反击，只潜伏在隐蔽处。

凌晨5时许，叛军一面在广州市区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我军将士，一致赞同。促孙下野，以示大公，商民人等，幸勿惊恐。”一面向粤秀楼发起猛攻。马湘负责护卫宋庆龄。姚观顺指挥卫队用来福枪和机关枪跟敌人对射。叛军用野炮轰击孙、宋寓所。此时，观音山成了火山，粤秀楼是火山口，喷着火，吐着烟。卫队一连打退敌人三十多次进攻，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其余的人仍英勇奋战，毫不畏缩。在战斗进行中，宋庆龄常巡视四周，时加勉励，鼓舞卫队斗志。到了8点钟，卫队的弹药殆尽，只得停止回击，仅留几盒子弹，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斗。在这种情势下，继续留守已无意义。警卫队长姚观顺劝宋庆龄立即下山转移至总统府，那里有陈可钰团长率领的警卫团驻守，或者可以想出冲出重围的办法。于是马湘立刻奉宋庆龄之命找到电工，跑到秘书林直勉卧室，撬开保险箱，把孙中

山与苏俄来往的一些文件烧毁。然后，由黄惠龙先行，宋庆龄居中，马湘殿后，从天桥向总统府跑步前进。这时，埋伏在执信学校前面的叛军用机枪向桥上扫射，枪弹密如雨霰，蚩蚩之声不绝于耳。刚过天桥，粤秀街一段栈桥即被叛军炮弹击中，登时焚毁，火光熊熊。叛军围攻总统府大半日仍无成效，便请态度中立的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于下午3时派出军使马毓藩前来与陈可钰团长讲和。陈可钰提出三个条件：一、保护孙夫人安全退出，沿途陈军不得侵犯；二、保障总统府全体官兵生命及家属安全；三、驻总统府警卫团全体官兵开往燕塘集中，将枪械搭架点交，由粤军发饷一月解散。不料正在商议时，已失去控制的叛军已从总统府后门蜂拥而入。事态危急，黄惠龙双手拉开铁门，跟马湘合力保护宋庆龄从前门冲出。宋庆龄头戴姚观顺的草帽，身披孙中山的雨衣，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无畏精神掩过敌人耳目，在混乱的人群中得以脱险。冲出总统府大门后，敌人又是一阵轰击。左边涌来一群乱兵，如群蝇逐臭，前后左右都是乱兵的身影。幸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06



而马湘身上携有50枚面额两角的银元，便向左右两边掷去。叛军争相俯拾，宋庆龄一行乘机抢过马路，逃进斜对面一条曲折蜿蜒的小巷。此后宋庆龄历九死一生，在卫士的保护下，来到一位同志——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的寓所。马伯麟不在家，看家的是他的九妹，还有一位亲信勤务兵，正奉他的命令在烧毁文件。马湘赶快问勤务兵看到孙中山先生没有？勤务兵连声回答：“看见，看见。”宋庆龄听了很高兴，立即写了一封信托他代交孙中山。这时，马湘忽然想起宋庆龄已两天没有吃东西，便请马九妹叫仆人弄了些饭菜。宋庆龄因为过度疲劳，勉强吃了半碗，然后在马九妹的床上睡了一夜。那天晚上，炮声通宵不断。宋庆龄听到战舰开火还击的声音，知道孙中山已安然无恙，感到万分欣慰。

6月17日，宋庆龄仍化装为村姬，逃往沙面自来水厂一位国民党同志李国斌家。他家住在一座自来水塔底下，大小十余口人，挤在一间小房里。当晚，李国斌的妻子把床让给宋庆龄，他们一家人便睡在地上。18日上午8时，岭南大学校

长钟荣光派来一艘电船，将宋庆龄等接到与广州一河之隔的岭南。当天下午，叛军搜查了钟荣光的家，但宋庆龄已安全转移。那天晚上，宋庆龄终于在“永丰”舰上见到了孙中山，真如隔世重逢，悲喜交集。由于时值盛夏，舰内酷热难熬，船身颠簸不止，为了宋庆龄的安全，孙中山让她离舰，仍回岭南大学钟荣光家（今中山大学第一招待所）暂住，自己留在舰上指挥平叛。次日，宋庆龄在孙中山的美国顾问那文的护送下抵达香港。

6月25日，宋庆龄由孙科陪伴，从香港乘大洋丸到上海。28日及29日，上海《民国日报》连载《总统夫人之粤变纪实》，该文生动而真实地记述了这场事变的经过，后经过重译，以《广州脱险》为题，收入1938年光华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一书。这篇文章被称为宋庆龄“将来自传中最动人之一章”。文章详细记述了她和孙中山在叛军的枪林弹雨中脱险的经过，至今读来仍有身临其境之感。笔录如下：



六月十五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两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围漆黑，看不出敌兵。我只看见黑夜中卫队蹲伏的影子。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

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是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有一位侍卫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连击毙不知多少敌人。到了八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卫队停止回击，只留几盒子弹，候着最后的决斗。

此时情势，勾留也没有意义了。队长劝我下山，为惟一安全之际。其余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五十名卫兵竟无一幸免于难。

同我走的有二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中山先生的侍卫）。我们四人，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我们四面只听见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我们受两旁夹板的掩护，匍匐而进，到了夹板已被



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跟着就是一阵哗剥的枪声。在经过这一段之后，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血流如注。一看，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而伤中一条大血管。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的后院。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轰毁，交通遂断绝。这总统府四围也是炮火，而更不便的，就是因为邻近都是民屋，所以内里的兵士不能向外回击。

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而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但是他反安慰我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

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的四射。有一次在我离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准备随时

就要中弹毙命。到四时，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兵提出的第一条就是保我平安出险，但是那位军官说他不能担保我的安全，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官长，都不能约束。正在说话之间，前面两层铁大门打开了。敌兵一轰进来，我们的兵士子弹已竭，只好将枪放下。我只见四围这些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我们。登时就把我们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刺开，大家便拼命地乱抢东西。我们乘这机会逃开，正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一队是逃出的士卒，又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来抢掠的乱兵。幸而我头戴姚副官长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

出大门后，又是一阵炮火，左边正来了一阵乱兵，要去抢财政部及海关监督处。前后左右，都是乱兵在进击。他



们一面进，我们一面穿东走西曲折地在巷里逃。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四围横列着的都是死尸，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居民，胸部刺开，断腿失臂地横陈街上的血涡中。在这时我看见一极奇异的景象，就是两人在街房相对蹲着，我们奔过时，看见他们眼睛不动，才知道他们已死了，也许是同为一流弹所击毙的。

正走之时，忽有一队兵由小巷奔出，向我们一头射击。同行的人耳语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乱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去抢掠了。我们爬起又跑，卫兵劝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我要昏倒。过了将半小时，进击的枪声渐少，我们跑到一座村屋，把那门上的门推开躲入，屋中的老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恐怕受累。正在此时我昏倒下去。醒回来时，两位卫兵正在给我浇冷水，把

扇我。其一卫兵便偷出门外去观动静，而这刹那间，忽有一阵枪声，屋内的卫兵赶紧把门关闭，同时轻声报告我外边的卫兵已中弹而也许殒命了。

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为一村姬，而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过了一两条街，我拾起一只菜篮及几根菜，就拿着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经过触目惊心的街上，我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于早间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姬，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住友人家。

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



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我离开广州真巧，因为那天下午，我所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来沪。

8月14日，孙中山平叛失败，乘英舰“摩汉”号抵香港，换乘俄国“玛丽皇后”号邮舱到达上海，由吴淞登岸。

“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一生中最为苦闷、最为气愤、最为痛心的时刻。叶楚伦在《痛心》一文中写道：“痛心到孙总统平日以忠厚待人，竟受了这样一忠厚待人的结果。痛心到孙总统叠次宣言将广东完全交给陈氏，而陈氏竟不容孙总理在广州。痛心到孙总理辛苦护法，竟失败于陈炯明的一叛。痛心到陈炯明，因一个总司令问题，竟开了个民国未有的叛变先例。痛心到陈炯明，危害孙总统的手段，竟比北洋武人的兵谏更辣。……”

痛心到这次事变，是中国新生机上，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伤痕。”^①9月18日，孙中山在《告国民党同志书》中写道：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屡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险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

陈炯明占据广州后，得到了一些孙中山早期同苏俄和共产国际使者谈话的书面记录。他让一些不倾向革命的中国报纸和具帝国主义色彩的外国报纸去发表。这些报纸对此大肆渲染。陈炯明借此以“使中国免于共产主义的大救星”自命，从广州最富有的商人、西方支持的大军阀吴佩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18日。



乎，以及香港的英国人那里捞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好处，金钱、军火源源而来^①。

陈炯明叛变后，全国各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

①1922年广州“六一六”事件的发生，源于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败退出关，黎元洪复任总统职，陈炯明认为护法完成，主张在稳妥改革地方政治的基础上，联省自治，成立中华合众国，故不支持孙中山北伐。孙中山则主张“北伐统一”。广州“六一六”事件使得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政见分歧公开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玉贞在《共产国际为何欣赏陈炯明》一文中提出：在对待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点上，陈炯明的积极态度曾一度远远超过孙中山。他曾在1920年5月10日给列宁的回信中盛赞布尔什维主义，并表示“将倾全力在全世界传播”布尔什维主义。当时，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使命是在华南、在广州寻找能够在“全国制造起义”的人。共产国际也想以陈炯明为中心开展中国和东亚的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底，马林访问陈炯明时，陈炯明爽快答应，“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广州建立一个办事处”。所以直到1921年底，陈炯明在莫斯科来华使者眼中和共产国际的刊物中，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还是褒陈贬孙。1922年孙、陈冲突发生后不到一个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个十分详尽的报告，讲到 he 参加的中共“一大”和访问孙、陈以及国民党其他领导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肯定了马林的报告，修改了最初的选择，转而支持国共合作。到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就不再出现陈炯明的名字了，并明确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

纷纷发表声明进行声讨。为了对处于危难和迷惘中的孙中山给予支持，中国共产党于6月1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又于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及时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党还明确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①表示了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

这时，一个军界和政坛人物——蒋介石开始发迹。蒋介石是孙中山从广州脱险后登上“永丰”舰时的随从军官之一。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同孙中山每天都在一起，并赢得了孙中山的好感。之前，他有好几年脱离了军界和革命工作，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人。蒋介石随孙中山上“永丰”舰后，眼看形势不妙，就私自溜回了上海，他扮演的角色并非像后来他自己描绘的那样英雄。但他同孙中山的关系，使他后来得以取得国

^①1922年6月20日《先驱》第9号。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18



民党的最高军政大权。再后来，他同上海金融界勾结，实现了他从革命到反革命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叛变。这与陈炯明在一个省内的叛变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北伐雄图化为灰烬的孙中山在极度的痛苦中看到了真正的革命力量、真正的革命希望。列强不可信，军阀不可恃。“走联俄联共的道路”是国民革命的唯一转机。

在这次叛乱中，孙中山和宋庆龄还遭受了两个十分令人痛心的损失：一是宋庆龄因极度紧张和疲劳，在逃难途中小产，此后再无生育^①；二是总统府被叛军焚毁，孙中山的藏书以及许多重要未刊稿悉付一炬。宋庆龄在1980年2月13日致一位历史研究者的信中说：“孙先生在广州时也给列宁通电、通信。可惜，宝贵的底稿都被陈炯明放

^①据廖梦醒、何香凝等回忆，宋庆龄到达岭南大学钟荣光家就流产了，但孙中山的副官张猛说，宋庆龄是事变发生后数天在香港流产的。

火烧观音山住所时所烧去。”这两个损失都是无法弥补的。

宋庆龄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和几年来辅助孙中山南征北战的功绩，受到了革命同志及广大官兵的认同和赞许。何香凝后来追忆这段历程时说：宋庆龄当时“处处为孙先生着想——也可以说是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临难应变，这么大义凛然，真令人感动！……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对于夫人就格外地尊敬爱护了”。

就连国民党中一些原来对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不满的党员，也开始对宋庆龄刮目相看。

广州脱险后，孙中山更是感到宋庆龄无论在战斗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是他无可代替的助手和伴侣。他深情地书赠妻子一副对联：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

篤愛有緣共死生
精誠無間同憂樂
慶齡賢妻孫文

◎孙中山为宋庆龄题写的对联“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20



“爱有缘共死生”，表达了他们之间风雨同舟、忧乐与共的至情，也成为宋庆龄参与国民革命事业的真实写照。

十四 拥护实行三大政策， 支持建立革命武装

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给孙中山以异常沉重的打击。使孙中山深深地陷入彷徨和苦闷之中。宋庆龄回忆当时孙中山的心情时说：他“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我曾多次听他说国民党内部矛盾怎样使它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内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怎样领导革命斗争，这是 he 想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孙中山十分苦闷、极端困难的时刻，宋庆龄给他以热情的鼓舞、全力的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在经过了长期的思索和探求之后完成了他一生中十分重要、最为伟大的转变：从向西方学习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22



转向“以俄为师”；从幻想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援助转向“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以推动中国国民革命事业，实现他的主义和理想。

1922年到1924年这三年是孙中山革命历程中最辉煌的年代，对于宋庆龄来说，也是她崭露头角的时代。在孙中山的晚年放射出灿烂光辉的时候，宋庆龄如一颗硕大的卫星，紧紧追随着他，并有力地帮助他完成了这个伟大转变。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巨大支持，突出地表现在支持孙中山力排众议，跟苏俄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并把它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在促成孙中山作出与苏维埃国家结成联盟的决策过程中，宋庆龄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实际工作方面，都曾经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她承担了大部分致苏俄函电的起草工作；尽量多地搜集有关苏俄的一切资料；陪同孙中山多次会见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且在事前为这些有重要意义的晤谈进行准备。

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乘“俄罗斯皇后”

号轮到上海，换乘日本船“京都丸”抵吴淞，从吴淞乘汽车直往莫利哀路寓所。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刻，8月23日，孙中山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1889~1928）。李大钊是特地赶到上海慰问孙中山，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同他商谈建立联合战线问题的。李大钊还和孙中山专门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对李大钊的到来，孙中山非常高兴。他和李大钊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宋庆龄每次旁听，都深受教育。她认识到“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据宋庆龄回忆：“早在1919年，他（按：指孙中山）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①在孙中山的热情邀请下，李大钊由孙中山主盟，最先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对李大钊说：“你尽管一面做第

^①《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载1962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表现出孙中山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地位的尊重。

后来，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还曾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版本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大钊在被张作霖杀害之前选寄了一本。

同月25日，苏俄全权代表越飞派一随员携函拜访孙中山。双方就远东局势问题交换了意见，洽商了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苏俄方面表示：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乃在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在完成此项伟业的进程中，苏俄将给予最挚热的同情与大力援助。孙中山希望越飞先派军事工作人员来沪，以便详细了解军事问题。这一阶段，越飞四次致函孙中山，孙中山写了三封复信，都是在宋庆龄协助下用英文书写的。

转眼到了1923年，宋庆龄30岁了。

1月18日，孙中山与以养病为名秘密来沪的越飞正式会见。越飞（1883~1927）蓄着黑胡子，戴眼镜，身体瘦弱，但才思敏捷，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和能干的外交家。孙中山与

越飞的谈判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越飞的夫人、两位秘书和宋庆龄都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见。宋庆龄回忆说：“孙先生1923年在上海故居的秘书室内见过越飞，即Joffe，是列宁的代表。接见数小时之后决定为避免租界上各派系中对革命的危险等，并决定派廖仲恺先生约越飞到日本会谈，约在日本‘热浪’（Atami）讨论问题，洗硫磺浴以治疗风湿症。”1月19日、20日、22日，孙中山与越飞又在越飞下榻的上海汇中饭店和孙中山寓所举行了三次会见^①。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一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而

^①另据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先生与越飞相见之下，极为喜悦，当即与越飞在楼上客厅开始会谈，孙夫人、林伯渠和李大钊亦参加，一连整整谈了六天。在这期间，先生吩咐我，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过了几天后，林伯渠来，我问他前几天会谈的是什么问题，关防为什么要这样严密。他告诉我说，这次谈的是关于革命党应以苏俄为师、苏俄帮助中国革命，打倒军阀的问题，要我保守秘密。”马湘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珍贵史料，但也有一些宋庆龄认为应予纠正的错误，如：孙中山与越飞会谈时，宋庆龄遵守革命纪律，一直守候在秘书室，并未正式参与会谈。



这一政策又促进了他“联共”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在宣言中苏联做出了历史性的承诺，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并归还沙皇侵占的土地，给予中国谋求自由解放的革命者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协助等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四点内容^①：

第一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任务。文中说：“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的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①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引文，《孙中山全集》第7卷（1923.1~1923.6），第51、52页。宣言中提到的“中东铁路”为我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旧称，原为1897年至1903年沙俄修筑。1905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领，称南满铁路。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

第二点是应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苏俄于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会中列举的原则，并“向孙博士重新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第三点是建议将来举行中俄会议解决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孙中山以为可作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

最后一点是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越飞向孙中山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①

在越飞之前，宋庆龄已经接触过马林和维金斯基等一些较早来到中国的苏联信使，他们的年

^①日本支持的白卫军确曾控制外蒙并对西伯利亚发动袭击，后来红军开进才将之击败。



纪和青春激情同她相仿。现在越飞身上成熟的智慧和经验，更令宋庆龄钦佩。同时，她也在协助孙中山与越飞进行英语交谈、通信和谈判的过程中，继续向孙中山学习着。孙中山在遭遇了陈炯明叛乱这一重大挫折后，很快又重新振作，积极探索革命胜利的道路，使宋庆龄对孙中山善于学习的精神，无畏的、始终如一的革命精神感受更深。

1923年1月，粤军邓演达会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联合驱逐陈炯明，并电请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2月15日（即阴历除夕），孙中山与宋庆龄由上海启程，搭乘“杰斐逊总统”号轮船南下，17日抵达香港，稍停几日，于21日重返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孙中山抛弃了护法这面陈旧的旗帜，积极推进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他一方面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访问考察，另一方面邀请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帮助中国革命。

这年9月，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身份来华。10月6日鲍罗廷飞

抵广州；10月18日，鲍罗廷被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2月13日又被任命为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当时39岁，身材魁梧，脸盘宽大，审慎而又善交际，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他是“东方”和“西方”相结合的国际革命运动的产物。他十几岁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遇到了列宁，并在列宁手下工作。

鲍罗廷向孙中山建议，为了实现北伐目标，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主要有：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民族和社会革命者的团体，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些因素被孙中山认为是苏共力量之所在，也是它取得胜利的奥秘；建立一支独立的、非军阀控制的军队，开办军官学校；还必须联合民众。鲍罗廷还提议，根据俄国的经验，一定要制定和实施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经济改革的纲领。鲍罗廷在反击陈炯明进犯广州、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平息商团叛乱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著名将领拉斐特曾经辅佐华盛顿指挥作战。孙中山认定鲍罗廷就是他



的“拉斐特”，对鲍极为信任，甚至国民党的组织法及党纲、党章等重要文件都先交鲍起草，他最后审定。

那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曾问孙中山，是否知道鲍罗廷的真实姓名。孙中山回答说，“他的名字是拉斐特！”

宋庆龄经常去鲍罗廷家。由于大家都说英语并都在美国生活过，她觉得和鲍罗廷一家人在一起有许多共同语言，很愉快。鲍罗廷夫妇会尽量用宋庆龄能够理解的词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宋庆龄受益颇丰。鲍罗廷的妻子法尼娅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两家的关系时说：

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并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和鲍罗廷都精通英语，所以他们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一点（当然，革命观点的一致性就更不必多说了）极有利于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友好接触。孙

中山有一次竟就此开了一个玩笑，他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者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孙中山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地同鲍罗廷谈话，详细询问俄国革命发展中某些阶段的情况、俄共（布）的历史、1905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凯歌高奏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情况等。他对列宁生活的细节也很感兴趣，例如列宁侨居国外时怎样工作（鲍罗廷曾于1904年与列宁一起侨居瑞士）、怎样培养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种学科和学习外语、如何出版和编辑《火星报》等许多情况。……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与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向我讲述了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的情况，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一大



批妇女代表。……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孙把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

还有一篇文章谈到鲍罗廷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关系，及对他们的影响。文中说：

中山在日，出入门下者，于廖汪胡



◎宋庆龄（右）、宋美龄（中）与鲍罗廷夫人（左）。

蒋诸同志外，俄顾问鲍罗廷亦其一也。中山为大元帅时，因恐政敌暗算，警备极严，部属进谒，须先经传达，但另有一种特别符号，佩此符号者，不仅可以直入大元帅府，而且可以直入大元帅室。但此项特别符号仅十二枚，非亲信之人，不能领得，而鲍氏亦得此项特别符号一枚，故可以直入大元帅室，可见其与大元帅关系之密切，故与宋氏亦常见面。鲍虽俄人，而英语甚佳，宋氏曾留美，英语亦佳，彼此可以直接通话，无需舌人也。鲍氏不仅曾参加俄国大革命，且曾参加土耳其革命与英国劳动运动，在英国与俄国（十月革命以前），曾几次入狱，革命经验极为丰富，故宋氏颇喜与鲍氏接谈，因宋氏对于世界革命消息，颇喜探听也。说者谓宋氏思想之左倾，实得鲍氏之影响。^①

^①元伯：《宋庆龄左倾记》，《现代史料》第2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3年出版，第145页。



转眼到了1924年。从某种意义说，这一年对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是关键性的一年。孙中山和宋庆龄以往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这一年的发展做准备。

元旦，孙中山主持群众大会，庆祝新命名的“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宋庆龄为一年半前在陈炯明叛变时保卫总统府有功的将士们授勋。人们普遍承认，在那次事变中，是宋庆龄挽救了孙中山的生命，从而挽救了革命。因此，即使是国民党中的保守派现在也不再反对他们的婚事了。事变之前，还有人认为宋庆龄是“花瓶”，故意地称她“宋小姐”，现在不但承认她是“总理夫人”，而且由衷地尊称她“孙夫人”了。宋庆龄经常在公开场合与孙中山一同出现，这对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妻子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但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合适的了。宋庆龄赢得了声望。

1924年，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月20日上午10时在广州开幕，30日闭幕。参加大会的代表共计198人。孙中山以总理身份

担任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与十三年前的武昌起义同样重要，必留为历史上之大纪念，开革命之新纪元。”下午2时，孙中山又在会上讲述了中国的现状及国民党改组之必要。他说，俄国革命是彻底革命，故革命虽迟我六年，而成功较我们为快，此一次改组，就是从今日起重新补过。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开幕式当天，孙中山还亲自指定李大钊为五人主席团成员和九人组成的宣言审查会成员。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李维汉、王尽美、夏曦等共产党人也参加了大会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时年31岁，和宋庆龄同年。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和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章程》中，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的召开表明改组后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革命阶级的联盟



和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因此，国民党一大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标志。

据考证，孙中山指派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三位女代表是陈璧君、何香凝和唐允恭^①。宋庆龄1924年1月9日回上海陪侍母亲，4月11日才由沪返粤，因此，她没有参加国民党一大。

宋庆龄虽然不是国民党一大的正式代表，当时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但她后来坚定、明确地保卫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行动表明，她一开始就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当时，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坚决拥护孙中山勇敢行动和开明思想的只有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少数人。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什么决定国共合作。她后来回忆道：

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

^①参阅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出版1955年版。

他所说的“堕落”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的后果。对于他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①

宋庆龄深深懂得孙中山的用心。所以凡国民党右派来找宋庆龄，企图从她那儿得到支持的，都遭到了她的断然拒绝。她回忆说：“在这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

^①王昆仑：《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



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①

国民党一大期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发来热烈的贺电。孙中山立即复电表示谢意，并致以兄弟的敬礼。

当大会正在紧张进行时，传来了列宁于21日不幸逝世的消息。孙中山在鲍罗廷陪同下当即中断会议，向代表沉痛宣布了这个噩耗，率领全体代表起立默哀。孙中山即席发表了悼念列宁的演说。他说：“俄国革命……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

^①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参阅尚明轩著《孙中山传》，第280~281页及达林著《中国回忆录》（中译本），第147页。

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

2月24日，国民党举行列宁追悼大会。大会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由廖仲恺主持，孙中山主祭。祭台上高悬着孙中山亲手书写的“国友人师”祭帐，表达了对列宁的敬重。

孙中山以充满深情和政治含义的文字作了一篇文言文祭文：

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
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
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
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
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
千恨，我了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
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
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
如生，永怀贤哲。



当时，宋庆龄由于在上海，没能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列宁追悼大会。但她对大会的情况予以了密切关注。宋庆龄后来说，她永远不会忘记孙中山在追悼列宁时的这番发言。她还指出，这个演说成了孙中山的政治纲领。孙中山相信，他走列宁的路，一定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巨大支持，还表现在支持孙中山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1923年5月4日，宋庆龄抵达广州的第三天，即赴各伤兵医院慰问伤员。6日，又到石围塘滇军临时病院、河口大本营野战医院慰问和犒劳伤兵。8日，陪同孙中山慰劳前敌将士。同年8月，广东东江一带大风酿成水灾，兵民颇苦。8月7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冒着炎热乘专车前往灾区，携带饼干、番薯干等数万斤慰劳士兵，赈济灾民，稳定了军心和民心。

为了彻底消灭盘踞在惠州老巢的陈炯明叛军，孙中山命令航空局装配、购置了十余架军用水陆飞机，一齐开赴惠州，轮番掷弹，务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寝。1923年8月9日下午4时，阳光灿

烂，万里无云，广州大沙头机场拥集着几百名观众，在兴致勃勃地参观这批飞机试航。宋庆龄宣布试飞开始后，驾驶员分乘各机次第飞行，表演了翻跟斗、螺旋转下等飞行绝技。还有一名外籍工程师夏利比，表演了在机翼上行走和翻身倒垂于机翼下等惊险动作，令观众叹为观止。宋庆龄也身穿航空服，登上了一号自制飞机。这架飞机的仪表、钢管、马达等部件是大元帅府航空局长杨仙逸从美国带回的，同时也采用了国产零件，机架系用东北白松木制成，发动机有90匹马力，机舱有两个座位，没有舱盖。试飞的飞行员叫黄光锐。

当时，外国的航空事业尚处于初创阶段，我国的航空事业更为落后。由于设备简陋，飞机失事时有发生，乘机飞行要冒很大的风险。1911年4月，广东籍华侨飞机师冯如在广州郊区的一次试飞中坠机身亡。1912年3月，朱卓文在南京试飞时也曾发生事故。这次用自己装配的飞机再次试飞，显然有着更大的风险。

黄光锐和宋庆龄坐定之后，一号飞机马达轰

宋庆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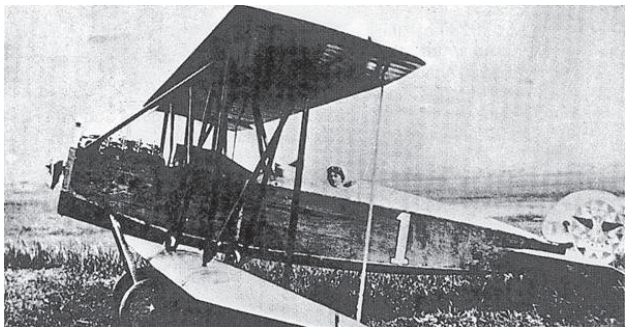
的青少年时代 242



鸣，飞机冲出跑道腾空而起，在白云珠海之间盘旋数圈。当飞机平稳着陆后，机场上爆发出了阵阵欢呼声。文武官员们涌上前去，向驾驶员黄光锐和宋庆龄表示祝贺。

人们知道，孙中山历来重视发展航空事业。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就预想到飞机将成为战争中的重要武器，叮嘱旅美青年同志学习航空飞行技术和飞机制造。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办了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了20余名学生。1920年，孙中山下令成立了航空局，并派飞机担任侦察轰炸及通信运输等工作。宋庆龄以大无畏的精神参加这次试飞，显然是为了以实际行动实现孙中山“航空救国”的主张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新方针。孙中山为宋庆龄的行为深深感动，亲自命名这架飞机为“洛士文”号，以为纪念。洛士文——这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试飞后，宋庆龄坐在机舱内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对许多中国青年女性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她们相信妇女同样可以攀登到任何高度，也为孙中山“航空救

国”的口号添了一段佳话^①。



◎1923年，宋庆龄在“洛士文”号飞机机舱里留影。

同月，“永丰”舰由汕头开赴厦门，跟谋袭厦门的北洋海军“海容”、“应瑞”两舰发生海战。“永丰”舰将敌舰击退，舰身亦被击伤，后利用日轮掩护退出战区，于1日抵虎门，12日开进白鹅潭。

8月14日上午10时半，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亲临“永丰”舰慰问，并纪念羊城蒙难一周年。一年前，孙中山和宋庆龄相继脱险后就是在这条军

^①据另一资料，当日参与试飞的是杨官宇、黄光锐、胡锦涛、林伟成等。宋庆龄是参加新造飞机开幕式，并在机前留影，没有参与试飞。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44



舰上重逢的。孙中山赞许了该舰官兵多次经历艰难仍坚持正义的精神，并与官兵在舰上合影留念。现在这张照片在许多书刊上都可见到：在前甲板上，孙中山、宋庆龄与身躯笔挺、穿着白色海军服的军官、水手们站在一起，夫妇二人穿着朴素的常服，毫无架子，不认识的人很难看出他们是领袖人物。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与官兵合影，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

10月12日，宋庆龄陪孙中山视察了广州飞

机制造厂。10月21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坐“江固”号炮舰亲莅虎门要塞，他们视察了威远炮台、虎门墟、虎门塞、沙角炮台以及蕉门、大虎、小虎、蒲州等要隘，直至23日半夜始返广州。在1840~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军民曾在这里对英国入侵者进行了英勇抵抗。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显然，孙中山正从保卫革命的新视角注意国防事业的发展，



◎1923年10月21日，宋庆龄在虎门炮台。



因为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国家摆脱屈辱的处境。宋庆龄经常出席军事检阅显示，她对于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同孙中山完全一致的。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这所学校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它的任务是为革命军培养军官，这些军官要有献身于革命事业及革命主义的精神，并熟习现代战争技术。学校坐落在距广州约四十里的黄埔岛，四面环水，南连虎门要塞，是广州的第二门户。清晨6时，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江固号”军舰从大本营出发，于7时40分抵达军校参加盛典，给予师生很大的鼓舞。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率该校员生五百余人在校前码头排队奉迎。孙中山和宋庆龄了解了学校的教学计划，巡视了学校讲堂及寝室。9时20分，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登上主席台。孙中山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学问》为题在学校礼堂发表长篇讲演。孙中山说：

研究各国革命历史，尤其是最近俄国革命史，得到一个大教训，即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显然是一般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革命一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大告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好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孙中山讲演毕，学生齐集操场行开学式。据当时参加开学典礼的季方回忆说：“庆龄同志当时很年轻，态度慈祥，仪表端庄，令人肃然起敬”，“大家都知道她不仅是中山先生的爱侣，而且担负着机要秘书工作，为中山先生整理文件、函件，提供资料，一方面深受中山先生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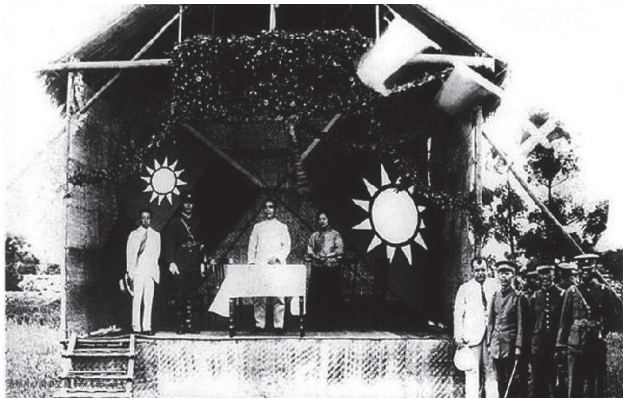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48



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帮助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发展，对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都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是一位得力的助手。”

下午3时，宋庆龄又陪同孙中山出席了在大操场举行的阅兵式。这一天，宋庆龄还陪孙中山顺道至长洲要塞检阅了军队。由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肖楚女等重要干部先后在军校担任政治教育工作，军校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又聘请了苏联顾问，学习了红军经验，初期的黄埔军校成为了当



◎1924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主席台上右起：宋庆龄、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

时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

同年8月4日，宋庆龄再次陪同孙中山赴黄埔军校，参加该校为已故俄国顾问巴霍罗夫将军及该校先后病故的两名学生召开的追悼大会。孙中山书写了“急邻之难”和“遗恨如何”两幅挽联。9月21日晨，孙中山偕宋庆龄及鲍罗廷夫妇等巡视军务。上午，他们赴芙蓉山，登高逾岭，巡视了各山要隘；下午至东河坝农工团军驻所。孙中山讲演了三民主义及北伐目的，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宋庆龄对孙中山第三方面的巨大支持，表现在促使孙中山改变单纯依靠少数“先觉之士”的态度，关心和发展工、农、学生等阶层的群众运动。

1923年8月15日下午2时，全国学生总会第五次评议会在广州高师礼堂开幕。宋庆龄陪同孙中山莅会。代表及来宾共500余人。孙中山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指出学生以国事为己任，而出而担任国家大事，这是中国前途的希望所在。会后，孙中山、宋庆龄与莅会者合影留念。



为了动员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新的革命高潮中来，同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同下，莅临广州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孙中山在怀士堂（今中山大学小礼堂）作了题为《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演说。岭南大学的学生许多来自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对留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中国目前的政治、教育、社会等方面“亦有待于彼等之改革也”。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大学的学生们看到，站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学生们对宋庆龄的年龄、社会背景等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那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该同祖国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演说毕，孙中山、宋庆龄在岭南大学



◎1923年12月21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岭南大学合影。

校园内合影留念。这幅历史照片，至今仍珍藏于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内。

1924年7月28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东大学礼堂召开，当时称为“农民联欢大会”。与会者共两千余人。彭湃任主席。宋庆龄陪同孙中山莅会。她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农民，带着箩筐和扁担，赤着脚从广东各县徒步到广州开会，深深地受了感动。她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孙中山在会上致贺词。他说，今日召开这个农民联欢



大会，这是革命党和农民的第一次见面，在中国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农民在人民里头占有百分之八九十。中国几千年来立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现在农民所处的境遇都是最艰难和最痛苦的，没有幸福之可言。希望农民自己先有觉悟，认识到自己地位的重要，联合起来，谋自己的幸福。在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说，中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彭湃在会上宣布成立市郊农民协会，并选举了农民协会的临时职员，国民党代表授农民协会会旗。广州人力车工合作社同仁演奏了潮州丝竹，农民讲习所的学生演出了话剧，会场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回到家后，孙中山兴奋地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①

1924年10月底，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西北军的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联合起来，举行“首都革命”，打倒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冯玉祥

①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页。

将所部组成国民军，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动员力量再次北伐的好机会。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大元帅对时局之重要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强调必须废除与帝国主义者的不平等条约，必须采取步骤保障人民自由和国家独立。当天，段祺瑞也从天津发来急电，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电文说：“国事艰难，端资伟画，高轩莅止，无任欢迎。”北方民众更是盼望孙中山早日北上，并做好了欢迎的准备。

12日下午6时，广东省内军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悬旗结彩，以志庆祝。当晚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欢送大元帅北上提灯会，参加民众约两万人。旗帜、灯笼上写着“欢送大元帅北上”“三民主义所向无敌”的字样。孙中山和宋庆龄以欣喜的心情在财政厅楼上观看了这一盛况。

在各界欢送会上，孙中山说，他这次北上的目的是“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他还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



命的好策源地”，“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①因为，同军阀谈判没有实力作后盾是不行的。

13日上午9时35分，在宋庆龄等陪同下，孙中山从大本营乘电船登“永丰”舰。此时军乐大作，鞭炮齐鸣。10时，“永丰”舰鸣炮三响，拔锚启行。“永丰”舰，这条在抵抗陈炯明叛军和援救孙中山夫妇脱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忠诚军舰，又要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送他们踏上去首都的旅程，到那里去同朋友们会商、同敌人们谈判。广州军民在东堤河岸和天字码头一带热烈欢迎。“江固”舰及其他三十余艘舰艇尾随“永丰”舰后欢送。“永丰”舰于当晚12时抵达香港。沿途水月相映，景色宜人。孙中山和宋庆龄不时登上甲板散步，观赏海上美景，毫无倦意。14日中午12时，孙中山一行换乘日本邮轮“春洋丸”赴沪。

可以看到，在1922到1924年这三年中，宋庆

^①刘家泉：《宋庆龄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6页。

龄在辅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协助建设革命武装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对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渐渐开始为世界瞩目。当时一位国际新闻社的记者埃德娜·李·布克访问孙中山和宋庆龄后，这样评价宋庆龄：“当她与他（孙中山）谈话时，闪亮的眼睛中充满着仰慕之情，神态羞赧、温柔而又崇敬。人们告诉我，孙夫人是可爱的，但是我未想到她是那样容光焕发，那样高雅优美，她的理想又是那么炽烈！这位像花一样的夫人，穿着精致的蓝色长袍，是那么文雅、富于魅力、仪态端庄，很难想象是一位革命领导者。然而，她已献身于自己的丈夫，……献身于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十五 伉俪联袂北上， 谋求和平统一

“中国要和平统一，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是孙中山1924年底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呼吁。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政治理想，他在宋庆龄的陪同下，支撑着久病之躯，于同年11月13日登上“永丰”舰，自广州启程北上。苏联兵舰波罗斯基号护航，这是孙中山逝世前的最后一次出巡。

孙中山北上的背景是：由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北方的反帝反军阀运动开始了新高涨。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开始倾向革命。1924年4月，

有人报告说，北京的军人赞成国民革命的很多，不久就要发动政变，希望孙中山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候时局变化。孙中山当时感到北方军阀力量强大，革命希望渺茫，对胜利的预言不大相信，便表示待政变发生后才可以北上。9月，皖系军阀卢永祥和直系军阀齐燮元之间的苏浙战争爆发，北方的同志催促更急，主张孙中山一定要放弃广东，赶快到天津。当时孙中山正出驻韶关，督师北伐，段祺瑞派许世英为代表南下，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0月，正当直奉战争激烈进行时，冯玉祥率部从前线倒戈回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并和奉军妥协，合击直军，直军崩溃。为了亲睹北京的真实情况，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决定扶病北上。除宋庆龄外，随行人员还有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陈友仁、韦玉、朱和中、李烈钧、喻毓西、邓彦华、赵超、黄惠龙、马湘、吴雅觉、马超俊、吴一飞、罗宗孟、陈剑如、张乃荣等十余人。

13日，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换乘日本邮船“春洋丸”赴沪。当晚在船上的大餐厅就餐。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58



此后，由于船身颠簸，又遇风浪，同行人大都晕船，孙中山也感不适，始终未出卧室一步。17日晨，船抵吴淞口，有一位日本记者上船报告说，昨天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刊登了一篇短文，认为孙中山有广州大本营大元帅的政治身份，不宜于在属于商务性质的上海租界居住。上海不需要孙中山，应阻止他上岸。英文《大陆报》更叫嚣要驱逐孙中山出上海。孙中山正色对那位日本记者说：“现在上海虽然是租界，但是根本上还是中国的领土。我是中国的主人，寄居在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要做什么行动，当然可以做什么行动。客人是决计不能干涉的。”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登岸后，受到了于右任、戴季陶、宋子文等人的欢迎。段祺瑞、冯玉祥、齐燮元也派代表在码头迎候。孙中山夫妇向码头欢迎群众颌首致谢，乘汽车径往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寓所。事后，上海法租界捕房竟逮捕群众欢迎队伍的四名指挥者。19日，孙中山在寓所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记者。孙中山

表示，他这次准备“单骑到北京”，就是要以极诚恳的态度，去为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为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提出了两点：一、以现有的团体为基础，派出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公开解决全国大事；二、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第一点，是为了打倒军阀；第二点，是为了打倒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他认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些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倒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孙中山意识到，由于他的主张跟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利益相冲突，他只身去北方是很危险的，但为救全国同胞，为求得和平统一，他甘愿去冒这种危险。同时，他也要求全国人民做他的后盾。

孙中山原本是准备由上海乘船往天津的，但由于半个月内都没有船票，从上海到天津的火车又不通，只好决定绕道日本。

日本是孙中山的旧游之地，故旧很多，孙中山想借这个机会在日本宣传他对于时局的主张。11月22日，孙中山一行乘“上海丸”从上海启



程。一路上风平浪静，船身平稳。23日抵达日本长崎。因为船未泊码头，孙中山没有上岸，但在船中接见了记者和中国留学生的代表，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记者问：“外国宣传广东政府同俄国亲善。将来中国制度有改变没有呢？”孙中山回答说：“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孙中山对中国留学生代表讲话的题目是《学生须赞成国民会议》。他指出：召开国民会议，对内就是解决全国的民生问题，对外就是打破列强的侵略。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便可和平统一。国民会议开不成，中国便要大乱不已。

“上海丸”于23日晚7时半离长崎港，24日下午2时抵达神户。码头上鼓乐喧天，前来欢迎的中日两国人士多达四五百人。从日本各地赶来的华侨代表和留学生手执五色旗，高举“欢迎孙

总理”“东亚民族联合起来”的大幅标语，向身穿黑缎长袍马褂的孙中山纵情欢呼。日方前来欢迎的有高见之通、宫崎龙介、萱野长知、山田纯三郎等朝野人士。为了维持秩序，警察署几乎全体出动担任警戒。孙中山先在船上接见了欢迎者中的重要人士，并回答了日本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孙中山深刻指出：中国长期不能统一，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人的干涉造成的。外国人在中国不只是利用不平等条约，并且滥用那些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似乎损失了外国眼前的小权利，但如果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跟中国合作，那双方所能获得的利益将超过目前的几百倍和几千倍。谈话毕，孙中山微笑着走下甲板，向欢迎者行注目礼，而后乘车至东方饭店69号房间下榻。

25日上午，孙中山在东方饭店对东京、大阪、神户的国民党员发表讲演，题为《中国内乱之因》。孙中山介绍了国内形势，特别介绍了平定商团叛乱的经过。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十三年以来，中国徒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



之实。他沉痛地说，中国现在不只是全殖民地，而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一级的次殖民地。因为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国的奴隶，而中国人民现在要做十几国的奴隶，没有一点权利，所以创立一个新名词，叫中国是“次殖民地”。中国要想真正和平统一，必须使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在讲演中，对当时北京的形势流露出过分的乐观，同时对合法斗争的作用也作了过高的估计（即所谓“拍几百张和几千张电报，便可以当几千兵和几百兵”）。当天下午，日本友人头山满前来拜访孙中山。两人畅谈了种种往事。言犹未尽，头山满便留在东方饭店住了一夜。

据东方饭店的服务员说，孙中山和宋庆龄为了表示对日本习俗的喜爱，一日三餐都吃和食^①。但饭店没有特别会做日本菜的厨师，只好特地去另一家叫“六门亭”的餐馆订购，还特意采购了孙中山最喜欢吃的松茸和笋罐头。饭后，孙中山

^①即日本饭。

夫妇喝的是日本绿茶。饭店服务员还说，孙中山夫妇的日语都很流利，但比较起来，宋庆龄说得更好一些。在卧室里，孙中山夫妇阅读《又新日报》等各种报纸，没有活动时几乎不出房门。

26日上午，日本议员井上雅二先生以及日本华侨联合会会员等来访。27日，日本前国会议员菊池武男先生与其他三十多位知名人士又专程从东京来访。在接待室外，还有很多希望孙中山接见的人士在走廊里漫无目的地踱着步，宛如在车站的候车室里一样。

28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度过了紧张繁忙的一天。下午1时许，孙中山夫妇驱车离开东方饭店前往神户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受到校长以及全校教职员的欢迎。一名女学生代表国本田须磨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宋庆龄。宋庆龄笑容满面，并用英文说“谢谢”。在筱原辰次郎校长的陪同下，孙中山夫妇走进了挤满了近千名女学生的礼堂，首先为在场的女学生讲演。孙中山在讲话中说：“我希望在将来，地处亚洲的中日两国将为确保东洋而充分携手合作。我希望得到日本



全体国民各位的援助。”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在演说中，她引用法国傅立叶的名言“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作为演讲的开首。进而指出：

当今世界，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接着，她强调了今天通称为第三世界的妇女：

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

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
今天……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然后，她提出了妇女运动的目标是：

不论是种族或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

最后，她激动地表示：

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66



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1924年11月28日，宋庆龄在日本神户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演说时的情景。

宋庆龄发自肺腑的热情语言使全场女学生为之感动。57年之后，听过宋庆龄这次讲演的鸟越文子女士回忆说：“当时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是非常尊敬的。”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对宋庆龄的演说均有报道。在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这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文章后，经过十一年的研究得出的新成果。这篇演说中的许多重要论断被以后世界妇女运动证实。

不仅如此，这还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政治演说。对于宋庆龄的漫长革命道路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之前，孙中山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宋庆龄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腴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筋疲力尽，不得



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①。这次成功的演说，表明宋庆龄在与孙中山的共同工作和学习中，经过十年的锻炼，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给她所说的“学徒”生活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能够独立工作，独立战斗了。

为女学生演讲毕，已是两点零五分。接着，孙中山又应神户商业会议所、日华实业协会等五团体之请，公开发表题为《大亚洲主义》的讲演。讲演定于下午3时举行，但两点刚过，神户高等女学校的正门前就云集着焦急等待的人们。他们连声喊着：“开门！开门！”拥挤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人想从旧校舍旁门栅栏的缝隙中钻进来，但铁条坚固，缝隙太窄，未能如愿以偿。挤在人群中的市议会会长胜田先生、永田助理以及数名县议员露出了苦笑。不一会儿，正门那结实的铁栅栏终于被狂热的人群折断了，一时出现了骚乱景象。两点半，正门终于打开，听众

^①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像决了堤似的涌进会场，根本没把撕破嗓子维持秩序的警察放在眼里。礼堂里很快挤满了人，窗台上也坐满了听众，但人群还在往里涌。为了报答听众的盛情，孙中山临时决定在风雨操场为不能进入礼堂的一千余人作简短的讲演。这时，礼堂内的嘈杂声震耳欲聋。3时整，身穿黑色马褂的孙中山在泷川商业会议所会长的陪同下走进礼堂，会场内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并连呼“万岁”的口号。会长首先致词。他说：“今天世界的大伟人，我们平素敬佩不已的孙中山阁下来到神户，使我们得以亲聆他的高见，这是使大家都很感愉快的事情。首先请允许我向阁下致以深切的谢意。”孙中山眼中闪烁着感激的泪花，在再次响起的掌声中开始演说。戴季陶将他的演讲词译成日文。孙中山说，研究大亚洲主义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亚洲被压迫民族抵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就是“要为被压迫民族来打抱不平”。孙中山在讲演中，特别赞扬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不愿讲功利强权”，“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要来和东



方携手”，因而打破了西方列强的霸道。孙中山还含蓄地提醒日本国民，要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不做“西方霸道的鹰犬”。不过，孙中山当时不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审视民族斗争和民族文化的问题，甚至误认为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是“亚洲民族独立的大希望”。这次讲演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孙中山讲毕，西川庄三先生致闭会辞。会场中又回荡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万岁”声。离开神户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之前，孙中山还为该校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个题字被作为重要文物装裱，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堂里。神户华侨又把题字刻成石碑，树立在孙先生曾经到过的屋子移情阁。

28日晚6时，中国驻长崎领事馆、神户商业会议所、日华实业协会、大阪神户华侨联合会又在东方饭店为孙中山举行了欢迎会。日本各界人士一百五十余人莅会。孙中山一行穿着清一色的长袍马褂，只有宋庆龄身着华丽的带图案的旗袍。上甜点时，草鹿甲子太郎先生和柯鸿烈领事代表日中两国致欢迎词，平冢知事首先举杯祝

孙中山身体健康。孙中山致答词，题为《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他说，中国革命十三年，至今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还有国外的障碍没有打破。障碍便是中国从前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那种不平等条约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呢？老实说就是从前中国政府把我们国民押给外国人时所写的一些卖身契。现在拿到这种卖身契的还有十几国。就是我们还有十几个主人。我们现在是做十几国的奴隶。”“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让中国人有自由身份，这才可以同日本来亲善。”孙中山讲毕，宾主自由交谈。宴会至晚9时才散。

孙中山在6天发表5次公开演讲之后，终于极为难得地休息了一天，于11月30日上午9时由神户启程，乘“北岭丸”向天津出发。早上9点多钟，专程赶来送行的中日两国人士纷纷来到东方饭店。饭店门口的汽车排成了长蛇阵，川流不息的人群进进出出，使饭店的旋转大门像风车似的转个不停。不久，孙中山身穿整齐的旅游服走出房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72



间，连日来紧张的社交活动没有在他脸上留下疲惫的痕迹。挽着他胳膊的宋庆龄更是容光焕发。他们同乘一辆汽车，驶向神户港的第四码头。码头上送行的人群达三千余人。拥在队伍前面的是由华侨少年儿童组成的鼓乐队。后面是八百余名中国侨民。孙中山乘坐的“北岭丸”的桅杆上，飘扬着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天空是阴沉的，似乎渲染了一种惜别的凝重气氛。9时55分，孙中山和宋庆龄登上甲板，孙中山不时挥动他柔软的礼帽，向送别的人群致意。宋庆龄身穿茶色的皮大衣，头戴灰色的软毛无沿女帽，与孙中山并肩而立。她也不时地挥动白色的手帕，微笑中露出深深的酒窝和雪白的牙齿。人群中爆发出“孙文先生万岁”“万岁，万岁，万岁”的口号声。10时整，“北岭丸”在军乐声中准时启航，驶出了神户港。

12月1日，“北岭丸”抵达门司。又有记者上船采访。记者问：“近来我们得到北京许多电报，听说有许多人要选先生做大总统。如能成为事实，先生是什么态度？”孙中山明确回答：

“我的态度，是决计推辞。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在船上，孙中山还碰到一位在西伯利亚当过武官的日本朋友。孙中山怀着极大的兴趣向他了解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特别是探询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12月2日、3日，船过黑水洋，遇到大风浪。随行人员发现孙中山的脸色不大好，关切地问：“先生觉得舒服吗？不晕船吗？”孙中山为了使大家安心，振作起精神回答说：“我觉得很舒服呀。”

12月4日晨，“北岭丸”抵达大沽口，正午，船泊法租界利昌码头。前往码头欢迎的民众不下两万余人。人们手持旗帜，高呼口号，盛况空前。当时在人群中的邓颖超在《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中作过生动的描述。

记得1924年冬，你（指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北上路过天津。你们出现在轮船的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74



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宋庆龄由神户抵天津时在船上合影。

今仍然清晰如初。

孙中山与宋庆龄登岸后，乘马车至日租界张园行馆。风尘仆仆的孙中山未及休息，即接见各方代表。下午3时许，孙中山往曹家花园对张作霖进行礼节性拜访。在座者有张学良、杨宇霆、吴光新、叶恭绰等。孙中山曾公开表示：“奉军的领袖张作霖向来是同我一致。”但这次双方却话不投机。张作霖粗声恶气地说：“孙先生！我系粗人，今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指段祺瑞），就可以捧姓孙的。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孙中山发现他跟张作霖在联俄容共的问题上存在如此深刻的分歧，心中感到不快，再加上旅途劳顿，风寒屡侵，返张园行馆后即寒热遽作，相继引发肝病和胃病。经过十多天的调养，孙中山的感冒已愈，肝病似觉缓和。

12月18日，北京政府派两名代表前来敦请孙中山从速进京。孙中山听说段祺瑞出任临时总理执政后，发表了《外崇国信》的卖国声明，便动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76 ■



了感情。他声色俱厉地对那两个代表说：“我一路上都在呼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宣布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要来欢迎我呢？”孙中山受了这一刺激之后，肝病复发，脉搏每分钟120次以上。为了及时得到治疗，孙中山同意于12月底进北京。

十六 哲人萎谢，劳燕分飞

1924年12月31日，北京城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因为这一天是新年前的最后一天，又正值孙中山由津扶病入京，列队欢迎的北京各界群众有三万余人，队伍由前门车站一直排到前门楼的城门侧。群众高举的横幅上写着“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等字样。学界散发了147种、256万张传单。“孙中山先生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面容憔悴的孙中山先生躺在专列的车厢里。他头下枕着书，手中拿着书，但已经无力亲自接见狂热欢迎他的群众了。当北京政府及各团体各推出代表一人进站之后，孙中山只能向他们略一颌首，表达自己无尽的谢意。他当场散发了一份



传单——《入京宣言》，以此阐明这次入京的目的。宣言说：

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特权，乃为救国。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洲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国之责尤不容缓。至救国之道多端，当向诸君缕述。惟今以抱恙，不得不稍候异日。

同日，又散发了用白话文撰写的《致中华民国主人诸君》的书面谈话，与《入京宣言》主旨相同。这两份文件，是孙中山一生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献。

孙中山入京后，首先下榻于北京饭店，其随行人员寓居段祺瑞所预备的行馆，即铁狮子胡同5号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宅。1月26日，孙中山病危，被送入协和医院——当时亚洲设备最完全的新式

医院，住在301号病房。宋庆龄劝孙中山采纳医生建议，接受手术治疗。孙中山允诺。当天下午6时，由该院外科主任邵乐尔医生施行手术，院长、孙中山的好友刘瑞恒协助。开刀后，用肉眼即可看见孙中山的全肝已坚硬如木，断定其症为肝癌晚期，只得重新缝合^①。2月6日开始，孙中山接受镭锭治疗，先后历四十余小时，至17日止，病情如故。孙中山住院期间，宋庆龄日夜陪伴，从没正常睡过。令人欣慰的是，2月9日何香凝赶来襄助，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莫大安慰。18日中午，孙中山出协和医院迁入铁狮子胡同行馆。宋庆龄偕护士随侍守护。寓行馆后改服中药，亦无效果。每逢友人、同志前来探视，孙中山常老泪盈盈，无限感慨。

孙中山一行入京后，段祺瑞一方面反对孙中山关于召开善后会议要兼纳人民团体代表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又大摆筵席，佯作盛情款待的姿态，以掩人耳目，并妄图软化国民党中的不坚定

^①现根据协和医院《孙中山尸解档案》，最终认定孙中山并非死于肝病，而是胆囊腺癌晚期，广泛转移。



分子。为此，孙中山于1月13日指示汪精卫致函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和梁鸿志。全文是：

顷奉中山先生面谕，此次来京，承执政盛意，预备行馆，招待殷渥，至深铭感。惟念国事艰难，库款拮据，受此厚贶，心甚不安。特命弟转达座右，敬祈向执政深致谢意。并请自今日为始，所有行馆内一切膳食零用及汽车等项，概由敝处自备，不必仰劳招待。至于行馆原备，远人栖止，敢拜嘉惠。行馆内供张各物，暂时借用。将来当照天津行馆办法，如数点还。凡此琐屑诸端，一以志嘉惠于无穷，一以为盘桓时日远久之图。谅承莞诺，专此布臆，敬候公安。汪兆铭谨启，一月十三日。

这一函件，表现了孙中山不为利诱所动的崇高气节。

22日，孙中山病情转剧，准备留遗嘱。其中

给国民党同志的遗嘱由孙中山口述，汪精卫笔录并修改。如将口述的“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改写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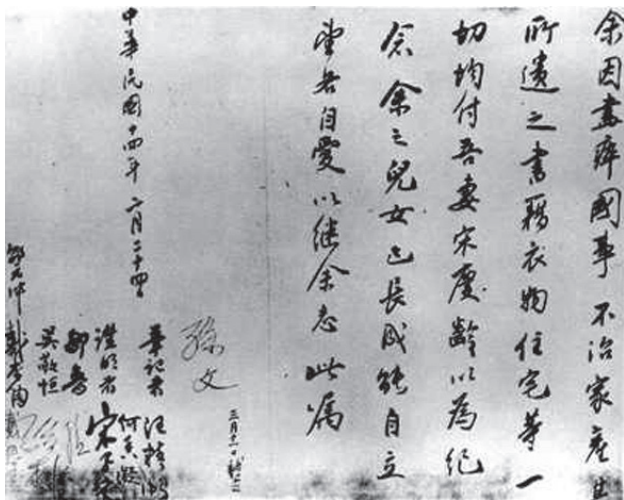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家事遗嘱》亦由汪精卫笔记。在革命生涯中，孙中山经手的钱财有数百万之多，但他逝世



时却是个穷人。所以，他在《家事遗嘱》中说：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①



◎孙中山《家事遗嘱》。

^①孙中山留给宋庆龄的全部遗产，只有两千多册书，一所有五间房的住宅，以及一点衣物、日用品。上海孙中山故居是华侨捐赠，先后典当过三次。

还有一封《致苏联遗书》，由孙中山用英文说出，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
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



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孙中山至死也相信，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真诚希望看到中国独立，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24日，孙中山病情益形危急，公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进入病房，请孙中山正式签署遗嘱。孙中山默然，很久才张目说道：“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呵。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

于你们的。所以我还是不说为妙。”说罢仍闭目沉思。汪精卫作了一番“过去从未被人软化过，今后也不会被人软化”的表白，恳请孙中山早赐训诲，以便今后有所遵循。这时，传来了宋庆龄在隔壁房间悲怆的哭声。为了安慰宋庆龄以及周围一同伤心的人们，孙中山表示暂不签字。

3月10日，孙中山病情更趋恶化。

3月11日晨1时，孙中山忽然神智清醒，召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何香凝等环集病榻前说：“我这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所主张统一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兹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生死常事，本不足念，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之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之目的。我在九泉之下，死亦瞑目。”言之，泪夺眶而出。随后，孙中山又喊了两声“廖仲恺夫人……”便咽哽舌僵，两眼直视屋顶，时以手抓床沿。何香凝知道孙中山



心中所念，遂掩泪携宋庆龄手一起走到孙中山床前，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循。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听到这番话，潜然握住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11日晨8时，何香凝去孙中山病榻前问候，发现他眼睛已经散光，便赶紧出来告诉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汪精卫将遗嘱呈上。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拿出自己的笔递给孙中



◎孙中山签署遗嘱的钢笔。

山^①。孙中山手力微弱，颤动得很厉害。宋庆龄含泪托起他的右手腕，在遗嘱上逐一签上“孙文”二字。随后，吴稚晖、戴季陶、邵元冲、宋子文、孔祥熙、孙科、戴恩赛、邹鲁、汪精卫、何香凝也在孙中山遗嘱后签了字以兹证明。这时，宋庆龄泪如雨下，大家也不禁哭起来。

是日中午，孙中山神智昏迷，猝发谵语。下午4时3刻，孙中山让侍从一人抱头，一人捧足，将他全身放在地下。侍从不敢遵命。宋庆龄听到孙中山的呼唤，赶快上前用英语问道：“亲爱的，你要干什么？”孙中山说：“我要在地上一睡。”宋庆龄说：“地下冰冷，睡不得的。”孙中山说：“我不怕冷，最好有冰更妙。”宋庆龄听到孙中山说胡话，侧面垂泪，悲怆不已。孙中山说：“Darling^②，你不要悲哀，我之所有即你之所有。”宋庆龄答道：“我一切都不爱，爱的只

①这支笔一直由戴家保管，1984年由戴恩赛的女儿戴成功捐给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②英语“亲爱的”。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妻间一直这样相互称呼。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88



有你而已。”言时哽咽，泪如雨下。

3月12日上午9时25分^①，这位创立民国的一代伟人拼尽最后的力量在用英语、粤语和普通话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微弱声中与世长辞，终年59岁。孙中山没有将革命的火炬传给自己碌碌无为的儿子，而传给了悲痛欲绝的宋庆龄。此时宋庆龄才32岁。

国逢大丧，举世同悲。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发来唁电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指出：“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着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②

孙中山去世当天，苏联驻华大使馆立即下半旗致哀。加拉罕大使亲至行馆致唁，苏联在中国的所有其他办事处也随即下半旗。苏联政府还在莫斯科为孙中山定做了一口带玻璃盖的漆成黄色

①这是根据孙中山逝世纪念碑上铭刻的时间，一般新闻报道为9时30分。

②《向导》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

的铜棺材。因为孙中山去世前曾叮嘱宋庆龄，要像他的朋友列宁那样用科学方法长久保存遗体，将来安置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地——南京的紫金山麓。14日，苏联政府又给宋庆龄及孙中山其他家属发来了慰问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愿向其最敬仰之孙逸仙博士之夫人及其家属，致其诚挚之慰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在孙博士指导之下之英武奋斗，常以极深之同情，加以重视，且知中国人士将因孙博士之死，而受重大之损失。吾人希望夫人等或因其深忧为数千百万人所闻，而增加其勇气。谨致此联邦政府之书。”

东京、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以及东南亚各地，也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大会或举行悼念活动。

19日，为孙中山出殡之期。清晨，薄云蔽日，天色惨淡。出殡前，孔祥熙和孙科听了一些朋友的话，坚持在协和小教堂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借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举行祈祷式时，礼堂正面用水仙、夹竹桃、



木兰花堆成了花山，中悬孙中山遗像。宋庆龄首蒙丧纱，坐在靠近遗像的地方，显得虚弱和哀痛。乐队演奏了《求主与我同在》等乐曲。由燕京大学学生组成的唱诗班身穿白色法衣，手持大蜡烛，唱着孙中山生前喜爱的歌《甜蜜的和平，上帝博爱的礼物》。全体来宾在琴声伴奏下，合唱了《耶稣呵，你是我心灵的挚友》。

仪式毕，11时出殡。12万余人胸挂白花，臂挽着青纱参加送葬。从协和医院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几无一片隙地，呈现出北京空前未有的盛况。宋庆龄乘坐青玻璃马车，随枢后行。据当时在公园大门执行勤务的女师大学生陆晶清回忆，宋庆龄随灵车到公园入口处下了车，她“头上罩着黑纱，全身丧服，穿着白珠镶边的旗袍，黑鞋黑袜黑色手套。透过黑纱看到她面色苍白，紧闭着嘴，微低着头。当她由两个人搀扶着慢步朝社稷坛走去时，偌大的公园里，只听风声和隐隐啜泣声，成百上千双泪眼直送孙夫人走进灵堂”。队伍中不时爆发出“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12时15分，



◎1925年，宋庆龄等孙中山亲属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守灵。左侧右起：宋庆龄、孙治平、孔令仪、孙治强、宋美龄、宋蔼龄；右侧左起：戴恩赛、孙科、宋子文、孔祥熙。

孙中山灵柩抵达中央公园。园内响起了32响礼炮声。公园的松柏树枝上挂满了无数挽联，道路两旁的花篮堆成了小山。

3月24日至26日，在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大殿孙中山灵堂举行吊礼，发丧致祭。灵柩置于社稷坛正中，上悬孙中山遗像及“有志竟成”横匾，两旁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三天中致哀人数达746800多人。各界赠送的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292



挽联、哀词、祭文达6万余件。

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入青山古树环绕的西山碧云寺大殿。由西直门步送到西山的不下两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军人和工人。宋庆龄头障黑纱，身穿黑色夹袍，着黑鞋，乘坐一辆由



◎1925年，宋庆龄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守灵。

两匹乌骓驾辕的黑色马车，跟随在孙中山的灵车之后，走在30万送殡人群的前头。她“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而是更加坚强，显示出内在的毅力”^①，她“脸上流露出无限悲痛而又坚毅的神色”^②，表现出一派刚强的巾帼丈夫的风范。她促使人确信：“孙先生虽然死了，还有孙夫人在，还有忠实于中山遗教的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的革命不会中断”^③。她已经深刻理解孙中山过去流亡日本陷入困境时说过的话：“凡是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人，都得战胜眼泪。”^④

追悼孙中山的活动，成为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宣传和示威。一副挽联写道：

五千年帝制流毒，赖先生树起五权

①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

②③王昆仑：《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

④庄正：《国父生平与志业》，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2年版，第293页。



宪法，三民主义，缔造新邦，双手转玄黄，创此空前事业；

四百兆民众涂炭，看今日仍知强邻群迫，军阀私争，内外交困，哲人顿萎谢，孰擎此后山河。

从孙中山发病到病逝，前后三个月。宋庆龄心急如焚，体贴入微，日夜守候在病榻旁，一边分担着孙中山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一边不断接见各界政要和前来慰问的人民代表，除表示谢意外，还继续申明和宣传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熬过了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三个月，对孙中山倾注了全部爱恋。

1925年4月12日上午10时，宋庆龄偕母亲倪太夫人等出席了上海市十万市民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隆重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亲历其境的何香凝在大会上报告了孙中山的生平，并颂扬了宋庆龄的精神与劳绩：指出她在孙中山“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特别强调“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

先生曾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

孙中山遽然而逝，给宋庆龄精神上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她说过，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她简直不愿见阳光，白天在室内也要放下厚窗帘。然而，她意识到，她肩负的历史使命比她的个人生活重要得多。因此，她并没有从此萎靡不振，意志消沉。本来，宋庆龄要利用孙中山的崇高声誉谋求她个人的地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她的崇高人格不能容忍她凭借伟人妻子与昵友的身份来牟取私利，她想起《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向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宋庆龄决心不走“宽门”走“窄门”，所谓“窄门”，就是顶住来自国民党内部和外部的重重压力，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完成这位革命先行者未竟的事业。

宋庆龄

■ 青少年时代 ■ 296 ■



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时，遭到了家庭、革命党人和教会的强烈反对，但回首近百年的历史，我们赫然发现，正是这桩不被看好的婚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孙中山虽然没有给宋庆龄留下什么遗产，但是由于宋庆龄忠诚地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她实际上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尾 声

孙中山逝世之后，宋庆龄为祖国和人民又服务了56年。

她继续坚持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先后发表了著名的《讨蒋通电》、《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与政策的声明》；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赴苏联访问。

1932年，她在上海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和斗争，营救了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其中丁玲被营救出来后，处境非常艰难，宋庆龄知道后，还给她送去350元钱。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摒弃前嫌，



团结在政治上长期跟她分道扬镳的宋子文^①、孙科^②作为保盟的发起人，致力于战时接济伤兵、难民和儿童保育工作。香港沦陷，抵达重庆后的宋庆龄与蔼龄、美龄牵手继续支持抗战。抗战胜利后，一心向往和平建国的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等福利事业。

1951年9月18日，她在北京接受了1950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这是对宋庆龄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最高褒奖。之后，她又将全部十万卢布的奖金捐献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宋庆龄终其一生都特别关心穷人、劳苦大众、妇女和儿童，尤其是儿童工作在她心目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保盟在香港向全世界发出的第一份有插图的传单是“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她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

①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②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长》^①也是写给儿童的。文中，她充满深情地对孩子们说：“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身份与世长辞。

在宋庆龄病重及去世之后，来自全球的慰问信、慰问电、回忆与悼念文章如雪片般飞来。其中女作家丁玲的《诗人应该歌颂您——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②一文，感人至深。丁玲用诗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宋庆龄的一生。在诗中写到：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开的花朵；
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
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

①这篇文章应该是为1981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准备，但由于当时宋庆龄病情严重，提前到了5月2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②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宋庆龄病危的公告，并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文于1981年5月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诗人写过傲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的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

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清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

迫害您的豺狼，走在您的面前，却停步不敢向前，只能缩头夹尾。

妄图侮辱您的小丑，也不敢敲您的大门，只能偃旗息鼓，暗地诅咒。

您背后站着亿万爱您的人民，您背后站着中国共产党。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谁也不敢动您一毫一分！

篡权者夺走了革命的胜利果实的时候，您站了出来，怒斥叛徒。您的文章，全世界，争相传颂。

当反共逆流泛滥成灾的时候，您又站在人民一边，泾渭分明，您维护真理，鄙弃亲情。

然而您手无寸铁，无权、无钱，

只是一个柔弱的女性。但您是一个伟大的，坚贞的，圣洁的女性，您的力量，可以摧毁魔窟；您的笔虽然纤细，可是力敌千军。

您的声音虽是吴侬细语，可是却锋利如剑，响彻寰宇。

有的英雄，勒马挥刀，叱咤风云；

有的英雄，豪情满怀，才华横溢。

有的能言善辩，八面玲珑；

有的拉帮结派，拍马吹牛。

只有您，幽静细致，一派斯文，温柔中显露刚强，平稳中突出智慧。

有人说上帝造人，但上帝能造出您这样美丽的灵魂吗？

您刚刚走出校门，就站在中国伟大的先驱者的身边，您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者。

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您继承他的事

宋庆龄

的青少年时代 302



业，保护他的旗帜，战斗不歇。

开国以来，您荣居高位，却从不骄矜，您始终虚怀若谷，文质彬彬。

您随着人民的战鼓，走进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您是左翼的辩护士。我们老早就把您当作尊敬的同志。

……

您的高风亮节，永远给诗人留下浓郁的芬芳。诗人都会歌颂您的，您会使诗情更加深重，诗意更加隽美，诗文永放异彩；您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

……

责任编辑 王 轶 付 聪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艺凡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付敬华

ISBN 978-7-202-08507-3



定价：18.00 元